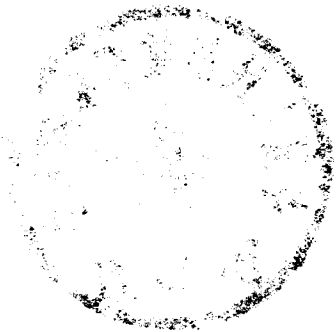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研究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毛主席语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目 录

前言	1
一、近代尊孔、卖国的开山祖曾国藩	3
打着理学黑旗,组织反动武装	4
卫道士和复礼狂	20
“忠信笃敬”与“曲全邻好”	33
二、以“圣道”为护符的大卖国贼李鸿章	49
侵略者眼中“最杰出的人物”	49
一手软刀子,一手洋刀子	56
“圣道”与卖国	66
出卖民族权益的大掮客	74
三、炮制“中体西用”论的张之洞	99
保“名教”和办“洋务”	100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12
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132
四、尊孔、复辟、卖国三位一体的袁世凯	152
中外反动派培植的新军阀	153
卑鄙的盗国与卖国	165
一场尊孔、复辟闹剧	176

前 言

中国近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复杂，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从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日起，中国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都把尊孔和卖国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顽固地推行一条对内残酷镇压革命人民，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路线，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把我们伟大的祖国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与此相反，中国人民则自始至终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把反孔和反帝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先后掀起了包括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在内的无数次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粉碎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迷梦。在中国近代史上始终存在着反孔、爱国、革命和尊孔、卖国、反革命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为了维护十分脆弱的反动统治，一方面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反动专政，大搞尊孔读

经；另一方面投靠帝国主义，大搞崇洋卖国。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就成了近代中国反动派共同具有的时代和阶级的特征。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中国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之流就完全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尊孔和卖国的衣钵，他们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宣扬和维护孔孟之道，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思想理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到策略手段，都与曾国藩等近代尊孔派和卖国贼一脉相承。因此，揭露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尊孔卖国的滔天罪行，以及搞清他们推行尊孔、卖国、复辟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发展脉络，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与民族投降主义的关系，认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由于我们思想政治水平很低，书中的错误和缺点，恳切地希望广大工农兵批评指正。

一、近代尊孔、卖国的 开山祖曾国藩

在近代中国，中外反动派在抗拒人民革命潮流，力图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时候，都要特别吹捧一个反动偶像——臭名昭著的尊孔派和卖国贼曾国藩。在十九世纪后期，日薄西山的清朝反动统治者尊称他为“天生圣相”^①。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保皇党人宣称，要“澄清天下”，消灭人民革命，就必须拜曾国藩为师^②。民国初年，梦想复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遗孽们，宣扬“曾国藩之学即孔子之学”，学得了“曾学”，就掌握了“孔子之道”^③。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独夫民贼蒋介石特地通令其反动军队，把曾国藩作为他们的“师资”，用心“精读”曾国藩的反动著作^④。帝国主义侵略者也给曾国藩戴上“伟大的中国人”等桂

① 朱孔彰：《曾国藩别传》。

② 梁启超：《论私德》。

③ 劳乃宣：《尊孔文社演说辞》。

④ 蒋星德：《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蒋介石：《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

冠^①，吹捧他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的“英雄”。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也公然要人们去研读曾国藩的反动遗书。刘少奇、林彪一类党内走资派的思想理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至策略手段，也都是与曾国藩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百十年来国内外一切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都不约而同地召出曾国藩的亡灵，来为自己撑腰打气呢？曾国藩到底是一个什么家伙，值得内外反动派如此崇拜呢？

打着理学黑旗，组织反动武装

曾国藩（一八一——一八七二年），湖南湘乡荷叶圻（今双峰县荷叶区）人。父曾麟书，是个横行乡里的大恶霸地主，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曾国藩从五岁开始，就在其反动父亲的督促下，埋头捧读孔孟经书，每天黎明即起，直到半夜才停息，连大门都很少跨出，九岁的时候，便把《五经》啃完。特别对于孔老二倒退复辟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更牢记在心，特把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七一页。

它抄贴在书桌之上，每天诵读和琢磨几遍，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时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却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顽固又十分狂妄的孔孟之徒。他自称是孔老二大弟子曾参的后代，发誓今后不管境遇多么恶劣，都要“须臾不离”孔孟之道^①。他以暂时蛰居乡曲的“蛟龙”自命，只等时机一到，就要大干一番反革命事业。一八三八年，他因为发挥孔老二“言必信，行必果”^②的骗人哲学有独到之处，被清朝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卖国贼穆彰阿看中，成了进士，挤进了清朝反动统治集团。

正在这个时候，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相继侵入中国。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用武力逼迫腐朽反动的清王朝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标志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两个主要矛盾。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时期。

马克思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鸦片对中国人民没

^① 《求阙斋弟子记》卷一九。

^② 一八三八年曾国藩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试题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语出自《论语·子路》。

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并且预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就将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爆发，它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①。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仅文献记录下来的武装起义就有一百多起。这意味着，在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下，中国人民再也无法照常生活下去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再也无法照常统治下去了，一场猛烈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了。

面对着十分严重的统治危机，初入仕途的曾国藩十分忧虑，十分着急。在他看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封建统治已经是“百废莫举，千疮并溃”^②，封建的纲纪严重败坏，内部各种无法克服的矛盾都同时迸发了出来。然而各级反动统治者却醉生梦死，麻木不仁，“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③，这样下去，清朝封建统治就有垮台的危险。为了给濒临解体的封建制度寻找一条生路，曾国藩更用心钻研孔孟之道，特别是后期封建社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六五页。

② 《曾国藩书札》（以下引及曾的反动著作时，均简称曾《书札》、曾《奏稿》、曾《文集》、曾《杂著》、曾《家书》等等）卷二，《复江岷樵、左季高》。

③ 曾《奏稿·应诏陈言疏》。

统治思想——程朱理学，把啃读《四书》和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的《近思录》作为自己每日的“必修课”，还煞费苦心地搜罗和编辑了前代和当时所谓“名臣大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反动统治经验，以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为了匡救所谓“人心唯危”，他拜倒在“理学大师”倭仁的门下，并呼朋引类，纠集吴廷栋、何桂珍等一批反动透顶的孔孟之徒，“穷极程朱性道之蕴”^①，根据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遗教，极力宣扬“慎独”、“主敬”、“求仁”、“忠诚”等理学家的虚伪教条，要人们用理学家那一套封建的道德藩篱把自己约束起来，做封建制度的“忠臣烈士”。尽管这时他地位不高，权势不大，但却野心勃勃，经常大发狂言，“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②，因而受到清朝统治集团的特别垂青，不长的时间内，曾国藩就从翰林院侍讲爬到了侍郎（部里面的副职）的高位。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二年，仅五年之内，曾国藩便先后担任过礼、兵、吏、刑、工五部侍郎，被认为“经学无双”，受到破格的提拔和器重。

正当曾国藩以一个狂热的封建制度的卫道士的姿态，在反革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时候，一八五一年

① 刘蓉：《曾国藩墓志铭》。

② 曾《年谱》。

一月，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英雄们高举反封建反侵略的大旗，针对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针对两千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用以束缚劳动人民的三纲五常，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民族和男女平等的革命主张，向清朝反动统治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这支英雄的农民武装，如同出山的猛虎，出广西，入湖南，进湖北，一八五三年三月，一举攻克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改称天京，作为农民革命政权的首都。为了把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推翻反动的清朝反动统治，太平天国在开展革命战争的同时，又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向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发动更加迅猛的进攻。“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农民英雄们不但在孔老二的“圣庙”里宰牛屠狗，“以狗血尽淋孔孟之头”，而且还明确宣布儒家的反动典籍为“妖书邪说”，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又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文献，全面地宣传农民阶级的平等思想，批判和否定了封建法权、三纲五常及其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思想和经济基础。在革命人民的铁拳的打击下，清朝反动统

治摇摇欲坠，孔老二这个封建制度的护法神也被打翻在地。各族劳动群众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冲决了孔孟的思想网罗，“以强（敢于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为胜，以恶（敢于蔑视孔孟之道）为能，以诗书礼乐为无用之物，以仁义道德为迂腐之谈”^①，全国到处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清朝反动统治连同孔孟之道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②。同历史上所有不甘心灭亡的反动统治者一样，清朝的反动头子奕訢（咸丰帝）也同时施展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乞灵于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不止一次地去孔庙向孔老二顶礼膜拜，还亲自粉墨登场，向反动官僚们宣讲“圣道”；另一方面，则从四面八方拼凑反动军队抵挡太平军；并命令各省的官僚豪绅，赶紧组织地主武装，维护反动统治。一八五二年因母死而回到湖南原籍“守丧”的曾国藩，就被清朝封建统治者挑中，特命他为湖南的“团练大臣”。从此，曾国藩就赤膊上阵，镇压农民革命。他用以反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动

① 方宗诚：《俟命录》卷七，第一〇页。

② 毛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八四〇页。

思想武器，就是反动的理学。

反动理学，原是在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由北宋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程颐和程颢奠其基，而由南宋的朱熹集其成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们把“天理”说成是产生和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绝对精神，把封建制度、三纲五常和封建统治者说成是“天理”的体现和化身，把一切不符合封建法权的思想 and 言行都说成是万恶的“人欲”，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消灭人民革命。这种彻头彻尾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反革命哲学，是与太平天国的农民民主革命思想水火不相容的。自称“一宗宋儒”的曾国藩，为了给风雨飘摇中的清朝统治寻找救命的稻草，就拾取了程、朱关于“道”（理）的唯心主义谬论，结合《中庸》中关于“诚”的反动说教，把“诚”作为其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核心。他宣称，不论自然界和社会政治，都是由“道”这种永恒不变的绝对精神决定的，都是由“诚”这种神秘的理念主宰的。在这个顽儒看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①。“仁、义、

^① 曾《家训·论纪泽》。

礼、智、信”这“五常之性”，是先天就存在的伦理道德，是“育民淑世”，即毒害劳动人民和维护反动统治的宝贝^①。很清楚，曾国藩所说的“道”和“诚”，同程、朱所说的“道”或“理”，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曾国藩宣扬这种反动理学的目的，就是要人们相信，封建的统治秩序和封建法权是凌驾一切的，永恒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的“真命天子”是万万反抗不得的。他妄图用这些谬论鼓动地主阶级和欺骗劳动人民，否定太平天国以平等为内核的农民革命思想。

当时，在太平军胜利进军的鼓舞下，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腐朽透顶的清朝反动统治，如同他们自己供认的，“本有金汤之固，顿有瓦解之形”^②，“过此以往，更有不堪设想者”^③。为了消除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悲观情绪，曾国藩特别卖力地宣扬儒家的天才论和唯意志论。他胡说什么反动统治者都是“天生”的“圣人”、“贤人”，社会风气就是由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语一默”支配的^④，社会历史就是由其中“一二人之心之所向”^⑤决定的。他诬蔑广大劳动人民都是既愚蠢，又懦

① 曾《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② 宋晋：《水流云在馆奏议·请派大臣剋期督剿疏》。

③ 袁甲三：《奏议·东南大局急图克复庐州折》。

④ 曾《日记》辛酉十一月。

⑤ 曾《文集·原才》。

弱，注定要“受命”于反动统治者的^①。只要一小撮反动统治者“向义”，即实践和宣扬孔孟之道，那么“众人”就会跟着走，封建统治秩序就会获得稳定；只要一小撮反动统治者“立诚”，横下一条心去维护封建的人伦道德，那么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之“道”就会发扬光大，清朝统治就会永世长存。很显然，曾国藩在整个反动统治集团异常惊恐和沮丧的时刻，硬说一小撮反动派思想和意志是指挥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企图从思想上维系被农民战争打得乱作一团的地主阶级，并把他们鼓舞和动员到“卫道”的战场上来。为此，他特地将“诚”和“忠”、“朴”结合起来，极力倡导所谓“忠诚”、“朴诚”的反革命疯狂性，要地主阶级拿出“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反革命拚命精神，用一切手段，尽一切力量来反对农民革命，“杀身成仁”，那怕豁出生命都不要有所害怕和顾惜。充分暴露出处于绝境的反动统治阶级极端虚弱和垂死挣扎的反动本质。

在兜售反动理学的同时，曾国藩还拿出全付精力在湖南各地组织团练。他别出心裁地把“团”和“练”分而为二，齐头并进。所谓“团”，就是清查户口，实行反

^① 曾《文集·原才》。

动的保甲制度，让城乡地主豪绅监视人民和检举所谓“匪类”。所谓“练”，就是抽练城乡壮丁，编组地方性的地主武装，防范和镇压城乡人民。他自己则盘踞在省城长沙，抽调各县壮健团丁，成一大团，作为自己直接指挥的骨干力量。不管是“团”或“练”，都“以查办‘土匪’为第一要务”。这样，从一八五二年底起，曾国藩就正式开始了其镇压农民革命的血腥事业。

曾国藩知道，地主豪绅和反动儒生，同革命农民是不共戴天的；要扑灭农民革命的烈火，就必须组织和依靠这股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因此，他办团练的方针就是大张绅权，利用族权，即所谓“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①他接二连三地写信给各地的地主豪绅，杀气腾腾地叫嚷：“儒生杀人，此其时也！”督促他们与他“努力同心”，用孔孟之道维持封建统治的“风化”，用血淋淋的屠刀来保卫地主阶级的“身家”。他特地拟订了“乡团章程”和“族团章程”，刊发“乡团执照”和“族团执照”，鼓励地主豪绅前来领取，作为“约束乡族”的依据和凭证。并明确规定，团长、族长可以任意捉拿各种“匪类”，可以任意处以各种“家刑”，直至“格杀勿论”^②。受害者及其家属

① 曾《批牍》卷一，《茶陵县禀发奉团练告示由》。

② 曾《书札》卷一，《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

一不准抗拒，二不准报复，三不准上控。总之是提供一切便利，让地主豪绅能“放手”屠杀农民。

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三、四十年来对农民太“宽纵”了，“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①，才造成今日的革命形势。据此，曾国藩就规定其办团练的指导思想是“一意残忍”^②，也就是用疯狂的屠杀来镇压革命。他在其团练衙门里特设了一个名为“审案局”的阎王殿，只要各县地主豪绅把农民捆送來局，就不分青红皂白，“立予正法”，一切例行的手续全行免去^③。百十天内，光这个局就残杀了农民二百多人。同时，他又鼓励和催促州县官吏和团长、族长，叫他们拿获所谓“匪类”，不用关之入狱，当场就用棍棒打死；发现所谓“劫掠扰乱”或强入地主富人家“派饭”者，也要一律“格杀勿论”；如果地方兵、团镇压不了，那就火速去长沙报告，他保证立即发兵前往“剿捕”。据他说，只有这样，地主阶级才能“安生”。由于曾国藩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人们就给他加上了一个可耻的外号——曾剃头。

① 曾《奏稿》卷一，《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② 曾《书札》卷二，《复陈俊臣》。

③ 曾《书札》卷二，《上吴甌甫制军》。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①曾国藩的疯狂屠杀，并没有也不可能吓倒湖南人民，只能激起湖南人民更大的愤怒。他们不顾曾国藩之流的恐吓和镇压，热情赞颂太平军“不奸淫”，“不焚掠”，“不杀戮”（平民百姓），四处城乡都“一唱百和”^②，表示了对太平天国的热烈支持和无限向往。在太平军的鼓舞下，劳动人民振臂欢呼：“出头日子至矣！”纷纷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帜，拿起武器向封建统治宣战，用行动来摧毁曾国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道”和“天理”。就在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境，四乡都涌现出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队伍，有的达数千人。一八五三年九月，曾国藩胆战心惊地向其主子奕訢诉述省内形势说：人民群众“甘心从逆（太平天国），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③可以看出，农

①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六页。

② 曾《书札》卷一，《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

③ 曾《奏稿》卷一，《移驻衡州折》。

民反抗的烈火是多么普遍，多么炽烈。特别是太平军于一八五三年二月定都天京（南京）后，就派出西征大军，解放了苏、皖、赣、鄂的大片土地；又派出北伐大军，以破竹之势直捣清朝反动统治的中心——京津地区。清王朝有如一间纸糊的破屋，被革命农民四面捣穿，吓得北京城里的奕訢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准备逃往热河。

但是，曾国藩这个反动透顶的孔孟之徒，只要还有一口气总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搬出《中庸》“勉强而行之”^①的主观唯心论，并以此解释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贤豪”，宣扬他们之所以能在十分不利的形势下建立“事功”，就在于能“强作”——象孔老二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强使社会历史服从他们的主观意志的指挥，最终挽救了危局。现在，他就要效法自孔老二以来历史上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强作”一番，在农民革命的汹涌怒涛中拯救清王朝这只破船。他认为，太平军之所以节节胜利，清王朝之所以一败涂地，原因就在于各支“官军”离心离德，自相水火，畏战怯战，遇敌即逃的缘故。依靠这样的“官军”去抗拒“上下一心”的太平军，即令“孔子复生”，也断断无从措手；即令调集五十万军队，也经不起太平军之“一割”。因

^① 曾《杂著·笔记十二篇》。原话见《中庸》第二〇章，大意是：坚持硬干可以把事情办成。

此,他就提出了“别开生面,斩新日月”^①的主张,决心另起炉灶,自行编练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代替八旗、绿营,承担扑灭农民革命、挽救封建统治的任务。于是,从一八五三年夏季开始,他就以原先主要作为“保固(湖南)省境”之用的两三千名湘勇为基础,扩编成一支要“驰驱中原”的湘军。除了把原先每营只三百六十人的陆军,扩充为每营五百人,并加强火器装备外,他还特地在衡州大造船只,从广东向外国侵略者购买大批洋炮,编练了一支旨在与太平军争夺长江的水师。到一八五四年初,水陆合在一起,总共有一万七千人。

为了使这支反革命军队“别开生面,斩新日月”,曾国藩摒斥了行伍出身、“官气”严重的旧官弁,专意物色所谓“吾党”“忠义之士”,作为各级将弁,水陆各营“悉以文员领之”^②。因为这些人既反动成性,有一股子“卫道”的狂热,又是以“诸生”的身份从军,有一股子升官发财的狂热。在曾国藩的召唤下,每天都有数十“士绅”投入湘军。孔老二在各地的徒子徒孙们也如蝇附羶,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曾国藩的反革命黑旗之下,许多州县塾师都为之一空。同时,曾国藩又充分利用宗族关系、师生关系、亲友关系以及同乡关系等等,规定了

① 曾《书札》卷四,《复江岷樵中丞》。

② 王闿运,《湘军志》卷一。

湘军独特的成军办法：各军将领利用上述种种封建社会关系，自去物色所属各“营官”，“营官”自去物色所属各“百长”，“百长”自去物色所属各“什长”，“什长”自去搜罗所属部卒和民伕。用这种办法募练的湘军，上下级关系又是主奴关系，各军各营成了各级头目的“家兵”，整个湘军成了“曾家军”，其他省区的反动将帅固然完全指挥不了，就是清朝中央也休想直接调遣。在湘军内部，各级头目不是同乡戚族，就是师生故旧，就连各营勇丁，也多是同村、同姓的受骗农民。依据这样的组织路线编练起来的湘军，就成为一支具有强烈的封建性的地主武装。同当时那些东抽一百，西调五十，杂凑成军的八旗、绿营比较起来，初期的湘军内部矛盾较小，用封建意识笼络人心，因而特别能为清朝反动统治卖命。

为了“别开生面，斩新日月”，曾国藩特别注意用孔孟之道去武装湘军。从曾国藩本人起，各级头目都是操起屠刀的孔孟之徒，他们既是刽子手，又是牧师，平时督率勇丁操练军事技术之外，还极力向勇丁灌输孔孟之道。曾国藩本人经常亲自出马，带头宣讲，“每次与弁兵讲说一时数刻之久”。^①并炮制了《爱民（地主）

^① 曾《书札》卷二，《与张石卿制军》。

歌》、《得胜歌》等大毒草，宣扬什么“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等等，对士兵进行恶毒的欺骗和蛊惑，用升官发财来诱使士兵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他还随处招请所谓“大儒”，来营宣讲。平时，则强迫弁勇诵读《四书》等反动典籍。所谓“朝出麀(音敖áo)兵，暮归讲道”^①，即白天出去镇压革命，夜晚回营宣讲“圣道”，成了曾国藩一伙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有个地主阶级分子记述他在湘军中看到和听到的情形，说各营内外，到处可以听到弁勇们教读孔孟典籍的声音。很显然，曾国藩一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企图用他那一套反动理学，将湘军培养成为一支“尊上而知礼”的“卫道”武装，诱胁他们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流血卖命。

这样，打着理学黑旗的曾国藩，就编练出了一支确实是“别开生面”的反动武装。它以“湘中书生”为骨干力量，以封建关系为联系纽带，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武装，形成了一伙以曾国藩为头子、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标的“誓不相弃之死党”^②。这时，他表示可担负去省外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③，被太平军吓得“寝食难

① 曾《文集》卷四，《罗忠节公神道碑》。

② 曾《书札》卷二，《与文任吾》。

③ 王定安，《曾国藩大事记》。

安”的奕訢，看到曾国藩竟能这样“激发天良”，越俎代庖，感到非常满意，谕令褒奖，便把镇压长江中下游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一伙人身上。两湖的地主豪绅更把曾国藩及其湘军视为自己的命根，从人力、物力上加以全力支持。曾国藩督同徒党，在湖南本境一边大干其野蛮“剃头”事业——先后镇压了常宁、桂东、衡山、永兴、安仁、茶陵等地的农民起义军，一边加紧操练和武装，为向太平军进攻作准备。

卫道士和复礼狂

一八五三年五月，太平天国西征大军由天京沿江西上，水陆并进，连克安庆、九江，解放了安徽、江西两省的大部分州县，随后又向湖北挺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镕急忙调集反动军队，在堵城一带死力抵拒，但一经接触，即被太平军彻底击溃，吴文镕亦被击毙。太平军一面向湖北省城武昌直进，一面又分兵进入湖南省境。大江内湖，一万多艘太平军的战船往来自如，各地清军闻风丧胆，纷纷弃城逃命。消息传到北京，奕訢更加慌了手脚，急忙令曾国藩率所部湘军赶往拒抵，说“此举关系南北大局”，要这个“曾剃头”赶紧替他挽回危局。曾国藩果然不负主子所望，就于一八

五四年三月驱赶湘军出省，正面与太平军作战。

这个时候，在长江中游胜利挺进的太平军，正继续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向封建的经济基础和孔孟之道展开猛烈的冲击。革命军队所到之处，摧毁了清朝各级反动政权，建立起省——郡——县——基层的各级农民革命政权，严厉镇压反动官吏和地主豪绅。在一些地区，土地“以实种作准”，有些地区，则实行减租和限租。在太平天国治理的“新天，新地，新世界”里，“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反抗地主）之穷民”^①。“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②农民英雄们闯进了地主阶级长期把持的祠堂，“斧祠堂之木主，或投水火，或弃粪壤”^③。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管理下，祠堂、庙产、祭田之类，都被没收或征用，旧时代族长的权威全被取消。各地“庵观寺院，尽行焚毁，佛象百无一存，僧皆返为平民”^④。卜筮、星相、看风水等等封建迷信的“歪例”，都被列于“生妖”或“死妖”之列而严加禁绝。太平天国还废除了缠足、买卖婚姻、纳妾、娼妓等旧制度旧

① 曾《书札》卷一三，《复刘詹崖》。

②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三一页。

③ 方宗诚：《柏堂集》前编，卷五，第一〇页。

④ 同上书，卷一〇，《上罗椒生先生》。

恶习，使两千多年来备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封建礼教束缚的劳动妇女，开始获得了平等地位。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太平天国对于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对于封建的“四权”，对于地主阶级，对于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都进行了革命的扫荡，完全否定了曾国藩一伙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道”和“天理”，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制度之“礼”，使曾国藩痛彻心肺。为此，他统率湘军倾巢而出的时候，首先抛出了一份毒汁四溅的《讨粤“匪”檄》，作为这支地主武装的反革命宣言书和对牛鬼蛇神的动员令。

在这份反革命宣言书中，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发动的反封建斗争，极力宣扬历代儒家所提倡的“名教”和“人伦”，即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和统治秩序，说它们是神圣的，不可变动的，就象帽子和鞋子不可倒置一样。这就是说，他和湘军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反对太平天国的农民民主革命思想，维护和复辟被农民革命否定了的封建等级和封建统治秩序。

在这份反革命宣言书中，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发动的讨孔运动，疯狂地咒骂太平天国使“士不能诵孔孟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使他那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孔丘和孟轲都要

“痛哭于九原”的。这就是说，他和湘军的宗旨之二，就是要尊孔读经，把孔老二这个已被革命农民踩在脚下的“至圣先师”重新捧上台。

在这份反革命宣言书中，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的革命纲领，咒骂太平天国使“农（地主）不能自耕（自己经营）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并且对地主富户无情打击，经济上弄得他们“寸草不留”，政治上搞得他们“犬豕牛马之不若”，使他们这伙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痛憾”万分。这就是说，他和湘军的宗旨之三，就是要维护地主阶级政权和复辟封建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

在这份反革命宣言书中，曾国藩还针对太平天国反对封建神权的革命行动，公开宣扬封建神权，胡说什么：“自古生有功德，歿则为神”，攻击太平军“所过州县，先毁庙宇”，“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使阴间的鬼神都愤怒得很。他和湘军的宗旨之四，就是要“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维护和复辟封建神权。

在这份反革命动员令中，曾国藩歇斯底里地向那些“读书识字”的“抱道君子”——顽固不化的孔孟之徒，向“血性男子”、“仗义仁人”——反动成性的地主豪绅们大声呼号，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或组织地主武

装，或参加他的湘军，或出钱助饷，或在太平军内部发动叛乱，共同来挽救清朝的反动统治，共同来“慰孔孟人伦之隐痛”。

这样，曾国藩不仅悍然扯起了“卫道”的大黑旗，而且事实上还提出了一个全面“复礼”的反革命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反动理学家视为“天理”的体现的“礼”，是万事和万物的根本，离开了“礼”，就谈不上封建的“道德”，谈不上封建的“政事”。所以，这个从小就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切记在心的孔孟之徒，这时更时刻拿这四个字作为“自课之方”（督促和检查自己言行的准则），作为他所指挥的湘军的政治纲领。在“卫道”的旗号下“复”封建统治之“礼”，在“复礼”的过程中“卫”孔孟之“道”——这就是曾国藩一伙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也是《讨粤“匪”檄》这份反革命宣言书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和反革命纲领。

为了“卫道”和“复礼”，曾国藩指挥湘军在长江中下游狼奔豕突，用极残酷的手段屠杀太平军和劳动人民。他叫嚷对革命人民决不“稍待之以宽仁”，而他那一家是“以杀人为业”^①的，并再三再四地命令徒党们要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来“行仁”，说只有放胆放手，

^① 曾《家书》卷七，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大杀特杀，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大局”才能有“转机”^①。在这种反动方针的指导下，他驱赶湘军蹂躏各地，用杀光、烧光、抢光的办法，使各地城乡“男妇逃避，烟火断绝”，妄图把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赶跑、杀绝，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②，从而扑灭革命，实现“复礼”。对于太平军，他更大发其刽子手的兽性，要徒党们以杀得越多越“贵”，越惨越“快”（畅快），还代他的老祖宗表示态度说，即使孔老二复生在今日，也决不会反对“多杀”的。太平军战士一旦落入湘军的魔掌，曾国藩就让喽罗们先剜其双眼，然后用刀将他身上的皮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叫喽罗们生吞。太平军据守的地方一旦被湘军攻陷，湘军就不问战士或平民，逢人便杀，“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至”^③。有的县城，经湘军滥杀之后，全城只剩下十六个人。一时不便于屠杀或来不及屠杀的，曾国藩就运用孔家店“诚信”的哲学，假意宣称全予“宽免”，背地里却命令反动官府把他们“暂时存记”下来，待以后腾出手来，再“按名拿办”，说只有这样彻底地干，才能使地主阶级“稍有安业之日”^④。看！这就是曾国藩这伙卫道士所实践的孔孟之

① 曾《书札》卷四，《与李次青》。

② 曾《奏稿·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

③ 谭嗣同，《仁学》卷下。

④ 《曾国藩未刊信稿》第二三二页。

道，这就是曾国藩这伙“复礼”狂所说的“拯民溺，救民饥”^①！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一切反动派的行动规律。曾国藩本来想用斩尽杀绝的办法来消灭太平军，来阻止人民参加革命，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怀着对曾国藩一伙反动统治者的深仇大恨，奋起加入了太平天国的战斗行列。连曾国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是越“剿”越多，越打越勇，彻底粉碎了他原拟“东征三年”即可完成其“卫道”和“复礼”事业的狂妄图谋。在太平军的猛烈反击下，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一败于岳州（一八五四年四月），二败于靖港（一八五四年五月），三败于湖口（一八五五年初），最后被太平军围困在南昌城中。这个刽子手又怕又气，不止一次地准备自己寻死，甚至连给皇帝的“遗疏”和给家属的“遗嘱”都写好了。只是由于太平军在指挥上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由于混入太平天国内部的阶级敌人于一八五六年在天京发动叛乱，分裂革命队伍，才使曾国藩的湘军幸免了彻底溃灭的厄运。曾国藩就利用时机，猖狂反扑，到一八五六年冬，基本上占领了两湖地区；到一八五八年中，又基本上占领了江西。在此期

① 《求阙斋弟子记》卷一九。

间，湘军也成倍地扩编，成了太平军最凶悍、最顽固的敌人。奕訢看到这时自己的嫡系江北、江南大营已全部崩溃，而曾国藩的湘军却十分得力，就于一八六〇年八月，任命曾国藩为两江（辖苏、皖、赣三省）总督，第二年，又让他节制四省军务。曾国藩借此大力扩充湘军实力，总数达十几万人。

为了“卫道”和“复礼”，曾国藩在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的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全力维护和复辟封建的“四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主张。曾国藩同湘军每占领一地，首先就全部摧毁太平天国各级农民革命政权，残酷捕杀太平天国设置的州县“守土官”和基层政权的各级“乡官”，并把他们连同其祖、父、兄弟和子孙的田地房产“充公”。曾国藩一伙委派的反动官吏又重新登场，对劳动人民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曾被太平军摧毁了的地主政权全面复辟。为了加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曾国藩在各地特设“善后总局”，由本地的“绅董”主持，挨家挨户查抄太平天国留下来的革命文告和其他各种革命文物，严厉禁绝太平天国时期的衣冠装束，并在城乡举办保甲。他把这些都作为“刻不容缓”的“善后要政”，普遍实施，以便让地主族长能“继”其奴役农民的“绝世”，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与此同时，曾国藩于所到之处，又大“举”地主阶级的“逸民”，以此作为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叫嚷，如今天下大乱，士绅和儒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这是他们应该时刻想着的呀！^①因而，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忙着查访和抄辑该地区的“缙绅”名册，根据名册把他们安置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上。一八六〇年他爬上两江总督的高位后，更大力贯彻这一反动方针，特地颁发告示，要各县地主豪绅荐举“人才”，说是“以两江之人（地主阶级）平两江之乱（农民革命）”^②，也就是动员和组织地方的封建势力起来向农民反攻倒算。在曾国藩的支持和鼓动下，大批大批的逃亡地主和反动儒生，从四面八方涌入曾国藩的大营和督署。曾国藩对这些反动“逸民”全行收容，还“月给薪水”，让他们坐食“候差”。同时他还通令所属各府、县，凡是所谓“衣冠右族，死事之家，经生大儒”，州县官吏都要拿出民脂民膏终年无条件地供养他们。于是，曾国藩的湘军大营和两江总督衙门就成了逃亡地主和反动儒生的总汇所，曾国藩本人也成了地主阶级感戴的救星。在一些地区，地主官僚都把这个“复礼”狂的反动画像，如同供奉菩萨一样

① 曾《书札》卷二二，《复郭筠仙中丞》。

② 曾《手书日记》，咸丰十年五月十二日。

供奉起来。

为了“卫道”和“复礼”，曾国藩率同湘军到达的地方，就以帮助地主阶级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全面地恢复封建剥削制度“为第一义”^①。他一面叫地主豪绅搞起“清查田产局”之类的反攻倒算的组织，一面又颁发各种章程和条例，从多方面保障逃亡地主的利益：所有地产统统归所谓“原业主”，即旧地主、旧房产主“管业”和“收租”，并且发给凭单执照，由反动官府加以保护；如有侵犯地主阶级利益，“冒认”土地而不肯交归地主阶级者，就是“恶佃”，“照甘心从‘逆’论”^②，“轻亦立毙杖下”。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地主还乡团紧跟湘军之后，就卷土重来，向农民大举反攻倒算，霸抢了大片土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大小头目，更成了凭借政治权力掠夺土地的急先锋。据曾国藩的女儿供认，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每次带着湘军攻占一个地方，就满载着抢掠来的财物回湘一次，兼并大片土地，因而湘乡曾家就成了湖南境内屈指可数的官僚地主，田地遍及湘乡、湘潭和华容等县。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一度削弱了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就被曾国藩之流“复”了起来。

① 曾《批牍》卷五，《署桐城县薛令元启稟拟查亩催征八条》。

② 同上书，《署徽州府刘守传其稟拟招垦荒田情形》、《颍州府李守文森稟拟淮北善后事宜十条》。

一八六一年秋，奕訢在热河毙命，载淳（同治帝）继位，由于年幼，最高统治权掌握在那拉氏（慈禧太后）手中。她知道，要更快地扑灭太平天国革命，一定要投靠外国侵略者，同时曾国藩这伙汉族军阀官僚也是最大的依靠，因此，对这个大刽子手越发倚重，不仅“东南兵事”交曾贼“专决”，就是北京反动中枢的重要决策，也都事先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后才实行^①。各地的地主豪绅也把曾国藩和湘军视为“关系天下大局，中外人心视为安危向背”^②的台柱子和命根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人力上都给以全力的支持。曾国藩的反动气焰于是就更加嚣张，聚集兵力进攻天京的门户安庆。英、法、美等侵略强盗，这时一面疯狂地诬蔑和攻击太平军，一面源源不绝地向曾国藩等提供新式武器，并且在江浙地区公开组织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洋枪队镇压太平军。曾国藩依靠中外反动派的支持，利用太平天国内部由于叛徒李秀成顽固地执行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而造成的困难局面，驱赶湘军于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间，占领了包括安庆在内的安徽省内的主要城镇，进而围困天京。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围困天京两年之久的湘军用火药轰塌天京城墙，闯入了这个屹立于

①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曾国藩别传》。

② 龙启瑞：《经德堂文集·致刘玉衡书》。

十一年的太平天国首都。一万多名对革命无限忠贞的太平军战士，与几倍于自己、并且配备着新式武器的湘军展开了逐屋争夺，艰苦战斗了十余日，天京终于沦于敌手。野兽般的湘军对全城进行了彻底的烧、杀和洗劫。杀得“秦淮长河，尸首如麻”^①。据曾国藩的一个亲信幕僚供认，“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②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大小头目，人人大发横财，除了金银财帛之外，四十岁以下的妇女，也全被他们掳掠回湘发卖。一时长江上下，挤满了湘军满载赃物和妇女的船只，在一片咒骂声中联樯西上，赶送回湘。平时“诚信”不离口的曾国藩，这时却急忙向其主子“饰奏”，说天京“全无资财，实出意料之外”。使原先抱着极大的分赃欲的清朝反动统治者一无所得，大失所望。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反动、极端凶残、极端贪馋、极端虚伪的复辟狂，却偏偏要捶胸顿足地向别人表白，他是“不要钱”的，“清廉”的很；“不扰民”的，“仁爱”得很；“不敢一毫欺人”，“诚信”得很；“心术正大洁白”，“光明”得很。这种婊子立贞节坊的无耻伎俩，只有曾国藩这类“孔门弟子”才能若无其事的干

① 曾《奏稿》卷二〇，《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全数歼灭折》。

②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得出来。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尽管南方有太平军余部、北方有捻军、西北和西南有回族、苗族起义军仍在坚持战斗，并且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给中外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基本上是过去了。反革命凶手曾国藩得意忘形之余，用他那一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总结他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认为主要是孔孟之道起了作用，特别是由于他们身体力行了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复辟纲领的结果。他宣扬，要想消除农民革命的“邪慝”（音特 tè），归复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所必须采取的途径，不过是“隆礼而已矣”^①。为了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进一步“隆”吃人的封建统治之“礼”，曾国藩就更加卖力地提倡尊孔读经，大兴孔孟之道，为根基虚薄的清王朝提供精神支柱。他到处大修被革命农民捣毁了的儒学；大造什么“昭忠祠”、“节孝坊”，“旌表”那些为“卫道”而死掉的“忠臣”、“烈妇”；大开什么“忠义局”、“清节堂”，豢养那些忠于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地主阶级男女；大办什么“印书局”，大量刊行《四书》、《十三经》，反动理学家

① 曾《文集·江宁府学碑记》。

的著作和他自己的反动奏稿、反动诗文，从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猖狂反扑。一八六六年，他在山东镇压捻军时，还特地赶往邹县和曲阜，朝拜孟轲和孔丘的反动偶像。越到后来，他越发努力装出一副“重道”的模样，每天捧着收载有《大学》、《中庸》等反动篇章的《礼记》，甚至盛暑时节乘船赶路时，都坚持啃读，随时从孔老二那里吸取反革命的精神力量。一八六八年，他调任直隶总督后，还专门炮制黑文，要各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把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为“为学之本”，使“五伦各尽其分”，并诱骗人民也都自觉自愿地用三纲五常的精神枷锁把自己禁锢起来，永远做封建制度的奴隶^①。充分暴露了这个顽儒的狼子野心。清朝反动统治者因为他一辈子“卫道”有术，“复礼”有“功”，就吹捧他为第一号“中兴名臣”。

“忠信笃敬”与“曲全邻好”

在我国历史上，凡属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他们对内要倒退，要复辟，对外就总是要搞民族投降主义。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孔丘和孟轲宣扬的那一套“卖国有理”

^①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的谬论，既是守旧党、复辟狂，又是投降派、卖国贼。曾国藩这个半殖民地时代的卫道士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他把尊孔崇洋、卖国结合起来，把孔孟之道同帝国主义文化结合起来，以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需要。

还在一八四二年，当清朝封建统治者第一次屈膝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的时候，曾国藩就厚颜无耻地为清朝统治者的卖国罪行辩护，说什么只要能使封建统治秩序获得“安堵”，中国这样的大国去事奉外国帝国主义，也是符合孔孟之道的“上策”^①。当时，人民群众反对英国侵略，反对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斗争正在蓬勃开展，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魏源等，也要求改革现状、抵抗侵略。但是，号称理学家的曾国藩，却本能地站在人民爱国抵抗路线的对立面，毫不含糊地倒在统治阶级卖国投降的反动路线一边。可见，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一揭开，曾国藩就以卖国贼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以后，他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远。

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还在曾国藩带着湘军在长江中下游与太平军激战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发动

^① 曾《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军队根本不作认真的抵抗，侵略军就在一八六〇年九、十月间直逼京津。慌了手脚的奕訢几次诏令曾国藩派兵北上“勤王”。曾国藩表面上奉命唯谨，声称自己决心统兵北上，去援救他的“君父”，实际上却一步不动，一兵不发，反而通过广州、上海等地的买办官僚，加紧勾结外国侵略者进攻太平军，力劝清政府对侵略者要“抚”——妥协投降。不久，英法侵略军攻入天津、北京。清政府果然依照曾国藩之流的卖国主张，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密切地结合起来。从外国侵略者方面说，它们“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①。它们虽然从清朝反动统治者那里勒索到许多侵略权利，但是，坚持民族独立、坚持反侵略斗争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却象大山一样横堵在它们面前，使所有这些侵略权利无法完全实现。为了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外国侵略者就更明

^①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四四九页。

确地把维持和加强这个反动王朝，“使它更有力量压平内部的不安（指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最有利”^①的政策，只要清朝这只朽烂的旧船“还有希望浮起的时候，总不愿意让它沉掉。”^②因此，它们就完全扔掉“中立”的骗人幌子，直接出兵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从清朝反动统治方面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逐步摸清了外国侵略者之入侵中国的目的，同中国“前代”那些想“入主中原”的外族不同，不过是想勒索各种侵略权益，充其量是所谓“肢体之患”；而太平天国等人民革命力量，则是要根本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是生死攸关的“心腹之害”^③；因此，就决定“外敦信睦”，用民族权益去“笼络”外国侵略者，共同对付中国人民，“振兴”清王朝的反动统治^④。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反动统治者之间，就如当时英国侵略者所说的，开始“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⑤，出现了所谓“中外（反动派）和好（勾结）”的新局面。精通孔孟卖

① 拉多米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② 米特福：《随使北京》。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第一八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第一八页。

⑤ 野坂正高：《中国和西方》。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一七一页。

国之道的曾国藩，又成了在理论上极力鼓吹这种新关系，在实践中极力促成这种新局面的代表人物。

应该怎样看待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呢？曾国藩搬出孔孟的天命论作为他卖国媚外的理论根据。他宣称：“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①就是说，外国侵略者之侵略中国，是老天爷安排的，因而是合理的，是人力无法违抗、无法补救的，谁如果要想赶走侵略强盗，那就是“代天作主张”，注定是徒劳的。那么，应该怎样办才好呢？他搬出孔老二“中和”、“礼让”等反动遗教，无耻地宣称：“中国民军”对于外国侵略者“但有和让，更无别义”^②。为了推行这条民族投降主义的卖国路线，他竟厚颜无耻地宣扬外国侵略者对中国“颇有君子之行”，“自谓仁至义尽矣”，是讲究孔孟“恕道”的^③；并赞扬外国侵略者也是讲究孔孟的“信义”的，说他们“与我同其利害”，不会借端要挟。他特别举出英、法等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进了北京却不损害清朝统治，同时在南方还出兵帮助“攻剿”太平天国，“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

① 曾《批牍》卷三，《批候选训导计棠稟呈子中采访记略折》。

② 曾《书札》卷一九，《复李少荃中丞》。

③ 曾《奏稿·议复借洋兵剿贼片》。

大者而怨其小者。”^①总而言之，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领土也好，践踏中国主权也好，屠杀中国人民也好，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对中国进行疯狂的经济、政治、文化侵略也好，在卖国贼曾国藩看来，都是无足挂齿的“小事”，要紧的是要感外国侵略者帮助镇压革命之“恩”，报外国侵略者维护清朝反动统治之“德”！

为了报外国侵略者之“德”，替外国侵略者拔除侵略中国的最大障碍——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就公开鼓吹“借洋兵助剿”。一八六〇年，沙皇政府向清王朝表示它要出兵帮同清王朝“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就宣传刚从中国侵吞了几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沙俄与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嫌怨”，建议清政府伺机同沙俄共同商订镇压太平天国的办法。特别是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当太平军向江浙胜利进军，中外反动派被打得鬼哭狼嚎的时候，曾国藩惊恐万分，急呼“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特向清政府建议借助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代复中国之疆土”。为此，他谆谆嘱托在上海直接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要他用心勾结洋主子，对美国侵略强盗、“洋枪队”头子华尔等，要尽力巴结，“使为我用”；甚至交代洋兵奸淫掳

^① 曾《手书记》，同治元年五月七日。

掠，也要“相敬相让”，“克城所获”，可“任其取携”^①，为了更好地贯彻其投降卖国路线，他特地抬出其祖师爷孔老二，说对待外国侵略者，就应该遵照孔老二“言忠信”、“行笃敬”的反动遗教办事：一要“虚心相待，不宜少存猜疑”，“切不可露傲惰之象”，也就是要彻底撤除民族界线，做外国侵略者恭顺而又勤奋的奴才；二要“以至诚相与”，“无欺诈之心”，“无欺诈之言”，也就是要牢记自己的奴才身份，对主子须完全忠诚老实；三要“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也就是要慷慨地出卖民族权益，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一切侵略要求；四要“切诫西洋诸国，（对太平军）不可轻敌”，也就是劝告侵略者从清军的惨败中吸取教训，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②。李鸿章依据曾国藩这种“和让”原则行事，果然很快就讨得了洋主子的欢心。曾国藩本人自然更被外国侵略者所看重。一八六四年五、六月间，当曾国藩的湘军正全力围攻天京的时候，江西、江苏等省因为各自要扩充反动武装，停解了湘军军饷，北京的户部也不名一钱。得不到银子，湘军将卒就不会卖命，不仅围困快两年的天京攻不下来，就连这支反动军队本身都有哗变的危

① 《曾国藩未刊信稿》，《复潘玉泉观察》。

② 曾《书札》卷一七，《复周弢甫》；卷一八，《复李少荃》、《复李少荃中丞》；卷三〇，《复应敏斋观察》。

险。急得曾国藩四处呼号，“束手无策”。在这紧要时刻，窃据了清朝总税务司职位的英国侵略分子赫德，根据外国侵略者的共同意愿，把他一手把持的轮船经费银五十万两，全数转拨给曾国藩，其中的十九万元本已汇往英国，赫德亦想方设法，“于数万里外如数汇完”。曾国藩喜出望外，说“全赖此项经费，保全危局，鼓舞军心”，成全了攻占天京的“大功”。对于赫德能“竭力经营”^①，表示非常满意和感激。

要做外国侵略者感恩戴德的奴才，就要有一副奴才的媚骨。曾国藩在与外国侵略者勾搭的过程中，深感这个新主子架子之大，脾气之坏，说他们总是“欺侮诡譎（音轨决guǐjué，奸猾欺诈之意），蔑视一切”^②，根本不把他这类“中华大吏”放在眼里。有时，他想到“领事之蛮横，洋人之猖獗”^③，内心难免有些愤愤不平。但是，为了求得洋主子的宠信和帮助，他就向徒党们传授孔家店“谦恭逊顺”的诀窍，叮嘱他们，不管洋主子怎样颐指气使，目空一切，自己都要象一个麻木不仁的傻瓜一样，装聋作哑，逆来顺受。他还率先示范，给徒党们做出卖国媚外的榜样。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一日，英国驻上海

① 曾《奏稿·报收轮船经费拨解银两折》。

② 曾《书札》卷一九，《复李少荃中丞》。

③ 曾《手书记》，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领事麦华陀要见他这个两江总督。曾国藩闻讯之后，料定麦华陀届时必要“无礼”一番，整日为之焦虑不安。见面会谈之时，麦华陀果然拿出主子的派头，既“桀骜”（音杰熬jié áo，蛮不讲理的样子），又“糊涂”（不能充分体会曾国藩崇洋媚外的苦心），使这个两江总督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但曾国藩仍然是一副“谦恭逊顺”的模样，低声下气地答话，唯恐“引动”这个洋主子的“忿气”①，表现出十足的奴才相。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外国侵略者为了使腐朽无能的清朝反动统治者有力量替他们统治中国人民，便“尽一切努力来劝这个不幸的政府自救”②。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这种政治需要，向帝国主义“报德”，曾国藩就变本加厉地推行卖国媚外路线，进一步搞起了“洋务运动”——用近代军事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还在他联合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就深感外国侵略者提供的新式枪炮的“威力”。一八六二年，他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筹集经费购买“洋船炮”，说这不仅是“今日救时（镇压农民革命）之第一要务”③，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设法自行造船制

① 曾《手书记》，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② 米特福：《随使北京》。

③ 曾《奏稿·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炮，为巩固反动统治提供“永远之利”^①。基于这种考虑，他一面通过上海等地的买办官僚广购船炮，一面又派专人去美国采购机器，以便自行设厂制造新式船炮。他特别搬出孟轲“如耻之莫若师文王”^②的“遗教”，兜售儒家“小国师大国”的卖国哲学，大发崇洋卖国的谬论。他宣称，只有赶紧如外国侵略者所希望的那样，用洋枪洋炮和轮船把自身武装起来，加强镇压人民革命的力量，对外国侵略者才“报德有其具”——有替洋主子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物质手段了^③。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他就与李鸿章等买办官僚一道，办起了制造新式船炮的工厂，成了早期买办化的封建官僚，即所谓“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就在曾国藩一伙卖身投靠外国侵略者，把我们伟大的祖国拖向半殖民地的深渊的时候，中国人民怒吼了！从六十年代开始，贵州、四川、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台湾、河南和其他许多省区，以“反洋教”运动为表现形式的人民反侵略斗争，在各地城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族人民从无数活生生的事实中认识

① 同上书，《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

② 《曾国藩未刊信稿》，第二六五页。孟轲原话见《孟子·离娄上》。此语的原意是：如以为耻，那最好就去效法周文王。

③ 曾《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七日。

到，封建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总是“礼让”的，“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①，只有坚决反抗，才能粉碎侵略者的罪恶图谋。一八六六年，总理衙门（清政府总管对外交涉和各种“洋务”事业的机构）在一份报告中说到，几年之中，各省送来有关“教案”的报告，有如雪片飞来，以至该衙门日夜加班，都审理和批答不完。可见斗争的频繁和广泛。到一八七〇年，就发生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八七〇年六月，天津人民因法国天主堂虐杀中国婴孩，逼同地方官吏与人民一道前往教堂查验。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拿出洋主子的架式，强令清朝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当场向崇厚连开两枪，随后又拔刀乱砍，直冲街市，枪击路遇的天津知县刘杰。天津市民目睹这个外国侵略分子无法无天的暴行，人人怒火中烧，万拳齐举，当场把丰大业击毙，并严惩了一批外国侵略分子。这就是所谓“天津教案”。事情发生后，外国侵略者害怕遭到我国人民的继续惩罚，就联合起来胁迫清政府镇压人民的爱国行动。曾国藩这条外国侵略者的走狗，首先被中外反动派选中来扑灭人民群众的反侵略烈火。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二，第三三页。

对于如何侍候外国主子，曾国藩是很有经验的。他受命之后，就一反往时惯例，特地不带警卫部队，只让少数随员陪同他小心翼翼地进入天津，免得外国侵略者误以为他有“防御”的打算而对他的忠诚产生怀疑。进入天津以后，崇厚告诉他说：“洋人将大兴波澜”。曾国藩一听此言，吓得心惊胆颤、眼泪鼻涕都流了出来^①。有人向他建议乘此人民同仇敌忾之机，与侵略者“决战”，既可替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撵出北京的奕訢“雪耻”，又可以借此满足人民群众的反侵略要求。他一闻此言，赶忙嗤之以鼻，并大摇其头，说“只此一事，不愿再办！”^②为什么呢？他的弟弟曾国荃替他道出了此中奥秘。曾国荃说：“若与西人开衅，有十二字箴言你须紧记：先到先败，后到后败，不到不败。”^③因此，当有些买办官僚向曾国藩提出，中国兵弱将缺，沿海沿江又谈不上什么防务设施，一旦与外国开战，不仅法国，其他各国也都会联合起来同中国作对，中国能御之于一个海口，却没有力量御之于沿海七省各海口，即使能坚持抵抗一、二年，却不可能坚持抵抗数十、百年，除妥协投降外，没有别的选择。他连连点头，赞不绝口。从

① 曾《手书记》，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② 刘声木：《苕楚斋随笔·四笔》，卷三。

③ 同上。

这种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谬论出发，他在一份奏折中总结了一八四〇年以后清朝的对外关系，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段时期，清政府对于外国的最大失策，就是没有把妥协投降作为坚定的方针，结果导致外国的入侵日益加深，弄得“不可收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吸取教训，“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结果中外相安，十年都太平无事；现在如果同法国开战，即令今年我能侥幸获胜，明年他还要再来，即使天津能挡住法国的进攻，沿海其他省区却不可能都能防备。据此，曾国藩向清政府提出：目前对法国固然只能妥协投降，就是今后对所有各国，也应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用委曲求全来“善全和局”^①。清朝统治者赞同他的卖国主张，叫他放手去办。

要向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就必须承认外国侵略者侵略有理，中国人民反侵略有罪。自誓要“终身”学习孟轲的曾国藩，对孟轲宣扬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骗人哲学，一直是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的。本来，在无数的事实面前，曾国藩是知道“领事之蛮横，洋人之猖獗”，“教民好欺不吃教百姓”^②的；当时天津地

^① 曾《奏稿·复陈津案各情片》。

^② 《曾国藩手书日记》，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方官吏前往天主堂查验，也亲眼看到法国教士残害中国婴孩的铁证，并向曾国藩作了报告。但是，早已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洋主子的曾国藩却认为，即使“曲在洋人”，也必须以曲为直，承认他们侵略有理，中国人民反侵略有罪，“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①既能保全洋人的面子和威风，又能显示清政府巴结讨好之真心。因此，他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厚颜无耻地以一个帝国主义辩护士的身份，竭力为侵略者辩护。他说，根据他的“理”来推断，洋人都是文明的、仁慈的，“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人民揭发的天主堂种种暴行，“必无是事”！他公然替丰大业打抱不平，说什么“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暴之谤”，因而气愤横行是完全合“理”的！他大骂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什么“刁风”，恶狠狠地叫嚷“刁风尤不可长”，务必“捕拿严惩，以儆将来”。于是，他就完全遵照外国侵略者的旨意，捉拿了五十多名所谓“人犯”，关押在他的衙门里日夜吊打逼供。最后决定杀掉二十名反侵略英雄，说是给几个死有余辜的侵略强盗“抵命”；另将二十五名爱国志士充军，算是对洋主子的“抚慰”；还建议清政府公开发布“谕旨”，在全国、全世界“雪洋人之‘冤’”，“昭示公道！”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二，第三二页。

他恬不知耻地说，这样办理，“不惟是对法国，并堪遍告诸邦。”^①为自己能讨得法国和其他各国的欢心而自鸣得意，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从此，这个卖国贼的“大名”就更加“遍播西方”^②，成了帝国主义中意的走狗。

对于这样一个无耻媚外的卖国贼，人民群众无不恨之入骨，“举国欲杀”^③。曾国藩贴在街上的告示，有的被撕掉，有的被挂上麻绳，暗示曾国藩为洋主子披麻戴孝，望其速死。在京的湖南人则把曾贼为湖南会馆写的题匾砸掉，并把他开除出“同乡会”。人们还创作了许多快板书、板画、揭帖和檄文，在南北各省广泛传播，号召人民起来与中外反动派展开新的斗争，各地人民群众接二连三地掀起了新的反侵略斗争，用实际行动来声讨和批判曾国藩之流的卖国罪行。就是统治阶级中一些还有点民族自尊心的人，对曾国藩也大表不满。一八七一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在举国咒骂声中，竟于总督衙门大摆筵席，庆祝他六十岁生日。在大小官员向他劝酒祝寿的热闹时刻，有人却在大厅的柱上写上一首诗：“笙歌缭绕绮筵开，此日中堂(曾国藩)亦快哉！知否黑龙江上客（因天津教案被充军黑龙江的

① 曾《奏稿·查明津案大概情形折、复陈津案各情折》。

② 《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〇，第二六页。

③ 梁启超，《李鸿章》。

人),满天风雪逐尘来!”^①气得曾国藩头昏眼瞎,卧床不起。清朝反动统治者为了平息事端,赶忙把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调来接替直隶总督。一八七二年三月,这个毕生为孔家店“卫道”、为封建统治“隆礼”、为外国侵略者效劳的大刽子手、大投降派,就在一片声讨声中,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但是,曾国藩所宣扬的尊孔守旧、崇洋卖国的反动谬论和卖国哲学,所推行的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路线,集中反映了地主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就被以后的反动派完全继承了下来。他们把这个近代中国尊孔、卖国的开山祖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顶礼膜拜,极力吹捧,妄图借助曾贼的亡灵,来倒转历史的车轮。清朝末年,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回顾了曾国藩以来的历史,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曾国藩)之政术、学术也。”^②就是说,从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到策略手段,都是从曾国藩这个把尊孔复辟与崇洋卖国结合起来的开山祖师那里继承下来的。在曾国藩身死以后,为中外反动派最宠信的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人物李鸿章,就是曾国藩反动衣钵的直接继承者。

① 刘声木:《苕楚斋随笔·四笔》,卷四,第五页。

② 夏震武:《灵峰先生集》卷四。

二、以“圣道”为护符的 大卖国贼李鸿章

李鸿章自称是曾国藩门下“传徒习教之人”^①。也就是曾贼反动衣钵的直接继承者。在他掌握清末政治、军事和外交大权的三十年中，不仅继承了而且大大发展了曾国藩尊孔卖国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并进一步发挥孔孟的反动遗教，制造和宣扬一整套民族投降主义的卖国哲学，干尽了卖国媚外的罪恶勾当。如果说，活动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尊孔、卖国的开山祖师，那么活动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的李鸿章，可以说是清末尊孔卖国的集大成者。

侵略者眼中“最杰出的人物”

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年)，安徽合肥人，

^① 李鸿章《朋僚函稿》(以下凡是《李鸿章奏稿》、《李鸿章朋僚函稿》、《李鸿章译署函稿》、《李鸿章电稿》等，均分别简称为李《奏稿》、《朋稿》、《译稿》、《电稿》)卷一，第一二页。

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从小受反动儒家的传统教育。一八四七年他考中进士，在北京翰林院任职。当时，曾国藩正在北京极力提倡程朱理学，以拯救反动统治，对李鸿章的反革命才干颇为赏识。李鸿章于是就投入曾国藩的门下，每天跟着曾国藩“讲求义理经世之学”^①。曾贼对这株反动苗子，加意栽培，用反动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把他武装起来。五十年代初，曾国藩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李鸿章也回安徽组织地主武装，多次被太平军和捻军打得溃不成军。因为他很善于逃跑，所以被称为“李溜子”而貽笑远近。一八五八年，这个“溜子”一溜而进入曾国藩在江西的湘军大营，以一个“幕客”的身分为曾出谋献策，显出他颇有一些反革命才能。曾国藩对他也另眼相看，“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②。于是，李鸿章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成了曾贼“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③的反革命衣钵继承人。

一八六二年，太平军向江苏大举进军，迅速解放了苏南各主要城镇，清朝在江南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在农民革命军队的扫荡下，各州县的地主豪绅纷纷逃

① 梁启超：《李鸿章》。

② 刘声木：《异辞录》卷一，第二一页。

③ 李《朋稿》卷一二，第五页。

入当时的白色孤岛——上海。上海从一八四二年开放以后，成为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培植的买办势力发展很快，这时又汇聚了大量的逃亡地主，成了当时中国最反动、最黑暗的社会势力——洋行买办和官僚地主阶级集结的地方。他们为了对抗太平天国革命，搞了一个汉奸组织——“会防局”，专门策划勾结外国侵略者、对抗太平军的反革命事业。这些人“久已归心洋人”，“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①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完全撤除了民族界线，无耻地向侵略者奉送国家主权，把上海“内外各事”，不管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都交给外国侵略者“主持”。洋人在这块中国土地上成了“为所欲为”^②的真正统治者，清朝官吏只是收收税捐，筹款供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几千名由洋人统带的“洋枪队”而已。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会防局”中的逃亡地主和买办的头子们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向当时已任两江总督并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求救。曾国藩就向清朝政府推荐李鸿章，说李“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可去江苏对抗太平军。这一年的四月，李鸿章依靠“会防局”的财政支持，率领几千名由皖北地主武装扩建起来的淮军，在外国轮船的

① 李《朋稿》卷一，第一七页。

② 同上书，卷一，第四六页。

护送下，到达了上海。

李鸿章一到上海，很快就成为地主买办的代言人。他深知，凭着自己手下几千名临时拼凑起来的淮军，去与几十万久经战斗的太平军较量，那真是螳臂挡车，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太平军吃掉。因此，他就遵照曾国藩的教导，跪倒在洋主子的脚下，请求外国侵略者协助来镇压太平军。对于曾国藩传授的孔门卖国诀窍——对外国侵略者要“和让”，要“言忠信，行笃敬”，他更是心领神会，恪守不移。原任江苏巡抚薛焕，虽然在出卖国家主权上毫不吝惜，但有时却要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讲一些封建官府的“体制”，所以受到各国的嫌憎。李鸿章认为，“华夷混一局势已成”，不应“强分界疆”^①。因而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始终以恭顺的奴才自居，低声下气，巴结奉迎。对于英国水师提督何伯等当时上海的真正统治者，他固然“曲意联络”，唯命是听，就是对于名为他的下属的“洋枪队”头子、美国人华尔等，他虽认定是“蠢然一物”，但也“全神笼络”，借此“以联各国之好”^②，即讨取所有洋主子的欢心。果然成效显著，不长的时间内他就获得了洋大人的青睐。他在得意忘形之余，特地写信向曾国藩报喜，说洋大人们因感到他

① 李《朋稿》卷一，第九页。

② 同上书，卷一，第五四页；李《奏稿》，卷四，《驾馭西兵片》。

确实凛遵孔老二的遗教，对他们“忠”而且“信”因而经常前来主动表示“亲近”^①。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何伯等对他的“礼貌”和“情谊”，都是过去上海的官僚所没有获得过的。这就是说，他靠着曾国藩传授的儒家卖国诀窍，已经被洋主子认可为一条合格的走狗了。

事实证明，李鸿章的观察并没有错，他卖身投靠外国侵略者的期望并没有落空。英、法、俄、美等以后就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英、法、美等派遣侵略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协同作战，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江、浙两省的一、二十个重要城镇；源源不绝地向淮军和“洋枪队”提供洋枪洋炮和弹药，还派大批军官担任各支淮军的“教练”，使这支反动军队尽快地掌握新式武器；连续向李鸿章提供低息贷款，并通过它们控制的海关，每月拿出十几万两白银供李鸿章使用；帮助李鸿章开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火工厂——苏州炮局，自行制造新式的杀人武器。这样，李鸿章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就迅速膨胀起来。原先一切都仿照曾国藩的湘军而组织起来的淮军，这时也迅速买办化，完全抛弃了湘军的旧规制，“阵法用泰西，鸣角出令皆夷语”^②，实际上是一支中外反动派共同豢养、共同指挥的反动

① 李《朋稿》卷一，第二五页。

② 王闿运，《湘军志》卷一〇，第一〇页。

武装。虽然，它同“洋枪队”一道，多次被太平军打得大败，但是由于有外国侵略者和地主买办的全力支持，它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扩展到三、四万人，先后从太平军手中占夺了苏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浙江的部分州县，最后与湘军一道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曾国藩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回湘，李鸿章的淮军于是就成了中外反动派镇压人民革命的主要力量。当时，在北方坚持了十多年武装斗争的捻军仍在继续战斗。他们与太平军余部联合在一起，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连大败各路反动军队。一八六五年五月，在山东境内围歼了清军统帅僧格林沁部，当场把僧击毙。随后又长驱进入河南，驰骋于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直隶等省的广大城乡，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清军新统帅曾国藩的“围堵”计划，声势更盛。一八六六年十一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替败将曾国藩。许多英、美、法等国的侵略强盗，从原先江浙地区的“洋枪队”转入淮军各营，带着大批洋枪洋炮，帮同李鸿章镇压了北方的捻军。李鸿章因为同曾国藩等一起复辟反动统治有“功”，就被中外反动派吹捧为仅次于曾国藩的“中兴名臣”。

对于这样一个既有实力又忠实可靠的走狗，外国

侵略者自然是非常赏识的。曾任“洋枪队”的头子的英国人戈登,就称赞李鸿章是“清朝最杰出的人物”,认为“在李鸿章与其他清朝官员竞争的时候,英国政府支持他将是最好的政策。”^①事实上,以后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和法国,就是这样干的。一八六六年,狂妄的法国侵略者甚至公然向清政府提出:把掌管外交大权的总理衙门交给李鸿章掌管,以便他更好地履行其外国侵略者代理人的职务。无怪乎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发生时,中外反动派就特地把他从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前线——陕西调到直隶,与曾国藩一道镇压人民的反侵略爱国运动。外国侵略者当面奖励这条走狗说:如果你在天津,就决不会发生这次教案。现在你能早到一日,此案必定早结一日^②。表示了对李鸿章的充分信任。果然,李鸿章到保定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之后,就急急忙忙向侵略者“满口认错”^③,“事事认错”^④,并“日夜缉讯”参加反侵略爱国运动的天津市民,用卖国媚外的实际行动向洋主子表示了他这个奴才“厚待相好之意”^⑤。从此,李鸿章就

① 王崇武等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第二四五页。

② 李《朋稿》卷一〇,第二五页。

③ 同上书,卷一〇,第一〇页。

④ 李《奏稿》卷一六,第三五页。

⑤ 李《译稿》卷一,第三页。

更加博得了帝国主义的宠信，清朝反动统治者对他也愈加倚重，让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一最有权势的职位，直接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成为统治集团中最显赫的代表人物。

一手软刀子，一手洋刀子

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大大地削弱了这个地主阶级政权统治人民的力量；打击了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大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革命精神。经过农民革命铁扫帚的清扫，象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在革命后，曾国藩、李鸿章一伙反动统治者在这里举行科举考试时，许多封建知识分子想求取一部《四书》都不可得。湖北一省，据李鸿章一八六九年报告，官僚地主家里所藏的封建典籍和书板，几乎毁散精光，街市书店也无从购求。所谓“书籍荡然，人不知义”（不信孔孟之道）^①，是当时南北各地的普遍情形。由于中外反动派在太平天国革命后猖狂地向中国人民反攻倒算，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

^① 高钊中：《上于次棠中丞书》。

而进一步深化，人民群众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蓄积力量，酝酿新的革命斗争。就在反动统治者无耻地吹嘘所谓“中兴”的时候，各地督抚都纷纷向清政府陈诉说，人民群众不仅没有因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屠杀而变得“驯顺”起来，反而保存和发扬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养成的“顽习”^①，“桀黠冥顽，不可教训”^②，就连过去受封建思想毒害较深的一些人，再也不象从前那样讲“礼让”和“畏法”，而是“习于抗租”^③了。在一些地区，人民群众还动辄“聚众抗官”，“其犷悍凶横之为，多有非思议所及者。”^④反动统治者这些诬蔑和谩骂，不仅暴露了他们自身的虚弱和恐惧，也从反面反映出太平天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许多省区的劳动群众继承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发动了广泛的反封建斗争，特别是以反洋教为表现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在六、七十年代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这些情况表明，经过太平天国革命后，清朝反动统治者的“太平岁月”再也不会重来了。

为了稳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消除人民革命这一潜在的、巨大的、致命的威胁，清朝反动统治

① 高钊中：《邢守道墓志铭》。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一六九页。

③ 光绪《嘉善县志》。

④ 《张树声奏议》卷二，查办贵县、桂平、惠州事情各折。

者在太平天国革命后，一方面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协助，不遗余力地加强其反革命专政的柱石——反动军队；另一方面又乞灵于孔孟之道，通令各省反动官府赶紧“振兴文教”。于是，各省的反动统治者也紧步曾国藩的后尘，纷纷兴儒学，修孔庙，设书局，大量刊行《四书》《五经》等儒家反动典籍，出现了一股新的尊孔读经的恶浪，以此作为“弭乱”的“根本之图”。外国侵略者出于同样的政治需要，在帮助清朝反动统治者加强反革命武装的同时，也加入了这场尊孔的大合唱。披着“传教士”外衣的李提摩太之流，这时就公开鼓吹孔教，把孔孟之道和基督教比作一辆车子上的两个轮子，说什么靠着这两个轮子，中国就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上进行得“尤稳而尤速”^①。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也居心叵测地称赞中国的“圣教文化”，说它使西方各国“无不欣慕尊崇”^②。俄国驻北京公使更别有用心地鼓吹，要“使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相结合”^③。这表明，中外反动派在政治上密切勾结的同时，在思想文化上也开始结成了反动同盟，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作为曾国藩的门徒和反革命“卫道”事业的继承

① 李提摩太：《新政策》。

② 威妥玛：《新议略论》。

③ 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一九八页。

者的李鸿章，是很懂得孔孟之道对于巩固清朝反动统治的重要作用的。因此，他也摇旗呐喊，卖力地宣扬孔孟之道。他向清朝反动统治者提出：“弭乱之道，以倡明正学为先。”^①就是说，要消除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斗争，首要的事是提倡孔孟之道。他特别举出孔老二的故乡山东的地主豪绅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期间顽固抗拒农民革命的事例，证明孔孟之道对于巩固反动统治的作用。一八六八年，当他统带淮军正与捻军激战的时候，就急急忙忙修复他所谓的“重道崇儒根本之地”——曲阜孔庙。以后，他历任两江、湖广、直隶、两广等地的总督，数十年间，他自称“书生结习”都时刻在心^②。《十三经》、《大学衍义》等儒家经籍以及一些反动理学家的著作，他都极力提倡，搜罗研读，从中吸取反革命的精神力量。所到之地，他“尤以振兴学校、培植人才为已任”^③，修孔庙，办书院，兴儒学，设书局，极力提倡尊孔读经。他不打自招地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群众都遵照孔孟的“礼让”行事，“默化”掉一切反抗思想^④。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向清朝反动统

① 李《奏稿》卷一四，第四八页。

② 李《朋稿》卷一八，第八页。

③ 李《全集》卷首，刘坤一奏。

④ 李《奏稿》卷一五，第二四页。

治者建议，旌表各式各样的“孝子”、“孝女”，崇祀历代反动理学家；还搞什么“清节堂”、“崇善堂”，借以“风世励俗”、“维持风化”^①。与此同时，他还竭力鼓吹所谓“诚敬”、“尽礼”、“克己”、“明理”等等孔孟之道，说这些都是“有关于世道人心”的宝贝^②。总之，是千方百计用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用三纲五常的精神锁链把劳动人民紧紧地捆缚起来，以达到所谓“郅治（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保邦（维持清王朝统治）”^③的反动目的。

前面曾经说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反动统治者同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形成了以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为共同基础，以孔孟之道为联系纽带的“中外和好”。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而飞黄腾达起来的李鸿章，比当时的地主阶级顽固派，比旧式的孔孟之徒，更懂得中外反动派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在外国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已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④，清朝统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要在这样的大“变局”中苟延残喘，只在八股和书法中讨生活是不行的，要紧的是处理好与外国的关系，对外实行“和戎”（向帝

① 李《奏稿》卷三五，第二五页；卷二九，第一三页。

② 同上书，卷三一，第四三页。

③ 同上书，卷九，第三五页。

④ 同上书，卷二四，第一一页。

国主义妥协投降),对内实行“变法”,这样,才能“尊主(中外反动主子)庇民(地主买办阶级)”。否则的话,他认为就是“视国事如儿戏”,必“败亡灭绝”而后已。因此,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李鸿章就在竭力鼓吹孔孟之道的同时,又在“自强”和“求富”的骗人旗号下,办起一系列“洋务”事业来,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孔孟之徒。

李鸿章所说的“变法”,主要就是学习和采用西方军事技术,以加强反动统治。在这个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看来,“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就是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是尽善尽美的,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野蛮的、没有开化的习俗,根本无法比拟,唯独洋枪洋炮,中国比西方差得很远。根据他自己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反革命经验,八旗、绿营等沿用旧式武器的反动武装,不但无力抵御外国,而且“不足以灭土寇”(国内人民革命力量)^②,更难以应付眼前和以后的“变局”。因此,他向清朝反动统治者提出:其他各种经费开支均可以节省,唯独购置枪炮、制造轮船、豢养军队的费用,万万节约不得;必须“倾国”去办这些“洋务”,尽快地用近代军事技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九页。

② 李《奏稿》卷二四,第一三页。

术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在“变局”之中延年益寿。他洋洋得意地向同伙们宣传：“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①。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维护孔孟“圣道”就必须讲究“洋务”。所以他无耻地吹捧一些主张大办洋务的买办官僚，说他们比孔老二门下的“四科十哲”都高贵，简直可以视为当代的“圣人”了^②。

这样，李鸿章就与地主阶级顽固派，即主张光靠孔孟之道而反对学习西方技术的旧式孔孟之徒不同，成了一个适合中外反动派共同需要，以办“洋务”为职志的近代化的孔孟之徒。还在一八六三年，当他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他对洋枪洋炮就红了眼，要徒党们坚定不移地跟他一道“学洋人”^③。他靠洋人提供的新式武器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后，更把制造新式武器和加强他指挥的淮军，作为“身心性命之学”，并向那拉氏表示，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要把这些事业坚持办下去，不分昼夜，全力以赴^④。从一八

① 李《朋稿》卷一六，第三〇页。

② 同上书，卷一五，第六页。孔老二教授门徒，分作“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四科”，其中最突出的有颜渊等十人，即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的“十哲”。

③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四页。

④ 李《奏稿》卷一七，第一六、五〇页。

六三年，他在江苏松江搞起第一个小型军火厂开始，以后发展成为苏州炮局（一八六三年）、江南制造总局（一八六五年）、金陵机器局（一八六五年）、天津机器局（一八七〇年），专门制造枪炮、弹药和修造轮船。为了给这些军火工业提供财源，李鸿章接着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开平矿务局（一八七七年）、上海机器织布局（一八八二年）、上海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一八九四年）等企业。在此期间，他又四处张罗巨款，购买洋船，聘请洋教练，搞了一支“北洋海军”。因为在当时的买办官僚中，李鸿章最狂热地鼓吹“洋务”，办了最多的“洋务”，所以他就成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结合的产儿——“洋务派”的旗帜和头目。这种经过外国侵略者改造和武装了的反动派，由于一手拿着孔孟之道的软刀子，一手拿着洋枪洋炮的洋刀子，所以就特别具有反动性。

李鸿章搞这种“洋务”事业的过程，也就是把尊孔守旧和崇洋卖国结合起来的过程。在他看来，一切都是洋人的好，中国一切都不行。他所办的各种企业，不管是早期的、晚期的，军用的、民用的，从设备、原料到人员、技术以至燃料，无一不仰赖洋人的鼻息，否则就“寸步不行”，实际上完全是外国军火厂的附庸。就拿规模最大的江南制造总局来说，其设备和技术固然

来自外国，其生产和管理也仰赖洋人。中外关系一紧张，帝国主义就中断供应各种材料，工厂就无法制造军火，因而这些工厂只能生产屠杀国内人民的武器，而不能用以对付外国侵略者。在李鸿章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下，淮军各将领也无不“倚洋人为重”^①，“见了百姓就瞪眼，见了洋人叫祖宗。”^②其结果，是使清朝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更依赖外国侵略者，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李鸿章因此就更加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赏识和重视，“他们总是在贷款、武器装备、军队训练各方面给以充分的帮助”，使李鸿章等“充分地强有力，来为他们的利益而统治着中国。”^③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打着“自强”和“求富”的骗人旗号的李鸿章，不过是一个懂得采用西方军事技术来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孔孟之徒，“他除了谈洋务仿佛很内行之外，与其他中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不同”。^④

李鸿章这样卖力地大兴孔孟之道，大办洋务事业，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七，第八页。

② 《中国歌谣资料》第一集，第一五六页。

③ 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

④ 赫德语。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八四页。

本来是指望用软刀子和洋刀子并举的办法，把中国人民的手脚捆缚起来，替中外反动派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天下”。但是，“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中法战争（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以后，日趋高涨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彻底粉碎了李鸿章等一小撮反动派的迷梦。就在李鸿章挥舞这两把刀子的二十多年中，东起台湾，西迄天山，南起两广，北至东北，各族人民挣脱了反动派强加的精神枷锁——孔孟之道，“肆行无忌，愍（音敏mǐn）不畏法，日甚一日。”^②各种形式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目标越来越明确，有的发展成为数万人的武装起义。在斗争中，革命群众严厉声讨外国侵略者“殫我民财”、“谋我土地”、“显招爪牙”等种种“无法无天”的侵略，也无情地揭露了清朝反动统治者甘受外国侵略者“驱使”，“助桀为虐”的罪行，响亮地发出了“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的誓言，连续不断地冲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使中外反动派没有过过一天安稳的日

①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八六页。

② 《曾国荃书札》卷二一，《复崧镇帅》。

子。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革命形势更日趋成熟，连狂妄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也胆颤心惊。一八九一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恐惧笼罩着整个中国，……激动煽惑性的传单张贴在各地，号召人民起来，消灭外国人，并进军北京，推翻现在的王朝。”^①为了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烈火，“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了”，但“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②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三日，上海一份帝国主义办的报纸——《北华捷报》，惶然地指出：“中华帝国正迅速地临近朝代革命或解体的漩涡中。”^③继太平天国和各族人民大起义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近代中国第二次革命高潮又要到来了，中外反动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圣道”与卖国

倒退、复辟、卖国的孔孟之道，到了近代孔孟之徒手里，为了他们投靠洋主子的需要，其卖国主义方面得到恶性发挥。以“圣道”为护符的卖国贼李鸿章就是他

① 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二卷，第六〇〇页。

② 同上书，第六〇一、六〇二页。

③ 麦克唐格，《英国的远东政策，1894—1900》，第一〇五页。

们的典型代表。

为什么一些亚洲国家在近代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地呢？李鸿章搬出孔老二的“天命论”，宣称：这是“气运”决定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是“人力”所无法抗拒、无法改变的^①。在这个孔老二的信徒看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②，人们可以为着实现某种目的而进行各种谋画和努力，但是这一事业能否办成功，却完全由老天爷决定的。这样，如同孔老二把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说成是“天命”那样，李鸿章就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执行老天爷的意志，要人们乖乖地接受这种“天意”的支配，任何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和言行，都是违背天意的，徒劳的。

为什么中国被帝国主义强加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废除不得呢？李鸿章援引孟轲“国必自伐而后人伐”^③的谰调，宣称那是由于被侵略国家自己不长进、不争气的缘故。即如治外法权一项，李鸿章说，虽然从“万国公法”来说，“最为不合”，但是由于我中国统治者守定数千年相传的司法和刑事制度，不能适应外国的

① 李《奏稿》卷三八，第二五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四三页。

③ 李《译稿》卷一七，第三四页。孟轲原话见《孟子·离娄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必有自取讨伐的原因，别国才讨伐它。

习俗和需要，这样而要“强”使帝国主义各国在华人员归中国法律管辖，即使巴西、秘鲁等“小邦”也都不愿意^①，英、美、俄、法等帝国主义大国要坚持这一侵略特权、破坏中国的司法完整就很自然的了。

为什么帝国主义要用武力侵略中国，勒索利权呢？李鸿章宣称，那是因为中国一些当权的官僚，一些外交人员，忘掉了儒家“忿思难”^②和“出好兴戎”^③等教训，意气用事，鲁莽主战，出言无状，激怒对方的缘故。例如一八八〇年，沙俄为了吞并我国新疆，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那就是因为清政府一些大官僚不能“知己知彼”，大发抵抗的高论，被老沙皇知道了，于是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这就是中国自找的麻烦。后来中俄虽然没有开战，但沙俄因清政府有主战言论“不得不调兵”，所以向我勒索一千二百万卢布的巨额“兵费”，这是“自我发难，应议补偿！”^④

为什么在帝国主义发动武装侵略时，清王朝每次都打败呢？李鸿章从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立场出

① 李《朋稿》卷一九，第二页。

② 同上书，卷一，第三六页。原话见《论语·季氏篇》。意思是：发怒的时候，要想想是否会带来后患。

③ 李《译稿》卷九，第四四页。《尚书·大禹谟》：“惟口出好兴戎”。意思是：话说得好，会得好结果；说得不好，则会导致武力诛杀。

④ 李《朋稿》卷一九，第三八页。

发,不断重复孔老二敌视劳动人民的谬论,诬蔑人民只能做勾结帝国主义的“汉奸”。他怀着反动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极端恐惧,认定劳动人民只能“激乱”而“动摇”清朝的统治^①,根本不能指望他们组织起来驱逐侵略强盗。因此,他顽固地反对一些人提出来的利用“民力”的主张,宣称对外战争只能依靠清朝军队,不能依靠人民。他同一切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物而不是人,大肆散布唯武器论。胡说什么清朝军队武器落后,而外国的坚船利炮却“日新月异”,中国“万不能敌”,即使一时能打胜几仗,但最后必定失败^②。就连刚刚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他认为虽只“略效西人皮毛”,同他这个老牌的洋务派比较起来,不过是后生晚辈,但是它比中国“多几件后门枪炮,两个小铁甲船”,那就有了侵略中国的资本,中国就不能与它抗争^③。总而言之,因为中国武器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各国,所以必然要“受制于西人”^④。

李鸿章这个近代化的孔孟之徒从“圣道”中推衍出了这些荒谬逻辑,同时就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卖国

① 李《朋稿》卷一〇,第二五页。

② 李《奏稿》卷一七,第五〇页;卷二四,第一三页。

③ 李《译稿》卷二,第四九页。

④ 李《奏稿》卷一九,第四五页。

主张。

一曰“待客”。在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在侵略胃口越来越大的帝国主义面前，他主张中国应当洞开大门，彻底“开关纳客”，对于所有闯进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无论远近、强弱，统统都要“接待”，不能加以“拒阻”^①。就是说，谁想尝尝中国这块大肥肉，谁都可以拿着刀子进来。为了给自己这个好“客”的主人蒙上一层遮羞布，他还搬出《尚书》中“夔友柔克”，“高明柔克”^②的话，用儒家所谓“柔远”的老调来自我解嘲，要人们相信，只有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待帝国主义之“客”，才能显示“上国”的度量和气魄。为了劝说顽固派改变态度，他特地引证《周礼》中“象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要他们根据儒家“夷狄之君不能行中国之礼”^③的道理，对帝国主义不要拘守封建的“体制”，跟着他们这一伙买办官僚热情“待客”。

二曰“守约”。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胁

① 李《朋稿》卷六，第四二页。

② 同上书，卷一〇，第一四页。原话见《尚书·洪范》。大意是说国君不论是对和顺的统治对象，对臣下或对刚强者，都应用柔和的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③ 同上书，卷一三，第六页。原话见《周礼·秋官下》。意思是：只要少数民族能按时前来朝见，象胥（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的职官）就应待以应有的礼节。

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虽然知道这些条约都“由胁迫而成，各款多违万国通例。”^①但是，他认为应该本着儒家“诚信”的原则，清政府要坚决“守约”。有一次，日本使节森有礼公开向他声言：“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鸿章听了，赶忙表白他自己坚守“和约”的态度，并解释他心目中的“和约”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②就是说，他是死心塌地地接受所有“约束”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换取帝国主义各国的“和气”。因此，他劝导清朝最高统治者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③主张乖乖地把这些半殖民地的枷锁戴在身上，不要有任何反抗的企图。

三曰“了事”。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都要在清政府愿“守”的条约之外，不断勒索新的、更大的权利。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李鸿章有一个指导性的原则：“了事”。他说：“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④怎样才能使贪得无厌的侵略者“了事”而去呢？李鸿章的诀窍就是：“譬如西人索一酒杯，不与，暗

① 李《译稿》卷一一，第四二页。

② 同上书，卷四，第三四页。

③ 李《奏稿》卷二四，第一〇页。

④ 李《译稿》卷一一，第五页。

中转与以酒壶；索一汤勺，不与，暗中转与以大碗。”^①所以他主持清朝的外交，就“以从为主义”^②。如同九十年代中一个封建官僚所描述的：只要外国侵略者表示了侵略愿望，李鸿章没有不唯命是从的；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的解决各种外交问题的方案，外国侵略者没有不得意而去的。“蒂固根深，牢不可破。”^③

四曰“和好”。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对清朝政府进行武力威胁，甚至发动侵略战争，以勒索更大的侵略权益。遇到这种情况，中国应该怎么办？抵抗，还是投降？李鸿章以清朝代表的身份，拍着胸脯向帝国主义“结实做保”说，清政府是全心全意地、无条件地求取与帝国主义的“和好”的，绝对没有“外攘”（抵抗）的用心^④。为了给这种民族投降主义提供论据，他无耻地曲解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抵抗外族入侵的历史，说什么周、秦以来的历史证明，凡是用战争的手段对待境外民族的王朝，其统治必定不能继续维持；相反，凡是用妥协的手段对待入侵的外族的王朝，其统治必定能长久。因此，在李鸿章这一伙别具肺

① 刘声木，《苕楚斋随笔·五笔》卷一〇，第一三页。

② 宋育仁，《罗应旒祠庙碑》。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〇，第二页。

④ 李《译稿》卷三，第三七页。

腑的人看来，妇孺皆知的大卖国贼秦桧，是延续宋朝统治的大功臣，而坚决抗金的岳飞、韩世忠等人，都是“不达时务”的罪人^①。他拾过曾国藩的牙慧，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反复宣传，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广东抵抗英国的侵略，结果几乎败坏了清朝统治的“大局”，弄得“不可收拾”。他还曲解近代亚洲一些国家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历史，说什么这些国家在遭受侵略时，曾用武装反抗欧洲帝国主义，起先，曾打胜几仗，但最后都失败，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奴役。中国应当把它们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用武力抵抗就会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何况现在帝国主义各国越来越“强盛”，如果有人还想抵抗，那就是“不知天下大局若何”的糊涂虫，外国军队果真出动，在中国土地上就将“如入无人之境”，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②！总而言之，要遵照孔老二的说教，“以和为贵”，“以和为妥”^③，即令帝国主义侵略者向我开火，中国都要“不还手”，这样，对方就没法“下台”了^④。他无耻地吹夸说，这叫做“不战而胜”，比“百战百胜”还好^⑤！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这个平时十分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一三〇页。

② 李《朋稿》卷一九，第三〇、三三页。

③ 同上书，卷一〇，第二〇页。

④ 同上书，卷一〇，第一六页。

⑤ 同上书，卷一一，第一〇页。

迷信反革命暴力的孔孟之徒，当帝国主义霸占了我国神圣的领土，并猖狂地对清政府进行武力威胁的时候，竟搬出了孔老二关于“去兵”的“垂训”，说它是“千古不能易”的至理^①，要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强盗面前干脆解除武装。他还一而再地向清朝最高统治者建议，发布公开的“谕旨”，要整个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和好”“友邦”之意铭记在心，并且严厉镇压人民群众的反侵略言行，杜绝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斗争，以免触怒帝国主义，妨碍最关紧要的“和局”。

这样，李鸿章这个近代化的孔孟之徒，就从其反革命祖师爷的“圣道”中寻找出种种卖国媚外的理论根据，炮制和宣扬一整套民族投降主义的卖国哲学，二、三十年间干尽了卖国媚外的罪恶勾当。

出卖民族权益的大掮客

李鸿章从一八七〇年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外交大权起，直到一九〇一年身死，三十年中，清政府几乎所有重要的对外交涉事件，全是由他参与或直接办结的。李鸿章在掌权期间，彻底贯彻了他那一整

^① 李《奏稿》卷一八，第一八页。

套民族投降主义的卖国哲学，毫不吝惜地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权，被帝国主义称为“中国第一等能（替洋主子）办事的大臣”^①。帝国主义各国想向清朝勒索新的侵略权益时，无不来找李鸿章，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代理人的作用。以所谓“辑和中外”为职志的李鸿章，“朝见一洋人，暮见一洋人”^②，尽心尽力为所有的洋主子效劳，成了一个出卖民族权益的大掮客，富丽堂皇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衙门变成国家主权的拍卖场。现在，让我们通过一些事例，来看一看被中外反动派吹捧为第一号“外交专家”^③的李鸿章，是怎样用他那一套从“圣道”中推衍出来的卖国理论作指导，来开展丧心病狂的卖国活动的。

1. 奉行叩头外交，接受半殖民地枷锁

李鸿章这个近代化的孔孟之徒，很欣赏孟轲所谓的“浩然之气”和苏轼的《张良论》，对儒家的“忍”字诀，是很能体会和运用的。他的老师曾国藩，也亲身向他传授过这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诀窍，教他在侍候帝国主义主子时必须低声下气，逆来顺受。李鸿章后来居

① 李《译稿》卷三，第四三页。

② 朱采：《清芬阁集》卷五，第四三页。

③ 李《全集》卷首，袁世凯奏折。

上，把儒家这一反动的诀窍发展成为侍奉帝国主义的奴才哲学，在对外交涉中一味叩头作揖，阿谀乞怜，唯唯诺诺地从帝国主义手中接过了一副又一副沉重的半殖民地枷锁。例如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就所谓“马嘉里事件”（又称“滇案”）而进行的交涉中，他这种“叩头外交”就表演得非常充分。

一八七五年二月，英国为了入侵我国西南，派了近二百名的武装人员，从缅甸闯入我国云南边境。云南边境各族人民抗击这种侵略行动，把英国翻译马嘉里和几名随行人员击毙。英国就利用这一事件作为讹诈的借口，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其中大部分都是与“滇案”本身毫不相干的问题。其驻华公使威妥玛先与总理衙门交涉没有结果，就去找李鸿章。他当着李鸿章的面拍案咆哮，训斥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务“越办越不是，就象一个小孩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蛮横地叫嚣：“非先撤换总署几个人不可！”^①同时却嘉奖李鸿章，说他是“最能替外国人办事的大臣，自己一向是‘敬重’的”^②。于是，李鸿章就再一次被中外反动派选中，让他来为扩大英国的侵略权益服务。

一向以“守约”自誓、以“熟闻”“万国公法”自夸的

① 李《译稿》卷三，第三二、三三页。

② 同上书，卷三，第四三页。

李鸿章，虽然明知英国在整个事件中，“不独有违(中英)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①，所提各项侵略要求又是“大半案外之事”，但是为了“了事”和“和好”，他却硬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②先把英帝国主义放在“侵略有理”的地位。

狡猾凶暴的威妥玛摸透了李鸿章的底细，断定“不论我们(英国)怎样说和怎样做，中国政府都决不可能首先发动敌对行动”^③。所以在整个交涉过程中，对李鸿章动不动就用断交、用兵来恐吓，肆意进行训斥、谩骂和讹诈，一见面就“出言无状”，听到一句不合意的话，就大发其主子脾气，对李鸿章拍着桌子训斥，其蛮横卑鄙之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李鸿章却拿出了儒家“涵养”功夫，居然能逆来顺受，不管威妥玛怎样侮辱和恫吓，他始终“腴颜忍忿，曲与周旋”^④，充分暴露出这个孔孟之徒的奴才相。

为了“力保和局”，李鸿章一面无耻地奉承蛮横不可一世的威妥玛“向来办事甚讲情理”，一面又表白自己向来“所办之事，处处对得起威大人”，只要你威大人

① 李《朋稿》卷一五，第一〇、一一页。

② 李《译稿》卷三，第四六页。

③ 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二四四页。

④ 李《译稿》卷六，第一四页。

不断交回国，留下谈判，自己“断不令你为难受气”^①。当他得到威妥玛的老搭档密妥士身死，威对此“深为悯念”的信息时，就赶忙派人前去“厚送”丧礼五百两银子，希望能买得威妥玛的欢心。可是，李鸿章越是哀哀求告，这位“威大人”越是趾高气扬，再三向李鸿章表示，现在他已“灰心”透了，已经收拾好行装决意断交回国了，这个案件只能交由英国的舰队来武力解决了。李鸿章被吓得胆颤心惊，更加奴颜卑膝地苦求这位“威大人”不要“如此固执”，“免伤和气”，甚至恬不知耻地吹捧威妥玛向来是“厚爱”中国的，“若必闹到山穷水尽，再为转圜，中国更要吃亏！”^②就这样，这位清朝“第一流外交家”，在气焰嚣张的英国侵略者面前摇尾乞怜，出尽丑态，最后总算获得了“威大人”的恩典：允许李鸿章到烟台进行“谈判”。

于是，李鸿章就立即前往烟台。为了迅速作成卖国交易，他特地向洋大人们搬出了“中国先圣”孔老二的谰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把侵略强盗当作自己的兄弟骨肉，乞求他们与他这个奴才“共敦友谊”^③。为了获得英国“兄弟”的“友谊”，李鸿章在整个谈判过

① 李《译稿》卷五，第一四、一八页。

② 同上书，卷五，第一四——一九页。

③ 同上书，卷六，第一三页。

程中，除了继续哀恳乞怜外，不敢有丝毫的争论，对方提出什么，他就应承什么，只怕稍一犹豫和争论，就会重新惹起“威大人”的主子脾气，拂袖而去，“更无转圜之机”^①。所谓“谈判”的过程，事实上无非是英方提议，李鸿章承诺的过程。最后，李鸿章还遵照威妥玛的要求，同意由威妥玛根据其“侵略有理”的帝国主义逻辑，先对整个事件写出一份完全颠倒是非的“折底”，然后由李鸿章以此为底稿写出一份正式的上报清政府的奏折，了结此案。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李鸿章与威妥玛正式签订了《烟台条约》，完全满足了英国十多年来扩大侵略权益的要求。在威妥玛这个侵略强盗满载而归的时候，李鸿章还向他大致颂词，称颂“威大人”“爱护中国，笃念友谊”，“公允为怀”^②！

向帝国主义叩头作揖、阿谀乞怜，这就是半殖民地“外交专家”李鸿章最擅长的“外交艺术”。以后，在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期间他与法帝国主义的交涉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期间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交涉中，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交涉中，都无例外地拿出这种拿手好戏，把叩头外交发展到登峰

① 李《译稿》卷六，第二〇页。

② 同上书，卷六，第二三、二四页。

造极的地步，给我们民族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和耻辱。但是，这个帝国主义的奴才却惯会自我解嘲，说什么他用阿谀乞怜的手段从帝国主义那里接受半殖民地的枷锁，不过是孔老二说过的“暂屈以求伸”罢了①！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2. 宣扬“胜不如败”，断送反侵略战争

在李鸿章掌握清朝的军事、外交大权的三十年中，曾发生过三次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即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义和团农民革命战争。在前两次反侵略战争中，被迫应战的清朝反动统治者，都把指挥战争的主要责任交付给李鸿章。一向畏洋如虎的李鸿章，不但不认真组织力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强盗，反而丧心病狂地宣扬“胜不如败”的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谬论，畏战避战，断送了反侵略战争，成了一名里通外国的大内奸。

一八八三年，被恩格斯称作“镇压(巴黎)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

① 李《奏稿》卷七九，第四七页。

阶级的坏透顶的代表之一”^①的茹费理就任法国总理后，加紧吞并我国西南的友好邻邦——越南，并企图由此进一步入侵我国西南。这时的法国，才从普法战争失败后恢复元气，在亚洲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他们深知，对于李鸿章之类半殖民地中国的当权者，只要拿出“强者”的气势，对方就会“首先向我们让步”的^②。因而法国驻华的外交代表，公然向李鸿章嗥叫：“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③！以武力恫吓作为主要的讹诈勒索手段，并悍然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法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怒。广州人民自动发起了大示威，冲入江面“租界”，焚烧了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机构——洋行。一些爱国报刊也连续发表社论，呼吁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与侵略强盗决战。尤其是处在反侵略斗争前线的广东人民，更群情激愤，各州县民众互递传单，自动组织起来，要与侵略者拚个你死我活。温州、福州、潮州、揭阳、佛山等许多沿海城镇，人民也都行动起来，捣毁法国教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中国工人发动了大规

①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四八九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七册，第一六九页。

③ 李《译稿》卷一四，第一二页。

模的罢工斗争，拒绝为法人工作，商人也拒绝向法人供应物资，给法、英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在国外，美国旧金山和日本、古巴等地的华侨也争相捐款汇回国内，支援祖国军民援越抗法的斗争。甚至内地的一些爱国清军将士，也自动去统帅衙门，“稟请赴前敌效力”^①。这些情况表明，反抗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要求。中法战争从中国方面说，是一次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只要认真组织军民的力量，打败“外强中干”^②的法国殖民强盗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在前线力挡大敌的黑旗军^③，就曾在一八八三年接连大败法军，并击毙其统帅李维业。

但是，李鸿章对法国的侵略一味“和让”，对迅速高涨起来的人民反帝浪潮却怕得要命。他一再要求清政府和西南各省的督抚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说什么法国“养精蓄锐”十多年，中国是无力抵抗的；即使一时一地能打些胜仗，却不能长久在各地都打胜仗；即使勉力抵抗两年，法国的侵略欲望只会越来越大，中国

① 《谭文勤公(锺麟)奏稿》卷一〇，第二三页。

② 《署光祿(仁守)奏疏》卷二，第一三页。

③ 黑旗军原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广东的一支农民起义武装，后因反动官府的镇压而入屯中越边境。七十年代起，就与越南军民一道屡败法国侵略军。

的抵抗力量只能越来越小，最后仍然是个“议和之局”，反不如一开始就妥协投降为佳^①。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李鸿章就把自己的精力，都用于如何阻挠和破坏前敌军民的反侵略斗争，以便及早同法国侵略者“了事”与“和好”上。他公开散布“胜不如败”的谬论，说什么：“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尚可退回本境，……不致牵动大局。”^②为了使敌胜我败，李鸿章不仅不顾朝野的一致要求，拒不派遣他一手控制的北洋海军前往助战，听任法国舰队在我国闽粤沿海自由往来，而且还千方百计破坏前敌军民抗战，多方设法替法国侵略者拔除眼中钉——与越南军民一道坚决抗法的黑旗军。法国侵略者已经张牙舞爪地向中国军队进攻，李鸿章却严令前敌淮军不准抵抗，否则就要给他们加上“开衅”的罪名，说什么“我不先开衅，则衅亦无自而致矣”^③。将领们秉承李鸿章的意旨，知道自己战败有功，战胜有罪，所以都畏战、避战，彼此互不联络，互不声援，有的甚至丢下军队，跑回国内。这样，多次被黑旗军等中越军民打得大败的法国侵略军遂能得逞于一时，一八八四年八月并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

① 李《译稿》卷一六，第一页。

② 同上书，卷一五，第八页。

③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六，第二〇页。

中国军民奋起抗战，先后在台湾的基隆、沪尾、台北等地大败法军，粉碎了法军侵占台湾的计划。一八八五年三月，法舰到浙江海面骚扰，镇守镇海的清军开炮轰击，命中法舰队司令孤拔的座船，孤拔受伤后不久毙命。在陆路，七十多岁的老将冯子材率领一支由汉、壮各族战士组成的大军，于一八八五年三月底在广西镇南关（今睦南关）大败法军，毙敌千余名，侵略者争先逃命，跑不掉的“皆跪地弃械以求生”^①。李鸿章却因前敌军民不替他“了事”反给他“生事”，不以为喜，反以为忧，加紧同法国进行秘密的卖国交易，于一八八五年六月同法国签订条约，除了出卖越南外，还给予法国一系列的侵略权利，使我们祖国的大西南，处在法国的虎口之下。

法国侵略者对于这样的尽心竭力为自己殖民主义政策效劳的李鸿章，自然十分满意，亲热地称李为“我们的朋友”^②。茹费理特地发电奖励这个“朋友”“为国重臣，深于阅历”，使他感到不胜“欣幸”。李鸿章也把代表法国向清朝肆意勒索的福祿诺称为“我至好朋友”，还受宠若惊地复电给茹费理，说自己对于这个洋

① 钱振鍤：《名山文约》卷七，第一一頁。

② 麦尔纳尔，《现代中国历史选读》第四八四頁。

主子的褒奖“欣悦之至”，恭维这个洋主子“见识远大”，还说什么“彼此为难之隐衷，两地心照。”^①活现出一个帝国主义奴才的可鄙嘴脸。

经过中法战争，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暴露无遗，各阶层人民同声致讨，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谤满天下”^②。但是，这个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却怙恶不悛，在中法战争后十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又故伎重演，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一贯执行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李鸿章却反过来攻击那些主张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都是表里不一的“奸伪”之徒，而他自己则是同曾国藩一样，恪守孔孟“诚信”的遗教，一生“未敢作伪”，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坚持和议则有之，竟云‘不能战’三字，则始终未出诸口，亦未存此心也。”^③这样厚颜无耻、强词夺理地替自己的卖国罪行辩护，真不愧为近代大儒曾国藩的嫡传门徒！

3. 名曰“以夷制夷”，实则卖身投靠

李鸿章作为一个被帝国主义培植起来的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同一些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所形容

① 李《电稿》卷二，第一四页。

② 李《朋稿》卷二〇，第五四页。

③ 同上书，卷一九，第三四页。

的，他之崇信和依赖帝国主义，就如婴儿之依赖保姆一样，离开了帝国主义主子，似乎就不能独立生活。他办各种“洋务”事业是如此，他办外交也不例外。不过，他同所有儒家代表人物一样，很会替自己遮羞，把依靠洋人办“洋务”说成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依赖帝国主义办外交说成是“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这是李鸿章办理对外交涉的一个重要诀窍。表面上好象是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拉拢这一帝国主义去抵制那一帝国主义，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要拉拢帝国主义，就必须向他们支付国家主权的代价；指望帝国主义会替中国维护民族权益，那只能是与虎谋皮。所以，李鸿章所谓的“以夷制夷”，无非是找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强者”作靠山，把国家主权一分一分地奉送给所有帝国主义。七、八十年代，当英、法、俄、日等侵略我国边疆和邻邦时，李鸿章就一次又一次地搞“以夷制夷”，结果是各个帝国主义都各遂所欲，达到了各自的侵略目的。从李鸿章处理中日交涉的过程中，这一点就暴露得十分明显。

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对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对我国的邻邦朝鲜，以至对于整个中国，都怀有极大的侵略野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日本在美国的支

持下，公然出动几千侵略军，侵犯我国东南沿海的屏障台湾。对于日本这种蛮横的侵略行动，全国各族人民都非常愤怒，就是统治集团中一些不当权的官僚，也要求予以抵抗。但是，负责与日本交涉的李鸿章，却说什么日本虽然“无理在先”，中国也不能据理与争，否则就违背了他那一伙卖国贼的“礼”^①。那怎么办呢？办法就是所谓“以夷制夷”。他向清政府提出，台湾地处海外偏僻地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岛屿，值不得与日本争夺，“与其听一国（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②建议清政府索性主动把这个宝岛的全部利权向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开放。同时，他还以借俄“拒日”为由，进而主张把祖国的神圣领土新疆奉送给沙俄。最后，李鸿章仍然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要清政府体念侵台日军“远道艰苦”，给予几十万两银子的犒金，还说什么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圣朝”对外国宽宏的度量和迁就拉拢的真心^③。其结果，不是“制”住了日本，恰恰助长了它的侵华野心。到一八七九年，它就公然把琉球并入自己的版图，改之为冲绳县。

日本的侵略阴谋一再得逞之后，就进而图谋侵占

① 李《译稿》卷二，第四九页。

② 同上书，卷二，第四二页。

③ 同上。

我国的友好邻邦朝鲜，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当日本侵略军一批又一批地涌进朝鲜，战争已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仍顽固地奉行其“胜不如败”的卖国逻辑，“闻败则喜，闻胜则怒”^①，军事上根本不作抵抗的打算，却全力以赴地在外交上搞他的“以夷制夷”。他在国内、国外，东奔西跑，函电交驰，忙着同俄、英、德、法、美等联系，乞求他们出来“主持公道”。他始则请沙皇俄国用武力替他压迫日本撤兵，答应给沙俄以特殊的侵略“权利”。随后，他又乞求英国，请英国派十几艘铁舰去日本，“勒令”日本撤兵，还无耻地鼓动英国说，这是从中、朝两国掠取新的权益的“好机会”，不要让沙俄抢在头里^②。但英、俄两国都各自打着其侵略中国的如意算盘，使李鸿章的迷梦完全落空。他又急急忙忙请德、美两国驻京公使出来调停，还特地发电给清政府各驻外公使，要他们乞求各帝国主义政府，联合起来压迫日本停止侵略。结果是上了帝国主义的大当：李鸿章遵照帝国主义的“劝告”，对战争一点不作准备，“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③

①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版，光绪二〇年，第二一一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三，第三〇页。

③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五九页。

在李鸿章的卖国投降路线指导下，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了。一八九五年春，清政府根据日本的指名要素，派李鸿章赴日乞和。李鸿章先由天津入北京，忙着奔走于英、法、美、俄、德等各国使馆，再一次哀恳帝国主义各国出来压制日本的侵略野心。特别是对于自己二十多年的老主子——英国，他更想卖身投靠，竟然向英国提出了一个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草拟的《中英密约》草案，答应“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能够独个改组和控制(中国)陆海军各机关，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①一句话，就是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这一丧心病狂的卖国阴谋，最清楚地表明李鸿章奉行的“以夷制夷”，发展到帝国主义争夺加剧的九十年代中，已经完全变成了直接卖身投靠于某一帝国主义大国，甘心做它的独占殖民地。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李鸿章这一出卖祖国的图谋才未成为现实。

^①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英使欧格纳的电报。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三六一页。

4. 认贼作父,甘当老沙皇的代理人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瓜分狂潮”。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李鸿章继续玩弄早已破产了的“以夷制夷”。他回顾自己前半生投靠英国,但英国在甲午战争中对自己的种种请求“完全采取消极态度”,感到有些失算,因而就决定再投靠一个新主子——战后在华的侵略势力迅速膨胀起来的沙皇俄国。

沙皇俄国对中国一贯怀着极大的侵略野心。鸦片战争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它就利用一切机会,施展各种欺骗和讹诈的手段,侵吞我国东北和西北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七十年代初,它又乘清政府忙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大起义而无力西顾之机,公然出兵侵入我国新疆,占领了伊犁地区,强迫新疆人民“剥肤椎髓以为供给”,使新疆人民陷于“困苦极矣”^①的境地。因此,一八七六年清军进入新疆时,各族人民重新看到祖国的旌旗,无不表示“爱戴之意”^②。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清军进展迅速,不到两年就收复了百

① 施补华,《泽雅堂文集》卷一,第一七页。

② 《左宗棠家书》下,第七三页。

数十个城镇，并要沙俄把它的侵略军从伊犁等地撤回去。沙俄政府就连骗带吓，逼迫清政府的外交代表崇厚于一八七九年与它签订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收回伊犁，却给予俄国大片领土、五百万卢布和一系列通商特权。

沙俄这一蛮横勒索，激起了中国朝野的莫大愤怒，一时弹劾卖国贼崇厚和要求拒俄毁约的奏章犹如雪片飞来。“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李鸿章于是就跳将出来代崇厚打抱不平，在统治集团中反复宣传：“俄在西国为最强”，在侵略别国时向来是“得寸进尺，不稍退让”，不达目的决不罢手的^①，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怕它三分，中国更无力抵抗，目前即使暂时收回新疆，将来一定仍被沙俄吞并过去，不如趁早放弃，以免“贻患后人”^②。因而，他就一再催促清政府不要被拒俄毁约的“浮言所摇惑”^③，不要被“举朝狂吠”所左右^④，赶紧批准崇厚签订的卖国条约，干脆把出关收复国土的清军撤回。这种丧心病狂的卖国主意当时虽没

① 李《朋稿》卷一九，第三三页；《奏稿》卷三五，第一六一——一八页。

② 李《朋稿》卷一八，第二〇页。

③ 李《译稿》卷一〇，第一七页。

④ 李《朋稿》卷一九，第三四页。

有被清政府采纳，但沙俄政府却心领了李鸿章的“盛情”，知道这个“中堂大人”是自己今后大可利用的走狗。

甲午战争后，日夜盘算着“占领远东领土”的老沙皇，更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急先锋。根据他的如意算盘，不仅要把我国的东北变成沙俄的“一个省”，而且还妄想把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统统“吞并”过去^①。为了实现这种狂妄的侵略野心，一八九六年五月，俄国借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之机，特意要清政府派李鸿章这个卖国老手前往“致贺”。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群起反对《马关条约》，签订这一卖国条约的李鸿章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被李鸿章出卖给日本的台湾人民，特地发布檄文，严厉声讨李鸿章的卖国罪行，号召人们，不管在哪里遇到这个卖国贼，立即把他击毙。李鸿章自知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因而更加紧投靠老沙皇，依靠老沙皇这个后台老板来保持自己的“禄位”。当这个七十四岁的老贼听到老沙皇的召唤后，就搬出儒家经典《礼记》中“大夫七十有适四方之事”来为自己涂脂抹粉。他向清政府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力之所能

① 《列强对华外交》第二三四页。

去与沙俄“永敦和好”，求得沙俄的卵翼^①。沙俄政府象接财神一样地把李鸿章接到彼得堡后，就软硬兼施，用三百万卢布的重金贿赂李鸿章，与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密约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和吉林接造铁路联接海参崴，给俄国以必要时运兵过境等权利。李鸿章向沙俄政府献上这份厚礼之后，更死心塌地地匍匐在沙俄的膝下，力图让清政府“托庇于其势力之下”^②。因为这个卖国贼明白，“他的地位，甚至他的安全，都要靠俄国支持，因此他无论如何只好走这条路。”^③在以后的几年里，在帝国主义争夺所谓“势力范围”的过程中，他更尽心竭力为沙皇俄国效劳。一八九八年三月，沙俄为了与英、德两国争夺对华借款和“租借”旅顺和大连，又秘密用五十万两白银的巨款向李鸿章行贿。李鸿章对于沙俄政府的犒赏，表示“甚为满意”并“深致谢意”^④。在李鸿章这个大内奸的帮助下，沙皇俄国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强占了我国的旅顺和大连，进而又把整个长城以北，都划为沙俄的“势

① 李《奏稿》卷七九，第五三页。《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则……适四方”。大意是，臣子七十岁告老，如不可得，那就还应据国君之命令奔走于四方。

② 梁启超：《李鸿章》。

③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二三页。

④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一〇页。

力范围”。

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爆发了伟大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武装起义。农民英雄们高举“灭洋”的大旗，向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勇猛的冲击；同时又严厉声讨清朝反动统治集团卖国媚外的罪行，特别提出要诛杀罪大恶极的李鸿章，为国家民族除掉大害。但是，李鸿章却怙恶不悛，继续与人民为敌。当时，他已由直隶调任两广总督。当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发布对外“宣战”的“谕旨”送到广东时，一向标榜“忠君”的李鸿章却宣称在所控制的两广地区决不遵行，并与东南几省的买办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等串通在一起，搞起了保护帝国主义、镇压人民反帝运动的“东南互保”。随后又在英国的导演下，酝酿成立以李鸿章为头子的“华南独立政权”。后因形势变化，他这一分裂祖国、自当儿皇帝的罪恶计划才没有实现。

义和团运动中，六月下旬，清朝反动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宣战”本来是一种权宜之计。就在“宣战”的同时，清政府又赶召李鸿章迅速进京，以便随时利用这头卖国媚外的识途老马，向帝国主义呈递降表。这时，战争尚未结束，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奉命之后，借口水陆交通阻塞，故意在上海逗留不进，等到八月中侵略军攻入北

京，那拉氏等仓惶西逃，知道自己放手卖国的时机已经成熟时，才由上海经天津进入北京，与帝国主义各国进行卖国交易。为了表示他对帝国主义照旧“忠诚”，李鸿章特地向侵略军统帅瓦德西保证：直隶全境，不管是侵略军已经到达或尚未到达的地区，所有清朝军队“即刻”撤出；还将当时清军的驻守和布防情况，写成报告送呈瓦德西。阳历元旦到来之时，李鸿章又特派大员代表他去瓦德西等处“恭贺新年”，厚颜无耻地称颂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能持正义”，表示“感谢”^①！丧心病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早已把自己出卖给沙俄的李鸿章，这时就利用那拉氏所授“全权大臣”的身份，努力为其彼得堡的洋主子效劳。原先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沙皇俄国一面派兵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京津，一面又单独出兵攻占了我国东北的主要城镇，“在各村镇按户号粮，勒价强买，甚至奸淫抢掠，无所不为”^②，并逼迫清朝盛京将军增祺签署了一个《奉天交地暂行章程》。一九〇一年二月，它又向清政府提出正式约稿十二条，除了规定由沙俄长期独占东北外，还给予修筑蒙古、新疆等地的铁路和开采矿山等特权，软硬兼施，逼清政府从速批准画押。沙俄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

② 《军机处存档》，光绪三十一年，《程德全奏片》。

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英国等对我国东北也怀有极大的侵略野心，不愿沙俄独吞，就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子，反对俄国所提的约稿，要求清政府明确责令李鸿章与俄使“罢议”，等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议定了卖国条约后再说。沙俄害怕拖下去对自己不利，又施出其惯用的一招，再一次拿出五十万卢布收买李鸿章。于是，李鸿章就利用其“全权”，一意孤行，电令清朝驻俄公使“酌量画押”。四月十六日，清政府电令李鸿章，叫他在京集中力量先与各国“公议”所谓“公约”，俄国的“专约”留待“将来”再议。李鸿章就用“倒填月日”的办法，欺骗清政府说，他早在三月三十日就已答应俄国照“原约”画押了^①。并且指控张之洞、刘坤一等被日本所利用，“罢议”之说，全属“谬论”。张、刘等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不甘退让，攻击李鸿章一意“袒俄”，“老横偏执，怙过遂非”，“不顾国家之安危，而专与同僚为水火”^②，形成一场狗咬狗的闹剧。

李鸿章一面与沙俄进行卑鄙的卖国交易，一面与

① 《张之洞全集》，《电牍》卷五一，第六页。

② 《张之洞全集》，《电牍》卷五一，第六页；卷一一，第一——三页。

其他帝国主义“公议”所谓“和约”。他日夜奔走于沙俄驻京公使之门，鬼鬼祟祟地与俄使进行了一连串的“密会”，引起其他帝国主义的妒嫉和不满。因而在所谓“公议”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各国更漫天要价，恣意勒索，作为对李鸿章过分媚俄的报答。一九〇一年九月，李鸿章和奕劻代表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标志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事后，他还谆谆告诫清朝反动统治者说：“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挑衅，必多一次吃亏，今后务必接受教训，“坚持定见，外修和好”，“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①就是说，这一次清朝反动统治之所以还能维持，完全是洋大人的恩赐，今后要死心塌地地做帝国主义的儿皇帝，一丝一毫的反抗思想和行动都要不得，否则，反动统治就无法苟延残喘了。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毕生为中外反动派效劳的李鸿章，自知罪孽深重，通国不容，气急汗流，吐血毙命。喜讯传出，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同声咒骂这个死有余辜的大汉奸、大卖国贼。帝国主义各国却称赞李鸿章一生卖国媚外，“所为皆他人不能为之事”^②，为

①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一〇五页。

② 李《全集》卷首，《国史本传》。

这条得力的走狗的死去而万分痛惜，纷纷前来悼唁。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反动统治者更如丧考妣，下令要各级反动统治者，都把这个“以儒臣起家军旅”的孔孟之徒、卖国贼作为“臣庶当官之式”^①，将李鸿章的反革命事业接续下去。对李鸿章“亦步亦趋，尤极揣摩之义”^②的洋务派新头目张之洞，就是追随李鸿章之后，在八、九十年代继起的买办官僚的代表人物。

① 李《全集》卷首，《御赐祭文》。

② 刘声木，《异辞录》，卷二一，第三〇页。

三、炮制“中体西用”论的张之洞

张之洞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近代中国又一个臭名昭著的尊孔派、卖国贼。

张之洞的反动政治生涯，是在清王朝最后的四十年，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这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时期，也是他们加剧侵略中国，使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张之洞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由一个地主阶级顽固派转化成了早期中国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几十年尊孔卖国的反革命实践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和发挥，加工制作出臭名昭著的“中体西用”论，获得中外反动派的特别垂青，成了一个尊孔读经、崇洋卖国一身二任的典型人物。

^① 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七三页。

保“名教”和办“洋务”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年)，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出身于一个“三世为州县官”的反动官僚地主阶级家庭。其父张瑛，是五十年代中在贵州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张之洞幼年时就在其反动父亲的督促下，日夜死啃孔孟经书，真是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九岁时就把《四书》《五经》全部啃完背熟。张瑛还再三训勉张之洞，要把“知礼”作为读书和处事的根本。在太平天国和各族人民大起义年代里，在孔孟之道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张之洞，青年时就跟着其反动父亲镇压农民起义，决心用儒家那一套反动哲学“经世”，干一番反革命事业。

一八六三年，张之洞中了进士，从此后，他便青云直上，步步高升，这与他的反革命政治立场，与他善于利用孔孟之道这块敲门砖分不开的；同时，与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也有密切关系。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但是，太平天国宣传的以平等为核心的农民民主革命思想，却深深扎根在广大农民群众之中，各族人民的革命情绪有增无减，继续酝酿和开展

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使得一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触到资本主义世界，逐渐脱出了孔孟之道的思想藩篱，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产生了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思想。他们要求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对内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改变一些封建的政治制度，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反映了成长着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从侧面冲击了当时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和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张之洞为了抗拒人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狂热地鼓吹“通经学古”，以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卫道士的面貌出现在反革命政治舞台上。

一八六七年、一八七三年，张之洞先后出任湖北学政和四川学政。当时的湖北和四川，同太平天国革命后的其他省区一样，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农民革命的沉重打击，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也大为削弱。张之洞一向是“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的，这时就把“兴废举坠，明教作人”^①，即重振孔孟之道，以培养地

^① 《张之洞全集》卷首上，第九页。（以下引及《张之洞全集》所收之奏议、电牍、书札、公牍、电奏时，均分别简称为张《奏议》、张《电牍》……等等。）

主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与当时一般学政不同，并不以循例去所属府厅考试生员和童生、捞一大笔“外快”回京复命为满足，而是拿出一股子“崇道”的反革命疯狂性，“于士习文风力求整顿”^①，在各地大搞尊孔读经。他先后在湖北、四川办起“经心书院”、“尊经书院”，选拔各地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入学，还精心物色了一批所谓“名儒”为教师，作为传播孔孟之道的黑据点。为了扩大孔孟之道的思想阵地，他在几年之内，不仅设立书局刊行儒家经典，而且还亲自冒暑冲寒，到各府州县去宣讲孔孟之道，鼓励和督促知识分子们“向学”。他写了一首诗记述自己的辛劳情况说：“人言为官乐，那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可见他为了消除农民革命思想、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确实是呕心沥血，用尽心机。

当时，随着整个封建统治的没落，地主阶级也愈益腐朽。还在五、六十年代间，曾国藩就曾大发“人心陷溺，绝无廉耻”，“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②的悲叹，对于地主官僚之一味贪得无厌，求官争名，而漠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表示十分着急。由于清朝封建统治者敲骨吸髓的盘剥，直接间接地损

① 张《奏议》卷七一，第一页。

② 《曾国藩书札》卷二，《复彭丽生》。

害了一些中小地主的利益，加剧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有些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农民革命高潮的影响下，还参加了包括抗粮、结会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甚至发生过全县的举人、贡生、秀才、监生都“结会为逆”的“奇变”^①。六、七十年代后，各地也经常有所谓“功名之士”参加反清秘密结社和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些情况使得张之洞这个孔孟之徒忧心忡忡。在他看来，要“治民”必须先“治士”——先用孔孟之道去武装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才能维护和强化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反动专政。因此，他对当时统治阶级中许多人沉溺于繁琐无聊的考据非常不满，极力提倡“经学”。他从“崇儒”的反动立场出发，精心炮制了《轺轩语》^②和《书目答问》两株大毒草，煞费苦心地挑选出经、史、子、集的两千多部书，作为知识分子的“向学”途径。他把儒家的《十三经》定为立身的根本，特别是其中的《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更被他吹捧为“群经之纲维，万理之渊海”，要人们精读宋代反动理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和《近思录》，用这些

①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② “轺（音犹yáo）轩”，是古代“天子”使臣乘坐的轻车。张任学政，就以皇帝使臣自居，故书名叫《轺轩语》。张在该书自叙中说，全书都是他自己的见解，“无一抄袭”。其实，全书大部分都是从前代“经学家”江藩的《经解入门》中抄过来的。

“圣经贤传”来“陶冶”自己的身心。他恶毒地咒骂农民革命思想的传播是“人心浇薄”，“盗匪”四起，要人们“端品行，务实学”，不与“匪类”往来，并经常自觉地向古“圣贤”看齐，争取成一个当代的“圣贤”。总而言之，就是劝诱人们都效法孔孟，“克己复礼”，不要参加蓬勃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作封建统治的“忠臣烈士”。

经过张之洞几年的奔忙和努力，许多封建知识分子果然都上了他的贼船，湖北特别是四川省内的所谓“文风”重又“盛”了起来，经过农民革命以后一度显著削弱的孔孟之道的思想阵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因此在地主阶级中间就喧腾起一片对这个卫道士的赞颂声。以孔孟的卫道士自命的曾国藩也嘉勉张之洞“宏奖士心，津津乐道”。清朝反动统治者因张之洞尊孔有功，就将他逐级连升。

一八七九年，张之洞回北京任职。当时，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地主阶级中间产生新的分化，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加剧。以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等为首的淮系和湘系的洋务派头目^①把持了军事、政治、外交和财政的大权，另一批不掌握实权的顽固派官僚则集结在大学士李鸿藻周围，标榜清高，议论时政。这些人大都出身封建士大夫，熟读孔孟“圣经贤传”，以封建文化的“正统”自居，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保守、最顽

固部分的政治代表。他们排斥一切西方资产阶级的事物，反对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权谋”、“技艺”，攻击洋务派是“浊流”，而以“清流”自居。以那拉氏为首的反动统治者一方面不得不倚靠洋务派勾结帝国主义巩固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却又不甘心大权旁落，力图防止和改变“内轻外重”的局面。办法之一就是扶植和纵容“清流派”，利用他们的“清议”来箝制洋务派。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张之洞，是以“守道（捍卫孔孟之道）持躬（以孔孟之道为自己思想言行的准则）”自命的，这时就成了“清流派”的一个要角。

一八七九年，清朝出使俄国大臣崇厚执行李鸿章的投降主义路线，屈服于帝俄的压力，与沙俄签订《伊犁新约》，向老沙皇奉送了大块领土和主权。消息传来，舆论大哗。清流派借题发挥，攻击洋务派误国。张之洞也屡次上书，要求诛崇厚，毁成约，决一战，并斥责独揽军政大权的李鸿章，说每年耗费数百万两白银制

① 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年），湖南湘阴人。刘坤一（一八三〇——一九〇二年），湖南新宁人。左、刘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湘军中独当一面的大头目，依托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太平天国革命后，左、刘分别投靠法、英等帝国主义，搞起洋务活动，成为洋务派的要角。左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刘历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政治上，左、刘与曾国藩等湘军魁首彼此互相联络，结成一个排他性的军阀官僚集团，称“湘系”。以李鸿章为首，依托淮军起家的军阀官僚集团，称“淮系”。

造武器和练兵，临事而不能一战，要这样的“重臣”干什么？但张之洞之所以发表这种高论，并不是出于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动机，而只是为了迎合那拉氏的政治需要，猎取时名。为此，他特地提出“忠君爱国”的口号，主张“相忍为国”^①。他所谓的“国”，就是卖国媚外的清王朝。他甚至提出，如果中国被沙俄打败，就可以将新疆和台湾的主权出卖给英国和日本，与英、日联兵再战。这种引狼入室的主张，暴露了他在本质上也同李鸿章、崇厚等一样都是彻底的卖国主义。那拉氏很欣赏他的“忠心”，一八八二年就提拔这条得力走狗为山西巡抚。

这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西方列强大大加剧了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大大加强了其对清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和外交的控制。他们在中国培植买办阶级的同时，还极力利用和改造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把它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帝国主义执行这种侵略政策的结果，使得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进一步分化，相当多的人逐步买办化，从顽固派转向洋务派；以那拉氏为首的反动统治者加速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因而，作为近代中国官僚买办阶

^① 张《书札》卷一，第一九页。

级的前身的洋务派势力就越来越大，而不适应帝国主义侵华需要的顽固派就不能不日趋失势，活跃一时的清流派在八十年代中以后，也逐渐销声匿迹。在这样的情况下，善于见风驶舵的张之洞，从八十年代中开始，便向洋务派看齐，拿相依为命的孔孟之道来为卖国媚外的政治需要服务，成了这一时期地主阶级买办化的典型代表。

张之洞就任山西巡抚，就从一个没有实权的京官变为一个掌握一省军政的大吏，从专事空论的“台阁”转至镇压人民的前线。他一方面感到“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搞好同帝国主义的关系，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深深地为日趋高涨的人民革命潮流所震惊，立志要为清王朝作“可大可久之图”。因此，他抵任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继续大搞尊孔读经：祭祀孔老二，核定隆重的祭孔章程；建立“令德堂”，专事“通经学古”^①。第二件大事就是设立“洋务局”，紧步曾国藩、李鸿章的后尘，高喊“洋务为当务之急”了^②。从此，在所谓“自强”的骗人招牌下，他网罗起“洋务人才”，致力起“洋务事业”来。他根据孔老二在其反革命变天账——《春秋》中写下的搞反革命两手的

① 张《年谱》卷二，第一页，张《弟子纪》第四页。

② 张《公牍》卷四，第二四页。

遗教，倡言“虽有文事，必有武备”^①，也就是把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把孔孟之道和洋枪洋炮结合起来，依赖帝国主义来干一番新的反革命事业。因此，一八八四年他调任两广总督后，就“首以购备军火为务”，特地奏准借洋款三百万两，用重金向欧美购买洋枪洋炮；同时又招聘外国军官来华为他教练反动军队，还说什么他这样做是符合“经之明训”的^②。一八八九年七月他调任湖广总督，更一头栽进英、德帝国主义的怀抱，仰赖他们兴办各种洋务事业。到中日甲午战争前，他创办的重要厂矿有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湖北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企业的规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仅次于李鸿章控制的企业。张之洞本人也一跃而成为洋务派后起的大头目。

张之洞的种种“洋务”家当，不管是“求富”的企业也好，“自强”的厂矿也好，完全是步曾国藩、李鸿章的后尘，自始至终都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督促和控制下进行的。例如办湖北枪炮厂，就向德国洋行借了一千万元的巨款；兴办汉阳铁厂，就先后向英、德借银三百多万两，当英国提出利息七厘的苛刻条件时，张之洞竟厚颜无耻地说：“并不为多”，“重息无妨”。工厂兴建之

① 张《公牍》卷三五，第一二页。

② 张《奏议》卷一一，第一六页。

时，除设备器材全套从国外运来外，所需砖瓦、螺丝钉也从外国运来，就连砌墙上瓦的工匠也都用重金从外国请来。至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更是由洋人“包办一切”^①，他们“稍不如意，即以停工挟制”^②，甚至由其领事、公使出面干予，表现了十足的买办性。后来，张之洞还打算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官纺织局等企业干脆完全出卖给帝国主义，彻底戳穿了他所谓“自强”的欺骗性。

如前所述，所谓“洋务运动”的基本点就是用新式武器和舰只加强清朝反动军队，借以保存封建残骸，实质上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一种反动的、卖国的“自救”运动。张之洞兴办各种“洋务”，着眼点也在这里。在这个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看来，太平天国革命后各地不断爆发的人民起义都没有发展成为“大乱”，就是因为六十年代后“官军”手中有了“洋械”的缘故^③。因此，他创办的各种“洋务”事业，也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例如他办炼铁厂，就是为了给制造枪炮提供原料，宣称这是“今日讲求武备最急之务”^④。他办丝麻纺织等轻

① 张《劝学篇》二。

② 张《电牍》卷二七，第二二页。

③ 张《奏议》卷四八，第三页。

④ 同上书，卷三八，第一页。

工业,目的是为了攫取盈利“佐助铁局经费”^①,实际上是他的军事工业的附庸。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空前激化,张之洞凭着其反革命的嗅觉,预感到国内“不久将有变乱”,反动统治集团“虽欲偷旦夕之安亦不可得”^②,因而更声嘶力竭地鼓吹“练兵筹餉”,以此作为最紧迫的“弭乱”“要图”^③。他提出要从帝国主义国家雇请“洋将”,督练“精兵”十万名,梦想这样就可使清朝反动统治者稳坐江山,“永无内患”^④了。于是在一八九五年,他就依靠德帝国主义编练了所谓“自强军”两千八百多名,准备以此为底子陆续扩充,为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提供新的支柱。很显然,张之洞办这种“自强”洋务,只是“强”了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统治,“强”了张之洞这个后起的洋务派头目。

作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儒臣”,张之洞较之其“洋务前辈”李鸿章,居然也有些别致的地方:他特别用心将其“洋务事业”与儒家的“圣道”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搬出了《易经》、《尚书》、《春秋》、《论语》、《中庸》、《孟子》等等一大堆的“圣经”,来证明他的种种“洋务”是完

① 张《奏议》卷三五,第二一页。

② 张《电牍》卷二五,第一七页;卷二三,第二三页。

③ 张《公牍》卷三六,第三页。

④ 张《奏议》卷三七,第二二页。

全符合孔孟等“先圣”的“经义”的，他所仿效的种种“西法”，中国“圣经皆已发其理而创其制。”^①《中庸》不是说“来百工则财用足”^②吗，他创办各种“求富”的厂矿，就是基于这种“古圣人富国之要策”的^③。两千多年前孔老二门下许多学生不是都拿起武器去“卫”奴隶主贵族之“国”吗，他搞各种“自强”的洋务，不但不是“师事洋人”，恰恰是“反(同返)经复古”^④。他说，“兵事为儒学之至精”，要当好半殖民地化的孔孟之徒，就应象他这样把全力加强反动武装作为“身心性命之学”^⑤。张之洞这样挖空心思地把“洋务”与“国粹”，把尊孔与崇洋联系在一起，不仅进一步暴露了这个“儒臣”的卫道士面目，也进一步说明了洋务活动的反动实质。张之洞的一个亲信幕僚，记述张之洞之所以由清流派转为洋务派，就是因为这个“儒臣”认识到，如不仿效李鸿章等采用一些“西法”来“图富强”，那就“无以保中国(清朝)，即无以保名教”。他特别说明，张之洞这样做，决不是羡慕欧洲资本主义，决不是想使中国真正“富

① 张《劝学篇》。

② 原见《中庸》第二十章。此语大意是，发展各种工艺，就可使财政充足。

③ 张《奏议》卷五四，第一六页。

④ 同上书，卷四五，第一四页。

⑤ 张《电牍》卷六七，第一页。

强”，只是“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①这个反动爪牙的记述，倒是供出了张之洞兴办各种洋务事业的真实用心，就是挽救清朝反动统治，挽救孔孟“名教”。因此，中外反动派都对他十分宠爱，多方加以扶植和支持。这样，在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张之洞各项洋务事业的开办，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就迅速膨胀起来，成了李鸿章而外的中外反动派都另眼相看的又一个买办官僚。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近代中国的尊孔派中，如果说曾国藩是农民革命高潮期间对抗农民民主主义的卫道士，那么，张之洞这个后起的孔孟之徒，就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时对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卫道士。张之洞精心炮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卫道”的思想和政治纲领。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作为这个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代

^①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记闻·清流党》。

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在帝国主义各国瓜分狂潮的刺激下，在迅速高涨起来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推动下，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达到救亡图存和维持清朝统治的目的。于是，在十九世纪末，就出现了一次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著作中谈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时指出：那时人们认定“**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他们认为，时至今日，中国必须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中寻求“救亡之道”和“自强之谋”，即解决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个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从这种政治需要出发，严复译述了《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历史，梁启超、谭嗣同等创办了《时务报》、《湘报》等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报刊，为维新变法运动制造舆论。他们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法家的进步史观和变革思想，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批判三纲五常等封建主义的

①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五六页。

旧文化，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清朝统治者守旧倒退的反动路线，给长期以来犹如一潭死水的思想界带来一股启蒙的新风。“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①因此，它就不胫而走，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逐渐从封建旧文化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视新学如“圣神”，“鄙孔孟为迂腐”^②。资产阶级新文化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也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

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使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十分害怕。张之洞这个半殖民地化了的“儒臣”，这时就大搞反革命的两手，装出一副赞成变法的姿态来破坏维新变法，打出赞成“新学”的幌子来反对资产阶级新文化，充当了封建旧文化的卫道士和镇压维新变法运动的刽子手。

当康有为等倡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展之初，惯会欺世盗名的张之洞曾一度装出积极赞助的姿态。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张之洞不但自愿列名入会，而且还主动捐银五千两，以示支助；第二年，维新派的喉舌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五七页。

②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四七九页。

——上海《时务报》创办，很快风行南北，张之洞特地要求报馆按期给湖北全省各衙门寄送；上海“农学会”成立时，张之洞又主动要求列名于内，并捐银元五百元。张之洞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在维新变法的思潮风靡全国的形势下，如果一味守旧，不仅不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而且会暴露自己的愚蠢和顽固。所以他就阳借“赞助”之名，阴行控制之实，以便将维新变法纳入中外反动派都支持的“洋务活动”范围之内。但是事实很快粉碎了他的梦想，维新派并不接受他的控制和劝阻，反而更加广泛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公开向地主阶级顽固派和封建旧文化挑战。不久，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势力便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猖狂反扑。于是张之洞就撕掉其假维新的面纱，露出了孔孟的卫道士的真面目：封闭了上海的强学会；指使徒党撰写黑文，批驳严复的《辟韩》等尊法反儒文章，甚至想杀害严复；通过徒党控制《时务报》，并一再致电外省督抚，严禁《湘报》、《蜀学报》等改良派报刊；恶毒诬蔑维新志士是“匪人邪士”，咒骂维新思想和人民革命运动是“邪说暴行”，呼吁各省反动统治者与他一道严加镇压，极力向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顽固集团表明自己与维新派划清界线。为了所谓“辟邪说”，即阻挡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维护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他就从地主开办

阶级尊儒反法的立场出发，精心炮制了一部名为《劝学篇》的大毒草，大肆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要不要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这几个重大问题上，张之洞都提出了一套与维新派针锋相对的反动主张，成了维新变法运动一个最凶恶的敌人。

当时，维新派指出，清朝封建统治已如朽木粪墙，千疮百孔，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必须采择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新政”、“新法”、“新器”，来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才能保全中国，求取富强；如再守旧不变，那就“百事皆非”、“必亡而已”。顽固派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制度，则搬出儒家“敬天法祖”的教条，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公然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张之洞与顽固派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打着“变”的幌子，兜售不变的主张。他说：“夫不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机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①意思是说，法制、器机、工艺，即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和生产技术是可以变，应当变的，而封建等级制度和孔孟伦理道德，则是万万不能变的。他根据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声称：

^① 张《劝学篇》。以下五段所引张之洞反动言论，除另注者外，均见此篇。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这些都是“不可与民变更者”。他咒骂维新派废弃三纲的进步主张是“欲举世放恣黷（音读dú）乱”，罪该万死。这就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也就是要坚持孔孟之道，坚持封建专制制度，不许有任何怀疑和触动，从根本上反对维新派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为此，他在《劝学篇》中就拚命吹捧孔老二是什麼“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育万物”的“先圣先师”，攻击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人物商鞅“暴横尽废孝悌仁义”，申不害“论卑行鄙”，韩非“惨刻无理”，苟况学说造成“世道经笈之祸”（指秦始皇焚书坑儒），诬蔑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都是“残民剥民”，导致秦朝和宋朝的灭亡。这就充分暴露了这个卫道士顽固守旧的反动立场和尊儒反法的反动面目。

当时，维新派搬过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作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上层向封建地主阶级要求分享政权的理论根据。他们批判了前几十年中洋务派只学外国的“枝叶”而不学其“根本”的作法，指出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富强之原”，首先不是坚船利炮，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因而他们就主张“尊民”，提出了设议院、制宪法等维新要求，实际上是要在君主立宪制度下给资产阶级和中

小地主一些政治权利。为此，他们对儒家的三纲五常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抨击，鼓励人们“冲决”这些“网罗”。对于维新派这种兴“民权”的进步主张，张之洞同顽固派完全一样，十分害怕和仇视。他叫嚷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如果加以倡导，必将导致“贱（被剥削阶级）不服贵（剥削阶级）”，导致“纪纲（封建伦理和等级制度）不行”，导致“大乱（人民革命）四起”，甚至导致外国干涉。他根据孔老二“正名”的说教，拚命鼓吹三纲五常，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什么“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为了兜售这种反动谬论，他不惜牵强附会，硬说三纲五常不仅古已有之，而且“洋亦有之”。比如外国总统有解散议院之权，人民遇其总统有吉凶之事，“贺弔忧乐，视如切身”，这是外洋本来也有“君臣之伦”的证明；外国人父母去世，儿女穿孝，并置花坟上，这是外洋也有“父子之伦”的证明；外国不许妇女从军、参政，这是外洋也重“夫妇之伦”^①的证明。总而言之，三纲五常是普遍的、神圣的、永恒的，“强国之本原”就在这里；而民权说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万万行

① 张《奏议》卷四八，第一八页。

不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张之洞硬把中国的封建纲常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扯在一起，把尊孔和崇洋结合在一起，足见他为了抗拒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而不择手段到了何等地步。

当时，维新派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磨牙欲噬，瓜分惨祸迫在眉睫，处在这样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以西学为要图”，全国“大讲西学”。从这种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即所谓“新学”，希望借此来改变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之“体”，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地主阶级顽固派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极力反对新学，主张“我用我法”，变本加厉地尊孔读经。张之洞也用相同的腔调，吹嘘儒家的反动典籍《四书》、《五经》“道大义精，炳如日月，讲明五伦，范围万世”，如果不尊孔读经，中国就不成其中国，中华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五三页。

族就危险了。但是他认为，光知“守道”是不够的，同时还要“识时”，也就是要认识中国已不再处于封建大一统时代，“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内”——威胁清朝反动统治的不是外国帝国主义，而是本国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要抗拒人民的革命怒涛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就不能株守前代封建王朝的老黄历，而应该学习和应用一些“西学”来“应世事”，亦即所谓“西学为用”。

张之洞所说的“西学”，一是“西政”，即帝国主义所要求的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教体制；二是“西艺”，即西方的军事和工艺技术。两者相较，“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不过，张之洞反复强调说，这里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一切离经畔(违反)道之言，严加屏黜”^①，务使全国思想和政治都“一”于孔孟之道。也就是说，一切都必须有利于中外反动派竭力维护的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不然的话，就会导致孔老二最反对的“犯上作乱”。他劝导顽固派说，如果一味守旧，连这种“西学”都不讲，那就不能适应需要，等于是“自塞”了清朝统治的生路，即使整天手捧经书，口谈理学，仍然是“孔孟之罪人”。说到底，就是要使“守道之

^① 张《奏议》卷四八，第四页。

儒，兼为识时之俊”，即要做象他这样将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半殖民地化的孔孟之徒。很明显，张之洞鼓吹“西学”与维新派提倡新学，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的。无怪乎他学着其祖师爷孟轲“何患乎无君”的老调，无耻地宣称：如果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①这就充分暴露了张之洞“西学为用”的卖国主义本质。

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②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正是把这两种反动文化结合在一起的黑典型。这是因为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政治上既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又要投靠帝国主义，思想上就不得不搞折衷主义，把“中学”和“西学”调和起来，把尊孔读经、尊儒反法的倒退复古路线和卖国崇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

②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五五页。

洋、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路线结合起来，以适应中外反动派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不讲新学则势不行”的历史潮流下，张之洞要抗拒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就不能不装出“赞成”西学的样子，借以欺世盗名，以假乱真，把自己卫道士的面目掩饰起来。这是张之洞比地主阶级顽固派、比老式的孔孟之徒更狡猾、更毒辣的地方，因而更具有欺骗性和反动性。

在张之洞的心目中，“中学”与“西学”虽各有不同的内容和妙用，但两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西学为用”以“中学为体”为前提条件，而“中学为体”又为“西学为用”提供理论根据。他说：“孔子学于四夷”，《四书》《五经》指明历代帝王“宅中驭外之远谋”^①，这些便成为他投靠帝国主义的理论根据。“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地主买办阶级之“国”是靠反革命暴力、靠帝国主义的枪炮支撑的，否则孔孟之道（“教”）的推行就没有保证。所谓“保教必先保国”，也就是尊孔必先卖国；所谓“保国必先保教”，也就是卖国必须尊孔。这样，张之洞就用孔孟之道作为精神纽带把倒退复辟和卖国媚外密切地

① 张《奏议》卷四八，第四页。

结合了起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曾国藩以来洋务派一贯的指导思想，但是把尊孔与卖国的关系从理论上作出这样的总结和发挥的则是张之洞。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曾经深刻地揭露近代买办官僚的丑恶嘴脸，他说：“‘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①鼓吹“中体西用”论的张之洞正是这一号角色。因此，他的《劝学篇》就被清朝反动统治者当作宝贝，说它“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②，特地颁发各省，广为宣扬。帝国主义对它也格外珍视，迅速把它译为英、法等国文字，题名《中国唯一的希望》，把它们奴役中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这部大毒草的传布上。

但是，中外反动派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张之洞等反动势力扼杀了维新变法运动后不久，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农民英雄们用武器批判了张之洞之流宣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图谋。在义和团运动的推动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的主角。中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四〇九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版，光绪二十四年，第一二六页。

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

毛主席指出：“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①义和团运动后，清朝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完全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共同压迫中国人民。一九〇二年，那拉氏在“上谕”中公开宣布，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②。就是说，要把中华民族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帝国主义，做一个能讨得帝国主义“欢心”的儿皇帝。从此以后，近代中国的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便集中地表现为中国人民与清朝反动统治者的矛盾。推翻已经彻底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清朝，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要求。因此，义和团运动过去不久，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为目标的近代中国第三次革命高潮很快就酝酿成熟，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惊魂未定的中外反动派发现，自

①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二九六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第八八页。

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但是，张之洞叫嚷说：“国势虽蹙（音蹙cù，危急之意），断无坐以待亡之理。”^①于是他在义和团运动过后就挖空心思，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了三份奏折，为当时正根据帝国主义的意旨演出“新政”丑剧的清朝反动统治者提供续命的丹方。在奏折中，张之洞从儒家所谓“圣道执中”的原则出发，把臭名昭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体化，提出“整顿中法，仿行西法”，“以仿西法为主”的主张。为什么要这样呢？张之洞说：“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各国之见，……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②，变西法才能“与诸大国开通文明之意”符合^③。意思十分明显，那就是要适应帝国主义扩大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需要，使中国封建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进一步结合起来。为此，他提出“中法”必须整顿变通者十二项，“西法”应该择要采用者十一条，总的目标是要达到一“治”、二“富”、三“强”。因为经过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清朝反动统治陷于四面楚歌，岌岌可危，必须赶紧整顿和修补，所以要求“治”；因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每年向帝国主义进

① 张《电牍》卷四九，第一三页。

② 同上书，卷五〇，第三一页。

③ 同上书，卷五六，第二一页。

贡四千万两以上(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岁入之半)的赔款和洋债,必须加紧搜刮,所以要求“富”;因为各支反动军队腐败不堪,人民革命的怒火却愈烧愈烈,必须全力以赴进行“练兵”,所以要求“强”。他说:“外国最长者莫过于兵”,“整顿中法”也好,“仿行西法”也好,重点就是“练兵筹餉”,用加强反革命暴力的办法“使皇上之权日见其尊”。他特别说明,他所主张的“变法”基本上都是三十年来洋务运动的继续和扩大,本质上是与戊戌维新变法“判然不同”的^①。搞这种“变法”的妙用之一,是“付各国期望”,使西方列强知道清朝并不象过去那样“懒滑无用”,而是“有奋发为雄之志”,正在尽一切努力统治中国人民,可求得它们“稍加青眼”;妙用之二,是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各种“犯上作乱之邪说”,欺骗和镇压革命人民;妙用之三,是可以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使孔孟“圣教乃能久存”^②。这表明,张之洞在十九世纪末主要用来抵制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中体西用”论,到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新时期开始之际,又成了地主买办阶级用以满足帝国主义把中国殖民地化的侵略需要,防止和破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理论武器。

① 张《奏议》卷五四,第三二页。

② 张《电牍》卷五〇,第三一页。

但是，人民要革命，社会要前进，这一客观规律是张之洞等一小撮反动派抗拒不了的。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各族人民反赔款摊派和抗捐抗税的斗争、反洋教斗争和反清起义，就几乎遍于全国所有省区。以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阶层越来越广泛。在一些地区，城乡劳动群众中间传唱着这样的山歌：“这世界，不得了！富的富（得）不得了，穷的穷（得）不得了，不造反，不得了！”^①“犯法不怕犯上天，皇帝妹子我敢恋，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监恰似游花园。”^②这是对张之洞之流拚命宣扬的孔孟之道，拚命维护的封建皇权的公开否定和直接挑战，生动地反映出人民群众高昂的革命精神和高涨的革命形势。正是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推动下，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迅速地开展起来。

毛主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③。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决心用革命暴力去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反动统治。为了争取在本世纪初迅

① 转引自黎澍，《近代史论丛》第七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第三六九页。

③ 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五二七页。

速扩大起来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努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译述了好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又针对康有为等资产阶级保皇派^①和张之洞等买办官僚所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撰写了大批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暴力革命、反对改良守旧，宣传救亡爱国、反对卖国媚外，宣传尊法反儒、反对尊儒反法的小册子和文章，为民主革命运动开辟道路。特别是章太炎，先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尊荀》、《商鞅》、《秦政记》、《秦献记》等一系列尊法反儒的战斗文字，赞扬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指出中国之所以长期不能进步，“祸本”就是孔孟之道；清朝反动统治者之所以要尊孔，目的就是妄图从思想上奴役人民，便于进行反动统治；中国今日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就必须抛弃孔教。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近代尊孔派和卖国贼的祖师爷孔老二，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因缺乏向地主买办阶级作斗争的思想理论武器而处于所谓“学问饥饿”状态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吸收资产阶级革命派

^① 康有为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于一八九九年六月组织保皇会，宣传君主立宪，坚持改良，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堕落成为反革命头目。

宣传的民主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纷纷汇集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之下，一时“排满革命之说充塞庠（音祥 xiáng）序”^①，“三尺童子朝入蒙学，暮以驱逐满洲归告其父兄”^②。其势有如海潮之骤涨，使得形形色色的孔孟之徒“无术挽救，徒呼负负”^③。一九〇五年，在孙中山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确定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从此革命风潮更一日千丈，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不断发生，打得清朝反动统治者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形势的发展是这样的快，正如孙中山指出的：“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坍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还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④

面对着不可阻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张之洞真是如坐针毡，寝食难安，硬是要找几根小柱子支撑清王朝这间即将倒坍的破屋。但是，“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及其变种“练兵筹饷”的“新政”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其演化“整顿中法，仿行西法”也好，都

① 《王先谦自订年谱》上，第九一页。

② 钱振铎：《名山文约》卷六，《学堂汉》。

③ 《王先谦自订年谱》上，第九一页。

④ 《孙中山选集》上，第六二页。

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时他实在智穷力索，再也拿不出新鲜的货色，只好仍旧向孔老二告急求救，死死抓住他毕生维护的孔孟之道作为救命的稻草。一九〇三年，他伙同别的买办官僚给清政府重订了“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学堂均须以尊孔读经、维护三纲五常为宗旨。他还亲自炮制出“学歌”，要学生们远离“自由”、“民权”、“革命”，尊“君上”，讲“五伦”，读《五经》，保“圣教”^①。一九〇五年，他向清政府提出，各地的学校教育都必须把读经放在首位，着重于学生的“品行”，强迫学生遵照儒家鼓吹的“慈孝”、“忠良”等封建教条行事，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者。清政府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规定各级学校都必须“敦崇孔学”，以“尊孔”、“忠君”、“明伦”作为“宗旨”，要使全国学生每天端起饭碗就想到“忠义”，以便杜绝“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邪说”^②。

但是，时代的潮流是无法抗拒的。尽管张之洞等反动统治者硬“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③，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在汹涌澎湃的民主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仍然不可避免地没落下去，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讨孔的火力越来越猛。许多学

① 张《公牍》卷二一，第九、一〇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总五四九二——五四九六页。

③ 毛主席：《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七八八页。

校的“读经”课形同虚设，有的干脆改订章程，废除了这个科目。张之洞目睹耳闻这些“怪风恶俗”，感到自己倚为性命的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危险已到七八分”^①，再这样下去就有“泯灭”的危险，“不胜大惧”。为了阻挡这股革命潮流，保存孔孟的“圣脉”和“绝学”，他更大开倒车，干脆把原先还学些“西学”的湖北“经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专意物色“海内名儒”，带着一批孔孟之徒专门研读和宣扬孔孟之道，并提出复古倒退的“保存国粹”的口号。他胡说什么，孔孟儒家的“国粹”是“宇宙之精华”，应该象太阳、月亮一样永放光辉的，如果让它没落下去，那就有“乱臣贼子之祸”、“洪水猛兽之忧”^②。因此，这个年已七十的老贼就拿出最后的力气大搞尊孔读经，妄图通过这个途径“保国粹而清乱源”^③，即达到维护孔孟之道和消除革命运动的双重目的。中外反动派对他这种尊孔复古的反革命狂热非常欣赏。一九〇八年，日本帝国主义搞起了一个“汉学会”，打算把东亚各国的“儒者”组织起来，进一步兜销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孔孟之道，特地“公举”张之洞这个“海外知名”的老卫道士为会长。张之洞受宠若惊，

① 张《电牍》卷七四，第一一页。

② 张《奏议》卷六八，《创立存古学堂折》。

③ 《清实录》，光绪朝，卷五七五，第一〇页。

欣然接受，决心为中外主子尽最后一把力。

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毛主席在揭露蒋介石等卖国集团的阶级根源时指出：“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①。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就是近代中国卖国贼营垒中的一个主要成员。

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清朝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更加依赖帝国主义，用对帝国主义全面妥协投降来换取对内维持反动统治。所谓“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就是这班卖国贼铁心卖国的自供状。张之洞这个精通孔孟之道的“儒臣”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起劲地兜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为了抵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维护封建制度，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需要，为他自己甘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辩护的。我们看一看张之洞怎样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李鸿章等的卖国媚外

^① 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三〇页。

路线，丧心病狂地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涂脂抹粉，效忠尽力，就能进一步明了他炮制的“中体西用”论到底是什么货色。

1. 认贼作父，兜售“卖国有理”、“侵略有功”、崇洋媚外的卖国哲学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反动统治者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屈膝投降，出卖大批的领土和主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激烈反抗。张之洞却胡说什么清王朝之所以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忍辱求和”，乃是为了“保此中国”、“保其种类”、“爱惜生民”、“保其生命，保其财源”，都是“国家爱民”的表现，因此，人民不仅现在应该掏尽自己的血汗钱来替清政府偿付巨额的赔款，而且子孙万代都应“体谅”皇上的苦心。据他说，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是符合孔孟之道的“正理”^①。一句话，清政府“卖国有理”，“卖国有功”！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对我国大搞资本输出，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张之洞对这种“西学”之“用”大唱赞

^① 张《劝学篇》，张《电牍》卷四九，第一三页，卷五一，第三二页。

歌,说什么这样一来,一可以使中国的农、工、商各业都能得到“洋厂”之“利”;二可以帮助中国人掌握科学技术;三可以使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便于“筹饷练兵”。总而言之,是“利九害一”的大好事^①。帝国主义为了便于经济侵略,希望清朝统一度量衡。张之洞搬出《论语》、《尚书》、《周礼》等“圣典”作根据,说照帝国主义所要求的办理,确实是“治国要政”^②。他甚至建议清政府,减轻帝国主义企业的税收,为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当时,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发出了种种“亡华”的狂言,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竭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张之洞却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根据,恬不知耻地说:这有什么值得生气的?《孝经》中说“士有诤友”,现在是“国有诤邻”,不是大有好处吗^③?并无耻地赞颂英、美、德等西方殖民强盗“持平仗义,保全中国”;颂扬妄图独占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仗义兴亚”^④。一句话,帝国主义“侵略有功”,中国受侵略有“益”!

① 张《电牍》卷六〇,第一四页。

② 同上书,卷六三,第六页。

③ 张《劝学篇》二。

④ 张《电牍》卷六〇,第九、一五页;卷五九,第二八页。'

为了适应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加剧侵华的需要，张之洞还主张把一切都交付给帝国主义来办；要造铁路，应由“洋商垫款包办”，若由中国自办，则只能浪费时间和金钱，即使十年也办不成；要开矿，就应让洋人“包办一切”，或则“中外合股”，否则，就绝对开不出好矿；要振兴茶务，如不请“洋人督率教导”，那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要机制土货，也必须“与洋商合办”，华商独力难成；要编练水陆军，更必须用洋将“管带”，不能光叫他们担任教练，否则，“虽有华兵亦属无用”^①。一句话，离开了洋大人，中国一切都办不成！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光辉著作中指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地大物博的中国，甲午战争后更成了帝国主义各国竞相输出商品和输出资本的重要场所。作为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张之洞是充分理解其洋主子的意愿和要求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各国都“深望”中国与它们“共进文明”^②。他之所以在这个时期特别卖力地兜售上述种种卖国谬论，

① 张《奏议》，《请修备储才折》、《汉口试办商务局酌拟办法折》，张《公牍》卷一五，第九、一〇页；卷一六，第四页；张《电牍》卷二六，第二三页；卷三一，第二八页；卷五一，第一八页；张《电奏》卷一〇，第一二页。

② 张《电牍》卷六三，第一九页。

特别热衷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人员来办理种种洋务事业，特别起劲地鼓吹他所谓的“西学”和“变法”，正如他自己供认的，是为了使中国“事事开通”，从而使帝国主义“各国商务”“日加畅旺”^①。也就是适应大大膨胀起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胃口，把国家和民族进一步拖进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明”之中。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后，在日益迅猛的国内革命形势的威胁下，张之洞感到清王朝“大局岌岌”，今后要想存在下去，“一线生机”全在于帝国主义的恩赐。因而，他在反动统治集团中更反复宣传所谓“以商存”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各国“开门通商”，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全行向各国开放”，由各个帝国主义“任便公享”^②，用以换取帝国主义保全清王朝。张之洞极力兜售这套卖国主张，为帝国主义侵华、亡华搭桥铺路，充分暴露了这个官僚买办阶级的“儒臣”堕落到何等地步。

2. 里通外国，充当帝国主义 灭亡中国的内奸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为了实现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在进一步控制清朝反动统治中

① 张《电牍》卷五一，第三一页。

② 张《电奏》卷一〇，第一二页。

枢的同时，又在地方军阀官僚中间培植各自的走狗。由于张之洞手里有了一笔可观的“洋务”本钱，因而被帝国主义看中。他就先后投靠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他们的“瓜分”阴谋推波助澜，甘心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和走狗。

《马关条约》规定，清朝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割给日本。这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信号。消息传出，其他帝国主义强盗都磨刀霍霍，准备分割中国。应该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瓜分”呢？张之洞认为，清王朝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人（帝国主义）全（保全中国）我全，人分（瓜分中国）我分”^①。如用武力抵抗，那就非“亡”不可。办法只能是仿效两千多年前孔老二的大弟子子贡，“不可顾虚面子”，只有“强邻借助”^②，才有一点生路。基于这种卖国逻辑，张之洞就进一步发挥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把它提到清王朝基本“国策”的高度：根据各个时期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投靠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它们的侵略要求一一加以满足，把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一份一份地奉献给不同的“熊虎豺狼”，以换取它们的怜爱和支持。这是张之洞给清朝反动统治开出的续命方，也是他自己

① 张《电牍》卷四六，第一八页。

② 同上书，卷四七，第八页；卷五〇，第一二页。

投靠帝国主义的遮羞布。

沙皇俄国历来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鸦片战争后二十多年内，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掠夺了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它更加紧诱骗和控制那拉氏和李鸿章。一时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刮起了一股亲俄的妖风。惯于趋时附势的张之洞，为了迎合沙俄的侵略需要，硬把二百余年来沙俄对我国的疯狂侵略说成是“友谊”，说什么俄国“与本朝乃二百余年盟聘之国，交久谊深，不比他国。”^①胡说沙俄“举动阔大磊落”^②，因而他建议清政府对沙俄“力加联络”。怎样“联络”呢？张之洞策划说，象俄国这样的“大国”，也许不象暴发户日本那样地“爱钱财”，但是，“岂有不爱（中国）土地？”^③现在，中国就应投其所好，用领土和主权去“歆（音心xin）动”沙俄，加“厚”同沙俄的“交谊”。具体办法，是把新疆给予俄国，并答应俄国，一旦各国争夺中国时，其海军可以入据中国的船坞，其陆军可以进入中国的领土，中国还要向它提供煤、粮、运输工具和费用。据他说，这样卖身投靠以后，沙皇俄国就成了中国的保镖，一旦中国受

① 张《电牍》卷二三，第一九页。

② 张《奏议》卷三七，第三七页。

③ 张《电牍》卷二四，第一四页。

到别国的武装进攻，沙俄就可以马上派出数十艘兵舰前来支援。实际上，就是妄图把中国变成俄国的保护国，让清朝反动统治者在沙俄的武力保护伞下做儿皇帝。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沙皇俄国公然派舰队侵占我国旅顺，并向清政府提出修筑中东铁路至旅大的要求，力图把东北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张之洞建议清政府，与沙俄订立密约，将旅顺给沙俄作军港，并代沙俄造栈屯煤，供俄舰使用，另由沙俄提供借款，造大连湾接吉林的铁路，充分满足沙俄的要求。他无耻地宣扬道：这样一来，“俄尽得实利，又享义名，孰能胜此！”^①让沙俄侵占我国领土，蹂躏我国主权，还要恭维沙俄可以获得“仁义”的名声，只有张之洞这类善于用孔孟之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儒臣”才能想得出来！

沙皇俄国侵华的“成功”，刺激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和日本的胃口。于是，以英、日为一方同以俄、法为另一方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沙俄用政治欺骗和公开行贿的方法拉拢那拉氏和李鸿章，英国和日本则把张之洞这个军阀官僚实力派作为自己的走卒和代理人。甲午战争后不久，日本就陆续派遣大批官员和特务来湖北进行拉拢，“淳淳”

^① 张《电牍》卷三四，第五页。

要求张之洞出头让中国与日本“联交”，并劝张“联英”^①。张之洞为了独树一帜，就与“亲俄”的李鸿章分道扬镳，迅即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密商“兼联英、倭（日本）”的办法，认为此事“极为切要”^②，一心投靠英、日。尽管当时中日战争结束还不久，中国各阶层人民反对《马关条约》的斗争还没有完全平息，但张之洞却不顾一切地出面为日本辩护，胡说什么日本与中国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都是“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后裔种族所分”^③，应该“修好”。一八九八年，他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商定，从湖南、湖北选派一百多名青年交日本士官学校训练，另请日本军事教官来鄂练兵“为各省倡”。他甚至为自己敢于认敌为友而自鸣得意，恬不知耻地夸耀说：中日“两国修好，因（甲午）战事未久，颇不易言。京外专主此说者，鄙人而已。”^④可是，由于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在那拉氏的缉捕下逃亡日本，引起那拉氏对日本的不满，张之洞投靠日本的卖国主张没有被那拉氏采纳。张之洞感到坐失机会，非常恼恨，说：“中东联络大局，全被康、梁搅坏，真

① 张《电牍》卷三三，第一四、一五页。

② 同上书，第二六页。

③ 张《劝学篇》一。

④ 张《电牍》卷三四，第三〇页。

可痛恨。”^①急于卖身投靠的心情真是跃然纸上。

对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华侵略势力最大的英帝国主义，张之洞更十分倾心。还在八十年代中，张之洞就给清政府规划了一条“固英、亲德”的外交路线，极力与英帝国主义拉关系。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等盘踞的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张之洞因而就更死心塌地地投靠英帝国主义。一八九七年，他为了迎合英国控制清朝海陆军的狼子野心，特向清政府提出重建海军的建议，主张费用全向英国借，舰只全由英国造，统帅和主要将领全向英国“借”，下面各级将弁数百名也由英国训练培养，成军以后，与英国远东舰队“合队操练”，清朝这个儿皇帝则在英国武力保护伞下“自强”^②。由于当时帝国主义争夺激烈，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正在兴起，一心投靠沙俄的那拉氏没有完全接受这一卖国主张，但却充分暴露了张之洞妄图把整个中国都抵押给英帝国主义的罪恶用心。

不久，爆发了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英、俄、美、日、德、法、意、奥八个帝国主义组织了侵略军进犯我京津地区。英国惟恐长江流域人民起来响应义和团，其他帝国主义会借机闯进它的“势力范围”，便指使

① 张《电牍》卷三六，第三二页。

② 张《电奏》卷七，第二三页。

张之洞等买办官僚，出头搞所谓“东南互保”。认贼作父的张之洞，本来就英帝国主义的看家狗自任，便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商定，对于英帝国主义在长江中下游的侵略利益“力任保护”。主奴之间关于“互保”问题一拍即合。一九〇〇年六月，张、刘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中外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流域及苏杭内地，由张、刘等买办官僚负责“保护”。张之洞还向帝国主义保证，不管以后清政府发布任何谕令，不管事态如何发展变化，他们这种卖国媚外的态度“断不更易”^①。事实上等于向清政府宣布独立，妄图自行建立在英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小朝廷。只是由于中国人民坚持反侵略反卖国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张之洞等公开分裂祖国的阴谋才不得不迅速收场。

张之洞搞“东南互保”替英帝国主义立了大“功”后，他同英国之间的主奴关系更进了一步。一九〇〇年八月，义和团革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任命大卖国贼、沙俄的走狗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使”，向帝国主义乞降时，英国就要求让张之洞、刘坤一也参加所谓“和议”。英国外交部还向张之洞表示，英国一定随时征询

^① 张《电牍》卷四〇，第四页。

张、刘的意见，而且“必以二位督部堂之意为重。”^① 洋主子的宠信和驱策，使张之洞感激涕零，与刘坤一相约，要更好地为英、日等帝国主义侵华尽力。其中他认为关系“中国以后万年大局”的要着，就是想方设法将清政府置于英国的卵翼之下。一九〇一年，他以“英国商务最盛，东方英人最多”为理由，建议清政府对英国“必宜格外联络”^②。随后，他又在英国的直接指使下，要求逃亡在西安的那拉氏和光绪帝“移驾”到英国控制下的湖北来，说这样一来，“英人必愿，日本亦便”^③，敦促那拉氏不要犹豫。其效忠英帝国主义，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

一九〇五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我国东北，在我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帝俄很快被日本打败。“与日人联络有年”^④的张之洞，对于日本战胜俄国，取代俄国在我东北的侵略权益，竟表示十分高兴。他在《筹议东三省事宜折》中，特地就战后如何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奢望问题，替清政府拟订了方案：一是要赶紧“筹款”，因为据他说日本“劳师糜饷，倾国相争，血

① 张《电牍》卷四三，第二五、二六页。

② 张《电奏》卷九，第三三页。

③ 张《电牍》卷四九，第一六页。

④ 许珏：《复庵遗集》卷三，第一七页。

战所得之利”，中国按照“情理”应该予以赔偿；二是要把东北的森林、矿产、渔盐之利和辽东铁路的一部分给予日本作抵；三是把辽宁交给日本驻守，把张家口以东的“防务”和宁夏以西的“防务”，分别交给日本和英国，如果俄国再来侵犯，就以日本或英国之将校率清朝军队“与俄人一战”。很清楚，张之洞是要把清王朝的“一线生机”都寄托在英、日帝国主义的卵翼上。他自己则因卖国有功，“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以“圣人之后”自居的张之洞，就是这样卖身投靠，甘当帝国主义的走狗。

3. 为虎作伥，替帝国主义 充当看门狗和刽子手

“安内攘外”，即勾结外部的民族敌人镇压国内人民革命，是历代儒家一脉相承的反动诀窍，也是指导张之洞这个买办化的孔孟之徒的思想和言行的一条重要准则。他说：“从来必先戢内乱，方能御外侮。”^①实际上就是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御外侮”云云，不过是这伙买办官僚的遮羞布。他说：中国“若各处扰乱，于中西商务均大有妨

① 张《电牍》卷四一，第一二页。

碍”^①，“必内讷靖而后外洋之商务兴。大局所关，固彼此两利者也。”^②因此，他就把镇压国内人民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维护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安全”和利益，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替帝国主义充当看门狗和刽子手。

还在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就无耻宣扬这样一种卖国媚外的“理”：帝国主义各国都与中国“讲信修睦”，“联盟结好”，中国人应当把他们视为至亲骨肉，如果他们有惊恐不安的情绪，中国就应“切容保如伤之意”，多方体贴他们，照顾他们，保护他们^③。他谩骂当时广东人民开展的反侵略斗争违背了中外反动派之“理”。后来，他长期担任湖广总督，更把这种卖国媚外之“理”发展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前面提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全国广泛地开展起来。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张之洞曾不得不承认，各地发生的所谓“教案”，“皆悉教曲民直”^④。但是，他却宁愿以曲为直，为虎作伥，在山西、广东、湖北等省，均严厉镇压参加反帝

① 张《电牍》卷六〇，第九页。

② 张《书札》卷五，第二七页。

③ 张《公牍》卷三四，第一四页。“容保如伤”：象护理自身的病痛一样地保护他们。

④ 张《奏议》卷六，第五页。

爱国运动的人民群众。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反洋教斗争在全国各地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就在张之洞严密控制下的湖北武穴、广济、宜昌、襄阳、麻城、黄州等许多州县，也播起了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战鼓，“洋人及教堂人人自危”^①。一贯力图“安辑远人”的张之洞，于是就急急忙忙跳出来为帝国主义保驾。他一面四处发贴告示，严刑禁止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一面从水陆两路赶调反动军队，奔赴有洋教堂和洋人的州县，“弹压保护，不遗余力”。他诬蔑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人民群众是“闹教匪徒”，严令各地反动官府，“不论有何情节”，即不管洋教士如何蛮横无理、挑起事端，也都要严加保护，“严拿”、“严惩”敢于冒犯洋大人的“匪犯”。在他的督促下，各地反动官府无理逮捕和惨杀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群众，使惊惶万状的帝国主义分子暂时又“转危为安”。事后，张之洞还特地通令各州县，要他们按季造报境内教堂洋人清册，以便他随时尽力保护，“预防”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一旦发现人民传布“攻洋”的反帝传单，火速“密拿”、“严办”，“以免生事”。他还恬不知耻地向帝国主义丑表功，说自己对于洋主子保护之周到，“一切可谓无微不至”，“直可以对万国而

① 张《公牍》卷一二，第三一页。

无愧!”^①

但是，中国人民是吓不倒、压不垮的。就在张之洞之流把国家和民族的“生机”交付给帝国主义的时候，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不可阻挡，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清朝统治中心的京津地区。清朝反动统治者感到自己有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只破船，随时有被革命洪流淹没的危险。老奸巨猾的那拉氏为了躲过革命的锋芒，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发布“宣战”上谕，并命令各省督抚招集义和团与帝国主义作战。张之洞认为，用武力去对付洋主子，那是“有输无赢”的^②。因此，尽管当时两湖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风起云涌，张之洞却报告清政府说，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没有反帝爱国的义和团之类可以招用，反而要求清政府公开发布“上谕”，责成各省反动官府一如既往地努力保护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说什么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显示清王朝“如天之仁”^③。他为了更尽心竭力向洋主子表示忠诚，咬牙切齿地咒骂义和团“害国殃民，神人共

① 张《公牍》卷一二，第二三、三一页；卷一三，第一一、二二、二三页。

② 张《电牍》卷四二，第二七页。

③ 张《电奏》卷八，第二七页。

愤”^①；怒骂湖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纠众横行，目无法纪，借名仇教，开衅强邻。”^②他通令各府州县，凡是传布人民反帝喜讯，鼓舞人民起来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都是所谓“造谣生事之人”，要立即当作“土匪”严加镇压，丝毫不得“宽纵”；同时又规定，凡是有教堂和洋人的地方，要多派军队和差役，“加意认真保护”^③。他三番五次地致电外省督抚，要他们不等帝国主义提出要求，就赶早主动“重办”参加反帝斗争的爱国群众，“万不可再伤洋教士一人”^④。总而言之，要各地官吏以他为榜样，当好镇压人民反帝斗争的刽子手，也当好帝国主义的看门狗。

为了使帝国主义充分明了他的态度和决心，张之洞还一再致电清政府许多驻外公使，托他们代他向所在国政府保证，他这个湖广总督能够对长江流域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力任保护”，恳请洋主子们“放心”^⑤。邻近省份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因而纷纷逃入湖北，张之洞一得到他们入境的报告后，立即赶派得力官员带着兵役、炮船，前往“照料”、“迎护”。帝国主义对张之洞

① 张《电奏》卷九，第六页。

② 张《公牍》卷一八，第二四页。

③ 张《电牍》卷三九，第一九页。

④ 同上书，卷四一，第二〇页。

⑤ 同上书，卷三九，第三二页；卷四一，第二三页。

这些表现，果然非常满意。英国侵略军头子西摩，后来特地代表英国，向张之洞传令嘉奖，对这条走狗“保护之力，感谢之至！”^①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了张之洞等所搞的“东南互保”，就是“保”帝国主义，就是卖国。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图，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者，进一步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虽然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已过去，但张之洞却有如惊弓之鸟，一想到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就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因而他更死命地抱住帝国主义的泥腿，妄图使自己免于沉没。他在反动统治集团中反复宣传，今后要吸取教训，“万不可再与洋人生事”^②。他自己更拿出全副反革命精力替帝国主义防范和镇压国内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活动，那怕是一点星火，他也谈虎色变、全力镇压。当他听到湖北和江苏一些地方，城乡有“幼童”练习拳棒，诵习符咒，就急忙命令地方官吏和驻防军队捉拿“严审”，“游街示众”，以免扩大成为新的义和团运动^③。当他听到上海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反对沙俄强占我国东北，而组织“仇俄会”的消息后，就声言这类

① 张《电牍》卷四八，第一一页。

② 同上书，卷五三，第二页。

③ 同上书，卷五二，第一页；卷六五，第四页。

爱国活动违背了清政府“禁立仇视洋人之会”的规定，必须迅速取缔。当他听到有一批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政府歧视和排斥中国留学生的无理规定，而有“忿激之举”的消息时，就马上电令留学生们要以“两国邦交”为重，以显所谓“儒者气象”^①，否则就要给予严厉惩罚。当他看到一些革命书刊，号召人们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卖国的清王朝时，就歇斯底里地大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倡言排外”，“搅扰和局”，“丧心病狂，大逆不道。”^②至于对二十世纪初各地蓬勃开展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他更是刻骨仇恨，不共戴天，用帝国主义帮同建立起来的“自强新军”，全力以赴，加以残酷的镇压，成了一个双手沾满人民群众和革命党人鲜血的大屠夫，为中外反动派效劳到最后一口气。

从张之洞上述种种卖国言行中可以看出，这个“中体西用”论的鼓吹者，既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尊孔派，又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卖国贼。同很长时期掌握清朝军政和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比较起来，张之洞因为主要只能依托湖北这块地盘与帝国主义勾结，因而在具体的卖国活动上没有李鸿章那么多，但是其卖国媚外的疯狂

① 张《电牍》卷七四，第一一页。

② 张《公牍》卷二〇，第三七页。

性和彻底性，并不比李鸿章相差多少。因此，帝国主义就非常喜爱这条走狗，在他生前和死后给他戴上种种好听的头衔，把自己奴役中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以后的反动派，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都把张之洞作为自己效法的黑样板。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受张之洞之害的湖北人民，则记下了这个尊孔派和卖国贼的全部罪行，对他“无不切齿”^①，人人争欲寝其皮而食其肉。

到了一九〇八年，张之洞已经七十二岁了。这个老贼自知作恶多端，“群谤众疑”，民愤极大，反动面目已被人们彻底看穿；而他自己竭毕生之力维护的清朝反动统治却仍然陷入了灭顶之灾。九月十六日，这个一辈子逆历史潮流蠢动的反革命小丑知道自己快要到地下晋见“先师”孔老二了，就强作精神，口授了一份给皇帝的“遗折”，说“时局艰虞，未能补救”^②，表示他死不瞑目。随后，在“国运尽矣”的哀鸣中，这个地主买办阶级的“儒臣”“忧愤以终”。而中国人民革命的航船，却乘风破浪，继续向前。

①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

② 张《奏议》卷七〇，第二五页。

四、尊孔、复辟、卖国 三位一体的袁世凯

张之洞死去以后两年，一九一一年十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以武昌起义为契机，很快在全国出现了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之后近代中国第三次革命高潮。在人民群众参加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尊孔派与卖国贼竭毕生之力维护的清朝反动统治连同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如同一座蛀蚀一空的木屋一样，一朝覆亡，顷刻瓦解，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历史再一次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决不以反动派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但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软弱和妥协，更重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阴谋

^①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九三二页。

破坏，这次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就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袁世凯手里。

袁世凯是怎样起家的？这个清王朝的奴才为什么一变而成为民国的总统？以后他又如何适应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需要，把尊孔、复辟和卖国合为一体的？了解一下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的尊孔派和卖国贼是很有帮助的。

中外反动派培植的新军阀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年），河南项城人，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青年时期，他就野心勃勃，利禄熏心，千方百计想挤入反动统治集团中去。开始时，他想通过科举考试的老路向上爬，但几次都碰壁而归。于是，他就另辟新途，巴结权贵。一八八〇年，他利用封建关系，去山东投靠李鸿章手下的淮军统领吴长庆，正式开始了反革命生涯，并逐渐与李鸿章拉上了关系。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反革命胆识和才干十分赏识，不止一次地称赞袁世凯“才堪大用”，再三向清政府推荐，主张加以提拔重用。

不久，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赖以支撑反动统治的主要反动武装——淮军和湘军先后溃不成军。

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招致了十分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战鼓在四川、福建、广东、山东、湖北、江苏、安徽、湖南、广西、直隶、河南、辽宁、山西、浙江、上海等省区隆隆响起，有的发展成万余人的起义大军。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不仅使得清朝反动统治者坐立不安，就连狂妄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也已看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全民性的规模而感到惊惶异常。为了抵挡革命高潮，支撑风雨飘摇的反动统治，因而，在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就决定拼集淮军余孽，改建一支“新建陆军”。

由谁来掌握这支新的反动武装呢？甲午战争的惨败，李鸿章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他的卖国贼嘴脸也暴露无遗，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政治势力显然开始没落，中外反动派需要物色新的走狗。善于趋时附势的袁世凯，这时就抛弃了李鸿章，另找上一个新的靠山——那拉氏的宠臣荣禄，取得了那拉氏的信任。帝国主义对于善于搞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刮目相看，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祸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与李鸿章谈判时，就曾对袁表示特别关切。因此，中外反动派便决定扶植袁世凯作为自己新的代理人，把“新建陆军”交给袁世凯督办。一八九五年冬，

袁世凯就在天津附近的小站，仿效德、日陆军军制，组编了步队、马队共七千人，为他后半生的反革命活动准备了重要的老本。

“新建陆军”一开始就受到中外反动派的特别重视和全力支持。就象当年支持曾国藩办湘军、李鸿章办淮军一样，帝国主义以更大的力量支持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使它发展特别迅速，很快取代淮军而成为支撑清末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在“新建陆军”基础上形成的、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军阀官僚集团，便成了清末重要的政治势力，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军阀。很懂得“有军就有权”的袁世凯，便死死抓住这支反革命武装，死心塌地地为清王朝和帝国主义效劳。随着这支反动武装的扩大，袁世凯的权势也迅速膨胀起来。

一八九八年，康有为、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与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袁世凯开始装出“同情”变法运动的模样，答应用他的“新建陆军”帮助维新派实现其政变计划，但回过头来却立即向那拉氏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把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浸于血泊之中。通过这一事件，袁世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守旧、倒退的反动统治集团的忠实走卒，一切进步势力的凶恶敌人。因此，他就更加获得了那拉氏的宠信，成为反革命政治舞台上的

重要人物。

在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袁世凯，很懂得李鸿章之所以能红极一时，就在于他不仅获得清朝最高反动统治者的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这个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在忠实地为那拉氏为首的清朝反动统治者效劳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寻找巴结洋主子的门径。他广泛地、频繁地与各国在华的侵略分子“交游”，向他们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尊崇和忠诚，进一步求得了帝国主义的垂青。

一八九九年，当山东兴起了声势十分浩大的义和团农民反帝运动，山东巡抚、大屠夫毓贤无力镇压时，帝国主义就公开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改派“一位能干的人”，带着“操练得很好的军队”去山东，用屠刀来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①。意思十分明显，那就是要清政府派袁世凯带着他的“新建陆军”来为帝国主义效劳。那拉氏奉命唯谨，随即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上谕”一出，帝国主义无不拍手叫好。他们称赞袁世凯“是个能干果敢的人”，相信倚靠这条能干的走狗，“扰乱(人民革命)即可停止，(反动统治)秩序即可恢

① 《美国外交文件》。

复”^①。

帝国主义的信任和鼓励使袁世凯感激涕零。他怀着感恩图报的心情去上任后，就竭尽全力，用残酷地镇压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来报答主子的厚恩。

他借肥城人民杀除了一个披着“传教”外衣的英国侵略分子为由，捉拿了五人，加以处死和监禁，还强迫当地人民向教堂赔款，为死有余辜的侵略者树立“纪念碑”，作为他就任巡抚之后给帝国主义主子的一份进见礼。

他为了替帝国主义扑灭义和团反帝烈火，一再上奏清政府，诬蔑义和团都是“邪教”、“莠民”，必须严厉镇压。为此，他赶忙炮制出《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规定凡是练拳或赞成拳厂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同时又派遣反动军队，深入各县“痛剿”义和团。他通令各军遇见义和团时，要立即开枪开炮，进行“痛击”，否则就将统兵将官“正法”。短短的时间内，被他杀害的爱国群众达数万人，在东光县境方圆十里的地面上，每棵树上都挂满了他用以“示众”的人头。

他特地致电盘踞青岛的德国总督，说自己决心“永除”山东人民妨害德国侵略权益的行动，与德国“同心”

① 《美国外交文件》。

来“保全两国太平之局”^①。

他在义和团运动趋向高潮之际，特地上奏清政府，把上下都“讲求约章”，作为当前的要务之一，建议总理衙门把主要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办理中外交涉的“成案”汇编成专书，作为各省地方官吏的办事“准则”，并让所有候补人员“讲习”，使整个反动统治集团都能严格地遵循帝国主义强加的半殖民地统治体制^②，加紧镇压人民反帝爱国运动。

对于袁世凯这一系列的卖国媚外的罪行，山东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人们在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上了一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袁世凯），乖乖地伏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这幅漫画深刻地揭露了袁世凯这个买办官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表示了人民群众对这个卖国贼的仇恨和声讨。在各地，人们还到处传唱这样鼓动性的歌谣：“杀了袁鼃蛋，我们好吃饭。”明确地把袁世凯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决心杀除这个认贼作父的大汉奸。

一九〇〇年春，整个北方，都燃遍了人民群众反帝的燎原烈火。农民英雄们高喊“还我江山还我权”，“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等战斗口号，拿起武器投入反帝反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

② 《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一，第一〇、一一页。

封建的伟大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不久，八个帝国主义强盗组织了联合侵略武装，进犯京津地区。以伏在洋人臀后为荣的袁世凯在侵略联军深入国土的时候，不仅不去抵抗侵略者，反而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买办官僚一致行动，参加所谓“东南互保”，变本加厉地镇压人民反帝运动。他还一再向清政府建议，公开发布“谕旨”，命令各省反动官府“仍照约保护”所有外国在华的侵略分子，镇压所谓“乱匪、乱兵”。当时，北方各省大部分城市和乡村都在义和团控制下，唯独袁世凯盘踞下的山东是例外，被大卖国贼李鸿章誉为“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山东成了清朝反动统治者联通南北的唯一通道，清政府与东南各省买办官僚进行卖国的勾当时，所有往来文报都由此转递。

这样，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袁世凯就用一系列卑鄙无耻的卖国媚外行动向帝国主义表示了自己的忠诚。从此，这条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大名”就“闻于中外”^①，成了中外反动派共同的宠儿。一些被中国人民撵逐的洋教士，回国后都异口同声地称颂袁世凯镇压义和团、保护洋人的恩德。霸占山东的德国侵略者，更

① 张一夔：《心太平室集》卷八，第二九页。

露骨地把袁世凯称作是“一位促进德国事业的人”^①，还大为感慨地说，清朝大官中象袁世凯这样“明事理者”能多几人就好了^②。因此，一九〇一年李鸿章要毙命时，帝国主义列强就“众口一词”地要求清政府用袁世凯接任即将空出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最有权势的职位。袁世凯的老主子、德国公使穆默还亲自出马要清政府用袁接李鸿章，说是因为袁手下“有好兵”，“能弹压”人民斗争，防止义和团运动再起。特别是当他获悉袁世凯移督直隶以后，仍能“兼顾照料”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利益，更频频点头叫好，表示“欣然”^③。洋主子既然明白地表示了意旨，奴才们也群起附和。如张之洞就一再致电清政府，希望把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的事内定下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李鸿章眼看自己不行了，也给清政府留下遗嘱，说看遍全国的“人才”，没有比袁世凯更好的了。于是，几年前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道员”的袁世凯，就于这年十一月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了中外反动派最瞩目、最倚重的人物。

袁世凯坐上直隶总督的宝座后，更变本加厉地执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

② 张《电牍》卷四三，第一八页。

③ 同上书，卷五三，第二九、三〇页。

行其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他以近代中国尊孔、卖国的祖师爷曾国藩的门徒自居，经常援引孔老二和曾国藩的反动言行，如“言忠信”呀，“行笃敬”呀，等等，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走马上任之初，他就宣布自己日夜操心的事，就是如何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使帝国主义安心和满意。为此，他一面告诫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反动统治者，要他们牢记义和团运动期间“冒犯”洋大人的教训，切切实实地遵守帝国主义规定的半殖民地规范，“不可轻违”^①；一面又利用他手中的新式武装，残酷地镇压了高擎“扫清灭洋”革命大旗的直隶人民和东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起义。这时，鼓吹“中体西用”论的张之洞为了拯救垂危的反动统治，正在拚命提倡所谓“国粹”。袁世凯也随同摇旗呐喊，互相呼应。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初，他就上奏清政府，说什么学校教育应重“礼法”，使学生尊崇孔孟和拥护清朝更是此中“要义”。因而主张在各级学校内认真贯彻尊孔读经，每月初一、十五和孔老二诞辰，教师都须带领学生向孔老二的反动偶像顶礼膜拜，并宣讲清朝皇帝炮制的、宣扬三纲五常的《圣谕广训》。一九〇五年，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要搞所谓

① 张《电牍》卷七七，第一六页。

“新政”，酝酿废止封建的科举考试制度，推广近代学校。袁世凯就伙同张之洞向清政府提出：科举虽废，但各级学校仍然应把“经学”放在首位，使知识分子都有孔孟之道的“根柢”，使封建的“旧学”“日见昌明”^①。很显然，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借助孔孟的僵尸来抵制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毒害劳动人民。

“袁世凯来到保定城，他跟洋人一路行。”^②他利用攫取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大权，尽心竭力地为帝国主义效劳，向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出卖了大批民族权益。一九〇二年，他以清朝“督办关内外铁路事宜大臣”的身份，与英国签订《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答应英国在所谓“交还”义和团运动中强占去的京津、津榆铁路的幌子下，仍由英国派武官去掌管这些铁路。接着，他又以清朝“督办商务大臣”的名号，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先后签订了《通商行船续约》，给予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的特殊权益，便于它们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人民。一九〇五年，他又以清朝“全权大臣”的身份，与别的买办官僚一道，

① 《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三五，第三、四页。

② 《义和团歌谣》第一六页。按，直隶的省城当时在保定。

与日本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完全承认了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从俄国接过来的一系列侵略权益，让日本霸占辽东半岛、南满铁路，并开长春等十多个城市为商埠，允许日本经营安奉（安东〈今丹东〉——奉天〈今沈阳〉）铁路和在鸭绿江右岸掠夺中国的木材资源，大大扩张了日本在我国东北的侵略势力。这个时候，中国各阶层人民为了反击美帝国主义迫害和排斥旅美华侨的骇人暴行，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为了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铁路和矿山，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袁世凯却完全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悍然与人民为敌。他一面严厉镇压人民的爱国反帝运动，一面又继续向帝国主义奉送利权，把直隶的临城、滦州等地的煤矿，出卖给帝国主义。他忠实地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命令，强令天津市民解除抵制美货的公约。他不顾直隶、山东、江苏等省人民收回津镇铁路的强烈要求，宣称一八九九年与英、德等帝国主义签订的草合同“断难议废”，悍然与这两个帝国主义签订了正式合同。随后，他又不顾江浙人民的激烈反对，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出卖沪杭甬铁路的合同。对于这样一条得力的新走狗，美、英、德等帝国主义都非常满意，多方加以扶植和支持。短短的几年内，袁世凯控制的北洋陆军扩充到七、八万人，他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实力也迅速膨胀，为以后祸国殃民的北

洋军阀打下了基础。

一九〇七年，清政府因袁世凯卖国有方，媚外有术，就调任他为外务部尚书。袁一手经管清朝卖国媚外事务后，就上奏那拉氏说：千万不能“轻弃成议”，触怒帝国主义，否则，可就不得了^①！以前，外务部封建官僚习气严重，对帝国主义要求办理的事件，有时犹予延宕，因而招致帝国主义的不满。袁世凯一上场，立即给这个部带来了“新风貌”：一切“以爽快出之”^②，只要洋主子一提出侵略要求，他都迅速遵命妥办，把外务部彻底变成了卖国部。尤其是对于二十世纪初力量飞快扩展的美帝国主义，袁世凯更是极力投靠，打算引进美国资本修筑东北的新法铁路（新民——法库门）和开办“东三省银行”。一九〇八年，在德帝国主义的怂恿下，袁世凯还派遣徒党去华盛顿，同美帝国主义搞什么“中美德同盟”，阴谋把中国拍卖给极度贪馋的美帝国主义。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载湫（光绪帝）和那拉氏先后毙命。由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袁世凯被继起执政的摄政王载沣免职。正为迅速高涨的中国人民革命潮流惶恐不安的帝国主义各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无

①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版，总五七八〇页。

② 《远生遗著》卷一，第四〇页。

不表示失望和痛惜，并向清政府表示什么“抗议”。他们串通袁世凯的徒党，在北京极力制造对外交涉“非袁世凯断不能了”的空气，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让袁世凯东山再起，替他们维护日趋动摇的半殖民统治秩序^①。一九〇九年，载沣派他一个兄弟去欧洲“考察”，帝国主义各国都质问这个皇族：“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起用袁世凯？”^②表示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的严重不安和焦急。

卑鄙的盗国与卖国

一九一一年十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先从武昌爆发了。义旗一举，各省纷纷响应，人民革命风暴，有如秋风扫落叶，使腐朽透顶的清朝反动统治立即陷于土崩瓦解，无法收拾的境地。

毛主席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③仇视一切人民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知道，这次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决不会使我们得到任何

① 《梅阳江侍御奏议》卷二，第四四页。

② 《远生遗著》卷一，第四〇页。

③ 毛主席：《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一四〇二页。

好处”，“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是反对我们自己的”^①。所以，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帝国主义就毫不犹豫地站在清政府一边。十月十一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交部打电报，要求动用英国在华炮舰，用武力镇压革命。以后，英、美、日、德、法等国也急忙把军舰调到长江中游，日夜升火待发，准备随时进攻武汉，有的竟公然开炮轰击民军阵地。美帝国主义还纠合帝国主义各国，声言：一旦革命威胁到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各国即要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只是因为那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无法在干涉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一致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行动；加上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连帝国主义都已看出中国人民对于清政府“多不信服”^②，成了一具扶不起来的政治僵尸。因而帝国主义各国就迫不及待地要起用袁世凯来代替清政府充当它们统治中国人民的新工具。

武昌起义后的次日，四国银行团^③的美方代表司徒德就在北京扬言：“如果清朝能够获得象袁世凯那样

① 转引自《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第二三一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二九二页。

③ 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英、德、法、美四国垄断资本联合组织起银行团，包揽清政府的对外借款。

强有力的人物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并会很快地被镇压下去”^①。接着，在帝国主义各国外交使团为干涉中国革命急忙召开的会议上，美国公使首先提出：“在中国（反动统治）目前的艰难时刻”，只有重新起用袁世凯，才能使“这个国家”停留在“生活常轨”上。其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驻华使节，也多主张由袁这个一贯忠诚而又“强有力”的代理人，“出来掌政”^②。于是，他们就找载沣，以太上皇的身份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让袁世凯来行使全部权力。在内外的压力下，载沣只好于十月十二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十一月十日，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帝国主义的权威终于完全压倒封建皇权。袁世凯不但在其洋主子支持下实现了东山再起，而且迫使清朝统治者向他拱手交出了军政大权。

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标志着在中国革命高涨和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实现了和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重新组合。这个以袁世凯为头目、以北洋军阀为核心的反革命政权，是帝国主义镇压

^① 瑞德：《清朝的逊位与西方列强》，转引自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下册，第六二〇页。

^② 转引自《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第二四四——二四五页。

革命、挽救危局的工具。因此，当帝国主义各国听到他们最宠信的代理人袁世凯重新登场的“喜讯”后，无不鼓掌欢呼。他们宣称：只有袁世凯“是稳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保障”，“必须给予充分的支持”^①。英国外交大臣还特地致电与袁世凯“夙称至交”^②的驻华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希望中国在袁的掌握下，“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③

此后，袁世凯便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旨，疯狂向资产阶级革命进攻了。鉴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袁世凯便用一打一拉的反革命两面手法，来达到扼杀革命的目的。在就任内阁总理的前几天，他命令冯国璋率军攻占了汉口，造成军事上局部优势。然后请英国驻汉口领事穿针引线，向黎元洪^④提出和议，软硬兼施，迫使革命派就范。

这时，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革命形势发展迅

①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辑》第三册，第二〇八页。

②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答英国公使呈递国书颂词》。

③ 转引自《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二四六页。

④ 黎元洪原为张之洞提拔起来的湖北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后来的旅长）。武昌起义后，窃据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职位。

速，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全国已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宣布“独立”。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以及混进革命方面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故意破坏，以致在临时政府的领导权问题上，革命派闹得四分五裂。袁世凯利用革命派的弱点，继续从软硬两方面施加压力。十一月二十七日，袁军强占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还不时遭到袁军炮击。三十日，英国驻汉领事提出三项所谓议和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朝退位；三、选袁世凯为大总统。正在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居然通过了只要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他为大总统的决议，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反正”上。

当此革命派众议纷纭，思想涣散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从海外归来，大大鼓舞了同盟会中激进分子的革命勇气和斗志。在他们的鼓动和带领下，二十九日，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

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的成立，是根本违背中外反动派的利益和意愿的，于是他们就进一步勾结起来破坏革命。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首先指

使反动将领冯国璋、段琪瑞等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帝国主义则在军事上、外交上、财政上都露骨地支持袁世凯，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公然宣称：必须由袁世凯统一南北，才能承认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内外反动派的夹攻下，内部分化加剧，各种党派纷纷出现，同盟会本身也陷于分裂瘫痪状态。革命党人内的右派分子结党营私，制造流言蜚语，迫使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最后条件，表示只要清帝退位，他就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为大总统。

袁世凯看到自己阴谋得逞，时机成熟，立即实行“逼宫”。二月十二日，溥仪(宣统帝)宣布“逊位”。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十五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代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消息传出，帝国主义无不弹冠相庆。美国教士李佳白等组织的“尚贤堂”及在各地的耶稣教组织，在“为国祈祷”的名义下，特地为袁世凯祈祷祝福。这样，在帝国主义的阴谋操纵下，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就把政权拱手交给了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袁世凯，标志着辛亥革命已经失败。毛主席说：“**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

之恨。”^①辛亥革命就是如此。

“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②。袁世凯从其大半生的反革命经历中懂得，自己之所以能由清朝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奴才青云直上，一变而成为民国的总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如今要想彻底扑灭革命烈火，确立和巩固以他为头子的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那就需要帝国主义的更大支持。于是，他就利用“大总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肆无忌惮地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

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才当上临时大总统，就替他的洋主子操心，急急忙忙发布了一道《通飭(音赤chi)保护外人文》，要各地官吏和驻军，“切实保护”所有外国在华的“生命财产”，用武力防止人民群众的革命锋芒触犯帝国主义的利益。接着，他又在参议院发表宣言，恭维借辛亥革命之机对中国敲诈勒索和支持他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帝国主义各国“类皆和平中正”。他对这些“友邦”的“睦谊”和“赞助之诚”表示感激之后，就强令全国官民都要遵照他的心意，对各国“以开诚布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四〇页。

② 毛主席：《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七三二页。

公，巩固邦交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①。为了避免对帝国主义有任何触犯，他特地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对外国公使作任何攻击”^②。总而言之，是要自动做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鱼肉和十分恭顺的奴隶。这还不够，他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又借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之机，再一次发布宣言，公开宣布要把全国利权彻底向帝国主义“开放”，借以“沟通”他同帝国主义的“感情”，还恬不知耻地吹嘘说，这样做乃是“效法列强先进之精神”^③！这样，袁世凯一上场，就向帝国主义亮了相；他虽然成了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国的总统，但对于帝国主义各国却比过去更加忠诚。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为了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用武力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④。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特地向其太上皇——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表示，他的政府的一贯态度，是“力求所以履外人之望”。他现在要用武力消灭对“各国”“不利”的“叛逆（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就是对“友好各国”

①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

②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三四四页。

③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国庆纪念日宣言》。

④ 一九一三年七月，国民党人控制的江西、安徽、江苏、广东、福建、湖南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举兵讨袁，是为国民党的“二次革命”。

的报答^①。为了实现其武力统一的迷梦，他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向帝国主义乞求借款。在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看来，帝国主义各国要新诞生的中华民国继续偿付过去清朝所有的借款和赔款，承认他的政府有代清朝还“债”之“权”，那就是帝国主义看得起他这个奴才的表示，应当感恩图报。帝国主义对于这样恭顺的奴才，自然要替他输血和打气。一九一三年四月，英、法、德、日、俄五国就供给袁世凯政府两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使他有充足的军费去实现其武力“统一”。尽管借款的条件非常苛刻——利息五厘，回扣八五，以中国全部盐税收入和海关盈余为抵押，并由帝国主义派人在北京和全国各产盐地方监督盐税。尽管全国人民激烈反对，但袁世凯却悍然地全部接受了下来，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被当时舆论界称做“国家之运命将断送于此”的“善后大借款”协定，使中国的经济以至内政都进一步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在这一年度的袁世凯政府的预算中，外债的支付竟占总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六以上。

从中华民国成立之时起，帝国主义就借所谓“承认”问题进行要挟勒索，借以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在

^①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五，《通告各国公使书》。

袁世凯看来，帝国主义“承认”与否是至关重要的，“承认”了中华民国，就意味着正式承认了他这个代理人。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就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奉送领土和主权。一九一三年十月，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侵略要求，给日本以承筑所谓“满蒙五(铁)路”的权利，便于日本把东北和内蒙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为了换得沙皇俄国的承认，他不顾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激烈反对，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与沙俄签订了卖国协定，在所谓“自治”的名义下，承认沙皇俄国对外蒙的控制。外蒙于是就成了沙俄独占的殖民地。同一年，袁世凯又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接受英国的要求，下令向西藏进军讨伐叛国投敌的第十三代达赖的部队，在川边停止前进，并同意召开破坏中国主权的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为英印侵略者提供了方便之门。帝国主义各国借“承认”问题进行要挟，最后各遂所欲以后，就于一九一三年秋冬，先后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袁世凯以一系列出卖祖国的叛逆行径换取了帝国主义的可耻“承认”，却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外交成功”，表示要继续沿着卖国求荣的道路走下去。为了表达自己感恩图报的心情，他就再一次向各国驻京使团保证，他这个“大总统”要“竭其棉力”，“履行”从前全部的条约，并遵守条约以外的一切“成例”；同时还郑重宣

告，与各国“敦睦”（讨取洋主子的欢心和支持）是他的政府“唯一之基础”^①。在《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中，袁世凯特地抬出孔老二这具僵尸来为自己的卖国活动服务。他说什么“孔子喜言大同”，整个中国就应当完全“同”到各国那里去，“几无国界可言”，这样就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因此，他要全国官民把一切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旧思想”“扫除净绝”，“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根据孔老二的这种反动遗教和所谓“万国公理”，他就给帝国主义扩大对华侵略提供各种便利。一九一一年——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政府的外债增加了将近七亿元，给了帝国主义近九千公里的铁路承筑权。在一九一四年内，全国机械采煤量将近百分之九十，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一百，纱锭的百分之四十六，布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为了给各级反动官吏做出媚外的榜样，袁世凯还对帝国主义各国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称颂美国“互相扶助之美德，长存不衰”；称颂日本“敦睦邻好，厚爱我中华民国，有加无已”；称颂英国对他的支持，“本政府莫名欣感”^②。出尽了卖国媚外的洋相，丧心病狂、奴颜婢膝到无以复加的

①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答外交团颂词》。

②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

地步。

袁世凯这一系列卖国外交的活动，正象列宁深刻地指出的，意味着帝国主义“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它告诉人们，“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实行联盟的。”^①

一场尊孔、复辟闹剧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在思想上，冲击了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在许多省区，旧式书院被改成新式学堂，“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被撤除了，强迫读经的制度被取消了，每年春秋两季祭祀孔老二的“大典”停止了，过去庄严热闹的孔庙变成了荒废凄凉的空宇。虽然革命的成果落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手中，但人民群众却依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来理解这次历史事变。各地“今日开会，明日结社，不曰男女平

^①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四五〇页。

权，即曰财产均等”^①，对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诋毁之，剗（音产chǎn）除之，无俾遗种于兹新世界。”^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进一步扩散于全国。人民群众要求保卫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战线上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动持续的进攻。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③。被革命人民的铁拳打下宝座的清朝皇室，在退位的“诏书”颁布之日起，就“没有一天停顿过”^④复辟的阴谋活动；乘机浑水摸鱼的袁世凯从清朝夺过军政大权之日起，就如当时舆论界揭露的，怀着“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⑤的狼子野心。民国建立后，这两股复辟势力互相呼应，日夜图谋颠覆共和制，复辟封建帝制。这样，肯定辛亥革命，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制，保卫和发展革命成果，还是否定辛亥革

① 严伟：《严山文牍》上卷，第七六页。

② 《中州艺文录》卷八，第八页。

③ 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五二八页。

④ 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

⑤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时报》。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八页。

命，复辟君主专制制度，成了当时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人民的革命路线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路线激烈斗争的中心问题。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①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力图倒退和复辟的反动势力，总要祭起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武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派为了实现倒退复辟的政治目的，同样要求助于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孔老二。这个“民国总统”从小游手好闲，长大后都在花天酒地里鬼混，本来并没有啃过几本孔孟的“经典”，在统治集团中，一向以“不学有术”（反革命权术）著称。这时，却对孔老二大发雅兴，翻身拜倒在这个反动思想权威的脚下。一小撮梦想复辟清室的封建遗孽也抬出他们的“孔圣”，极力鼓吹尊孔读经。目的都是为了制造复古倒退的舆论，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敲开复辟之门。这样，在新生成的中华民国中，就出现了一幕新的尊孔闹剧。

一九一二年九月，还是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就以一个封建道德的卫道士的身份，急急忙忙发布了一道《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在这篇黑文中，他一面极力

①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兜售孔孟之道，宣称“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一面又引了孟轲“去人伦，无君子，率兽食人，人将相食”^①的滥调，恶毒地攻击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误人子弟，几欲化全国人民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而后快”，表示与它誓不两立。他以“大总统”的名义，强迫全国人民都必须严格地用孔孟的“礼法”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否则，他就要严加惩办，决不“宽纵”。在他的鼓动和纵容下，一批封建余孽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叫“孔教会”的反动组织，明目张胆地宣称要“昌明孔教”，用孔孟之道来“救济”中国社会，即复辟被推翻了的封建王朝。袁世凯政府对于这种复辟倒退的“卫道之谋”，深表“嘉许”，随即予以立案，鼓励他们努力推销孔老二的“教义”，“以作民族精神”^②。

为了重新树立遭到革命打击的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权威，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便指使其国务院向各省倡议恢复清朝“祀孔”典礼。四月间，袁世凯直接操纵的尊孔复古组织——孔社，就在北京开张，公开宣布它的

① 原见《孟子·告子下》、《孟子·滕文公下》。此语大意是：如果去除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和反动统治者，那就象兽类吃人，人与人将互相吞噬。

② 《孔教论》卷首。

“宗旨”就是要提倡孔孟之道，用它来“巩固”“国基”。一些省区的军阀官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就强令各级学校于开学、放假及孔老二生日，全体师生都须对着孔老二的牌位，象朝见封建皇帝一样，行最隆重的三跪九叩礼，有不遵办者，学校校长和该管县知事都要治罪。六月，自称“日夜兢兢”于“维持(孔孟)人道”的袁世凯，就炮制出一篇《通令尊崇孔圣文》，大捧特捧孔老二，说什么“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今日民主之局”，就是孔教经数千年流传而结出的成果，要有关部门详细议订祀孔礼仪，“以表尊崇而垂久远”。为此，他就以“民国大总统”的名义，派代表去北京国子监和山东曲阜祭孔，并特地命令铁路局减价优待前往曲阜祭孔的丑类。在这个“大总统”的带头和煽动下，“尊孔”妖风于是愈刮愈烈。

这一年的十月，袁世凯被“选”为民国正式总统，在通往复辟的路上进了一步。就任之日，他就发表“宣言”，说他的治国方针是“道德为体，法律为用”，也就是软刀子和钢刀子并重——用孔孟之道从思想上奴役人民，这是根本；加强反革命暴力镇压，则是手段。他紧步曾国藩的后尘，搬出孔老二“忠信笃敬”四字诀，作为他所要求的“道德”的基本内容。他把孔孟之道说成是宝贵得不得了的“国粹”，硬要人民“保存国粹”，用孔孟

“名教”把自己捆缚起来，“轻”自己的基本生活权利，“重”自己对袁世凯的“义务”。随后，他又发布一篇新的尊孔令，狂热地吹捧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他统治下的“民国”里，对孔孟就应比前代封建王朝“益致尊崇”。其御用机构根据袁世凯的意旨炮制出来的《宪法草案》中，居然明文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妄图利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强制推行孔孟之道。

思想上的尊孔读经是密切地为政治上的倒退复辟服务的。就在袁世凯密锣紧鼓地大演尊孔丑剧的同时，他又通过种种非法的、卑鄙的手段，在一九一四年使自己由正式总统进而变为仅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终身总统。离皇帝的宝座越近，他越要孔老二作精神保镖。他特地征引孔老二在其变天帐——《春秋》中所谓“大一统之义”和孔家店的二掌柜孟轲“定于一之训”，来“证明”自己搞独裁专制的必要性^①。为了进一步扫除复辟的政治思想障碍，他先是跳到其御用机构——政治会议上大放厥词，继而又发布“祭孔令”，公开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战，胡说什么中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平等”、“自由”、“共和”等冲击了封建纲

^①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五七页。

常，导致“人欲横流”、“内政紊乱”，几乎成了“土匪禽兽之国”的缘故，只有摒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遵照孔孟的三纲五常行事，才能“为万世开太平”^①。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人们放弃共和制度，拥戴他复辟封建帝制。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所谓“政治会议”于是就通过决议：兴复各省的孔庙，在京师和各省一律恢复封建王朝的祭孔典礼。袁记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制订出所谓《崇圣典例》十八条。袁世凯于是就以“大总统”的名号通令全国：每年春秋祭孔两次，京师由总统、地方由地方长官去文庙主祭。教育部另又通令全国中小学校一律读经，在“修身”、“国文”课中，都必须“以孔子之言为指归”，强令师生都要“尊孔尚孟”。接着，袁世凯便亲自粉墨登台，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带领百官，与一群穿戴着离奇古怪的衣帽的奉祀官一道，学着清朝皇帝的老规矩，到天坛祭天祭孔。尊孔复古的闹剧于是进入高潮。

在袁世凯大搞尊孔读经的同时，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和以劳乃宣^②等为代表的封建遗

①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卷二。

② 劳乃宣，清末学部副大臣。民国初，他四处纠集“遗老”阴谋复辟清帝，并与德帝国主义勾结，主持青岛的“尊孔文社”，大造尊孔复辟的反动舆论。

孽们，为了实现其推翻民国、复辟清室的迷梦，也四处蠢动，推波助澜。他们呼朋引类，继“孔教会”、“孔社”之后，又在各地拼凑起“孔道会”、“读经会”、“孔圣会”、“宗圣会”、“尊孔文社”等名异质同的反动组织。他们恶毒地咒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是“礼坏乐崩”^①，狂叫要“重光”孔孟之道，把中国拉回到封建帝制的“礼”、“乐”中去。他们抛出了一篇又一篇的黑文，鼓噪什么孔教是中国的“国魂”，有了它，才有中国，垮掉了它，就等于灭掉中国，要求袁世凯政府把孔教奉为“国教”，并定于宪法之中。对于这些历史小丑的尊孔复古活动，袁世凯自然全力支持，下令一律予以“查照保护”，利用这些啦啦队为自己的复辟阴谋服务。

时刻梦想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各国，对袁世凯一伙的尊孔复古活动，更是积极支持，紧密配合。沙皇俄国文化特务盖沙令，抛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等大毒草，狂叫什么今日中国最危险的事，就是废弃“孔教”。他板着面孔教训中国人民说：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只有把孔孟之道发扬光大，才不至于“人人心皆为革命所倾倒。”一九一三年，英国反动官员

① 康有为，《议院政府无干预民俗说》。

约翰斯顿，抛出了《联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唯恐孔孟之道在中国绝了种，他们就少了一副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因而别有用心地督促中国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急行提倡”所谓“国粹”，将孔教“规定于宪法”之中，强迫人民尊奉。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美国特务李佳白，不仅伙同一批封建遗孽发起并主持孔教会等鼓吹尊孔读经的反动组织，而且还亲自出马，吹捧孔孟之道是“人类共通之原理”，胡说什么“孔教昌则民国愈固”，要中国人民把全力“尊孔”作为“惟一无二之目的”，与西方基督教相辅而行，以“佐治世”。他还向袁世凯政府建议：“尊重”孔教，把它定为“国教”，在全国强制人们啃读《四书》、《五经》。据他说，这样就可以“崇道德”（三纲五常），“安人心”（抵制革命思想），“保国体”（稳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文化特务尉礼贤，装出“笃志中国孔孟之道”的模样，苦心网罗了一批封建遗孽，在青岛搞起一个“尊孔文社”，专门“讲求经学”^①，替封建遗老们的复辟活动撑腰打气。很显然，帝国主义洋儒们之所以如此热切地参加尊孔闹剧的演出，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抵制和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潮流，为袁世凯

① 《桐乡劳先生(乃宣)年谱》第一九页。

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倒退、复辟活动“植政学之基础”^①。

袁世凯忙着复辟帝制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忙着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九一四年七月，大战爆发。欧洲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全力互相厮杀，一时无暇东顾。因此，最邻近中国的日本，在袁世凯眼中便成了主要的靠山。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向抱有吞并中国的野心，反对中国的民主共和。如今袁世凯热衷于帝制自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又忙于大战，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它“百年不易再得”的侵华好时机，决心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之机，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它向袁世凯暗示，支持复辟帝制，条件自然是要袁世凯向日本让出更大的民族权益。一九一四年八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公然派出侵略军在我国山东龙口登陆，随后又控制了整个胶州地区。袁世凯为了取悦于日本，不但不敢抗议，反而宣布“中立”。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就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内容分五部分：前四部分，要求给予日本在山东、“南满”和“东部内蒙古”以及汉冶萍公司的特殊权利，中国沿海港湾、岛屿，

① 《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八期。

不得割让或租借给他国；第五部分则要求聘用日本人充当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察和军火工业由中日合办，中国给予日本许多新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等等。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告诉袁世凯说：如能接受这“二十一条”，“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做皇帝）”。其他帝国主义也不示弱。英国命令驻华公使朱尔典面见袁世凯，表示“若中国无内战，则随时可以实行”帝制；美国更加积极，“亟盼”帝制“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德国也大力支持，答应在“财政器械”方面给以援助；沙皇俄国则在暗中帮助袁世凯镇压人民革命，为复辟帝制扫清道路。

但是，历史对一切反动派总是无情的。袁世凯在中外反动派的密切配合下搞起的一系列尊孔复辟的活动，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就在袁世凯用孔孟之道这根锁链束缚人民群众，巩固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的时候，许多地区的农民持续不断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用实际行动来批判孔孟之道。他们理直气壮地宣布：“朝代已换，此田非复故主所有”^①；“田土岂是富家物，上山打猎大家有分。”^②在江苏的吴江、松

①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时报》。转引自《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第三五页。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册，第三三四页。

江、青浦、南汇等十多个县，浙江的海盐、象山、石门和钱塘，山东的广饶和莱芜等十数县，山西的盂县，河北的临榆、易县，陕西的神木，福建的莆田、德化、永春等州县，甘肃的宁县、庆阳、合水等州县，吉林的阿城、海龙等州县，都连续爆发了农民群众抗租、抗捐和反暴政的斗争。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在河南宝丰、鲁山地区发动的白朗起义军，提出了“打富济贫”和“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政府”等革命口号，纵横五个省区，给了袁世凯的尊孔复辟活动以沉重的打击，使这个独夫民贼更快地进入坟墓。特别是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更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怒。上海、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和全国其他许多地区，人民群众纷纷组织各种爱国抗日的团体，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抵制日货。国外的爱国华侨和留学生，也都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袁世凯的尊孔复辟活动，也进行了声讨、揭露和批判。孙中山于一九一三年发动“二次革命”的檄文中特别指出，袁世凯的尊孔和复古活动，正是为其复辟帝制的阴谋服务的。著名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章太炎，这时也针对袁世凯为首的反动派煽起的尊孔妖风，继续撰写反孔的文章，愤怒地指斥袁世凯搞的祭天祀孔等等，目的

就在于欺骗人民群众；指斥康有为等封建遗孽搞的孔教会之类，不过是效法汉代的董仲舒，“巫道乱法，鬼事干政”，目的是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①。袁世凯大搞尊孔读经的结果，恰恰进一步暴露了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如同鲁迅所说的，使孔老二这个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也连带地受了累”。

被皇帝梦迷了心窍的袁世凯，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以为既然自己已经消灭了异己，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先后镇压了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国外又有帝国主义的一致支持，如今只要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皇帝的宝座不是坐稳了吗。于是，他悍然下令各省反动官府“严拿惩办”所有参加抗日爱国运动的人民群众，并于五月九日答复日本帝国主义，除其中第五部分留待“日后协商”外，其余四部分一律接受。事后，袁世凯一面指使徒党们无耻地宣扬“元首外交成功”，一面又附会《尚书·仲虺之诰》中“兼弱攻昧，取乱侮亡”^②的论调，证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应该的。他生怕蓬勃高涨的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

① 章太炎：《隆礼杀论》。

② 意思是：衰弱和内政混乱的国家就理应兼并它，攻取它，侮辱它。

动触怒了日本帝国主义，打乱了他的称帝计划，还公开发布“申令”，说什么：“自强之道，求其在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要人们不要责怪和仇恨帝国主义侵略者，不要“徒逞血气，任意浮嚣”，接受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与帝国主义开战，结果召来灾祸的教训，坚持不懈地对帝国主义“讲信修睦”^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心甘情愿地做帝国主义最驯服的奴隶。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这样，袁世凯既请出了孔老二作精神保镖，外交方面，又自以为获得帝国主义后台老板的全力支持“已有把握”，于是就进一步加快复辟帝制的步伐。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抛出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肆无忌惮地诬蔑中国人民“民智低下”，只能实行君主制，没有资格实行民主共和。袁世凯豢养的一批反动爪牙随之就搞起了一个复辟帝制的御用机构——筹安会，打着“研究学理”的幌子，大造复辟帝制的舆论。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所谓“衍圣公”孔令贻，成了这个御用机构的名誉理事。他一头栽进袁世凯的怀里，利用孔老二的反动偶像来为这个新皇帝保驾，三番五次地上书致电，叫嚷什么“共和国体不适用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一四七页。

于中华”，请他的新“天子”袁世凯“早正帝位”。许多地区的尊孔组织也群起逐臭，抬出孔老二的“尊王之义”，吁求袁世凯早日爬上“大位”。这些丑剧一幕又一幕地演过之后，袁世凯认为万事俱备，可以“登基”了。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真命天子”，他又一次请出孔老二这个护法神，专意征引了儒家“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①的反动谬论，要人们相信他的复辟称帝“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且天老爷这种意志是“久稽”（长久拖延）不得的，现在他就是秉承“天意”，象牧养牛羊一样地来统治人民的^②。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他就袍笏登场，公然演出帝制丑剧：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一九一六年为“洪宪”元年，随即论功行赏，加封“衍圣公”孔令贻“郡王”衔，表示他这个新皇帝是饮水思源，不忘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孔老二的“功德”的。

但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不是袁世凯等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是帝国主义“强者”，而是中国的真正主人——人民群众。袁世凯尊孔、卖国、复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二八五、三二二页。此语原见《孟子·万章上》、《左传》襄公十四年。大意是：老天爷是以老百姓的视听为视听的，君主就是按照老天爷的意志，象放牧牛羊一样统治老百姓的。

^②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中册，第七四、七五页。

辟三位一体“大功”告成之日，正是他进入坟墓之时。就在袁世凯利令智昏帝制自为的时候，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反袁的革命巨浪，很快就使袁世凯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皇帝梦仅仅做了八十三天，就象肥皂泡一样迅速破灭了。一九一六年五月，这个独夫民贼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众叛亲离，“流汗浹背，目眩头晕”，很快就一命呜呼，到地下朝拜孔老二去了。历史再一次证明，在近代中国，右派要搞反革命政变注定是短命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①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到近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顽儒，谁都逃脱不了这个可耻的下场。正如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指出的：“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共和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②就在袁世凯死后三年，即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意气风发地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一九二一年七月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六九六页。

②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三页。

一日，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面貌焕然一新的中国革命就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灿烂航程，从胜利走向胜利！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尊孔派和卖国贼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

作者 = 王天奖 李国俊编写

页数 = 192

SS号 = 10291488

出版日期 = 1976年10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一、近代尊孔、卖国的开山祖曾国藩

打着理学黑旗，组织反动武装

卫道士和复礼狂

“忠信笃敬”与“曲全邻好”

二、以“圣道”为护符的大卖国贼李鸿章

侵略者眼中“最杰出的人物”

一手软刀子，一手洋刀子

“圣道”与卖国

出卖民族权益的大掮客

三、炮制“中体西用”论的张之洞

保“名教”和办“洋务”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四、尊孔、复辟、卖国三位一体的袁世凯

中外反动派培植的新军阀

卑鄙的盗国与卖国

一场尊孔、复辟闹剧